

灯光，永远的灯光
我的母亲朱君允

灯光，永远的灯光
我的母亲朱君允

熊性淑 朱君允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熊性淑 朱君允 著



版权信息

书名：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 作者：熊性淑，朱君允著

书号：978-7-108-05215-5

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5年05月01日

定价：36.00元

出版说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1958年，我的母亲朱君允在湖北武汉大学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派。1979年，当她逝去十三年之后，几经波折，才获得一纸平反。她的女儿——《永远的灯光》作者熊性淑一感叹说：“对于我们子女和亲人来说，一切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知母莫若女，熊性淑在《永远的灯光》中对母亲有一段精湛描述：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知识妇女，一位教书先生，她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做出过壮举。但她竭尽全力在人生的舞台上，将爱国者、母亲、教师、朋友等各种角色都发挥到极致，她用自己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永远赤热的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熊性淑称母亲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她用《永远的灯光》中的动人片段，连接起那条闪烁发光的弧线，展现了母亲的可贵品质。

我比《永远的灯光》的作者熊性淑年长几岁，在青年时代也有若干和母亲朱君允单独相处的岁月。下面让我再透露一些实情，同样是反映母亲的可贵人品，以表达对母亲的无尽怀念！

母亲在历史文化方面对我的教育

为了提高汉语修养，母亲认为我首先应该接受现代汉语的文字训练。但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少年也应该有一定的阅读古汉语，从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天津暂住时，她自己教我读《论语》和《孟子》的若干片段，后来还曾给我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但是1941年我在

四川成都树德中学高中修习国文课时，该校选用的教材是《古文辞类纂》，母亲本人虽然不大赞成让我们少年人连篇累牍地吸收甚至背诵这些内容，但是当任课老先生选授司马迁《史记》的《报任安书》时，她又欣然当起“助教”，因为任课老师只是从词义上略加解释，强调要学生背诵，而她却给我从文学和历史方面讲解司马迁被贬谪后，隐入深山修著《史记》的巨大意义。

母亲对年轻人是主张通才教育的，这特别表现在她对我在中学阶段的文学指导上。她认为我首先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通顺的白话文写作，此外更请一些武汉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师对我进行现代文学的指导。例如：当武汉大学的朱光潜教授到我家做客聚会时，母亲总是尽量利用机会请他给我讲解中学语文课中的某些著名散文篇章，如朱自清的《背影》，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请朱光潜教授为我讲解他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若干片段，其主要思想是青少年应该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均衡发展。母亲对我说：

“朱伯伯不仅是文学理论教授，而且是中国的美学大师，你应该用心地读他的这本书，加强自己道德文艺的全面修养。”

母亲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对我的教育

1940年秋至1941年夏，我在四川金堂县读中学时，因患湿气疮腿上流脓，回到成都家里治疗，当时只有高锰酸钾药粉和220（红）药水。我想起北京的协和医院，不禁提起过去在北平的物质条件多么好。母亲没有说话。

1942年夏秋在四川成都，母亲想应聘去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学，没有旅费，母亲要我去当铺，把冬衣当卖换钱。我回来说，要是能将北平家里的东西拿来就能多换钱了。母亲沉默。

1943年在乐山，冬天冷，母亲的大学工薪低，物价贵，吃不

饱。我又发了一些牢骚，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是留恋抗战前在北平儿时的生活，母亲突然急躁起来，对我正色地说：“妈妈为什么带你和妹妹来四川，这里生活是苦，可是你要知道，在北平日本人要你们当亡国奴，念日文，不能学中国历史，你愿意吗？”

有些东西很宝贵，人活着就不能丢掉，是钱买不到的。你已经上到高中了，怎么这个道理还不懂！”

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母亲。光阴荏苒，潮涨潮退，这些话时常在我心灵深处响起。我慢慢认识到，这是母亲朱君允留给我一生面对沉浮的最大财富。

现在在高等院校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有钱不一定能办得好学校，没有钱却一定办不好学校。有时这更成为某些学校努力“创收”的一个强有力理由。可是，是否同时应该强调，办好学校需要的一些精神要素，如信念、情操、学术传统，乃至学校管理的睿智和责任心，不是靠钱能买得到的，同样万万不能缺少呢？

我读武汉大学附中时，英语老师许海兰在授课中讲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联合国成立，强调“人的自由”，即免于饥饿、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等；而母亲朱君允却对我说，这是在联合国成立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程度不同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的，但是要知道现代国家立国的根本原则，还是应该对学生讲解美国的《独立宣言》。母亲从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是系统的基督教会学校教育，她虽不是基督教徒，但思想上深受资产阶级民族自由的影响，认为做人有两个根本方面：在道德方面要遵从私德和公德，在政治上要讲求民主和自由。我记得我读中学时，她要求我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1946年她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积极参加武汉大学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那时我正在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当译员，她多次写信要求我立刻辞职，尽快回到大学受教育。她曾对

我提出最低要求说：即使不能为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尽一份力量，至少当一个“自由青年”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母亲的作为

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熊佛西只身南下，母亲朱君允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栖居天津英租界，当时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和他的同事熊大缜也暂居天津外国租界内，要向敌后（可能是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一带）运送医药用品，还要秘密搜求制造炸药用的化学药品和各种原料，我母亲曾协助叶伯伯等上街采购并保管一部分准备用于抗日的物资。又如1939年，我母亲还曾置我们兄妹三人于不顾，甘冒生命危险掩护青年组织“抗日锄奸团”成员孙若愚从天津乘北宁铁路客运去北平，以避免日伪对孙若愚的搜捕，因孙若愚曾参与对日伪华北联邦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的刺杀行动。

1940年春，母亲带我们兄妹三人从天津乘英国商船去上海经香港转去抗日后方四川投奔我父亲，希望全家团聚。我们在大沽港口正式登轮时需经过日军森严检查，而在随身行李中我母亲还带着一本我父亲熊佛西在抗战爆发前夕将完成的自传体《我的戏剧生活》文稿，其中有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如果被日军翻检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事先没想到登上外轮会遭受如此严格的检查，我母亲一时情急，就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船员坦诚相告，那位可敬人士二话没说立刻协助将我父亲的那份文稿设法藏匿起来，据说是塞在卫生间了。我事后问母亲：你怎么敢托付给素不相识的人？她回答说：当时无奈，但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出于爱国情操是会甘冒风险帮我一把的！记得多年后我又追问母亲：如果日本鬼子把你逮进去，我们小孩怎么办呢？她回答说：那时已经要当亡国奴了，只能冒险一搏，顾不得身家性命了。

抗战后母亲迎接新中国

在解放战争时期，母亲从四川乐山随武汉大学返校回到湖北省武昌珞珈山原校址，在外文系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她因为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等言论，和武汉大学的缪朗山、金克木等教授一起，一度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拘留过。在那一段时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母亲对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向往，对解放战争的愈益关注，以及和武汉大学进步师生的交往日益密切。

到了1949年初，解放军已占领了天津、北平，大军南下向长江一带进逼，我母亲一方面探听平津亲友和高校的消息，一方面配合武汉大学的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动员武汉大学的教职员留下来迎接解放，她在家对我们明确表态：从抗战以来咱们家一直颠沛流离不能稳定，这次可不（逃）走了，中国的希望在北方！

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母亲的兴奋溢于言表，她积极参加武汉大学的各项活动，精神焕发，一扫多年来婚姻不幸和生活艰辛带给她的忧郁心情。

母亲在“文革”受迫害

1957—1958年全国掀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政治运动，我母亲朱君允在武汉大学被划为右派分子。教授级别下降，被罢免了武汉大学工会副主席职务并取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由于我当时不在武汉大学，母亲被划为右派的原因及过程不详，但从我妹妹熊性淑以及我在武汉大学的友人告诉我的内容得知，母亲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名为：第一，同武汉市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马哲民往来密切，思想共鸣；第二，以代某些人反映意见的形式说工人、农民吃不饱，实际上是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第三，以人民代表资格为某人带私函去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实际上是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随后，由于母亲在群众揭发批判时拒不低头认罪，为自己辩护说“只是受人之托带信去北

京，并不知道其内容”云云，由此证明我母亲坚持反动立场，故划定为“极右派”。

武汉大学党委1979年11月16日在《关于朱君允同志右派问题改正的请示报告》中说：“朱君允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有些偏激情绪，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以不划为右派，为此，对其原划极右分子问题建议予以改正……”可是，直到1979年，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认为我母亲在1957年作为人大代表，反映个别人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定量意见是说了错话，为个别人带信函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事机构是有偏激情绪，这种结论即使在当时足够实事求是吗？符合历史的公正吗？

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变。当年一些参加过打砸抢和人身迫害的红卫兵，今天已站出来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是可喜的。作为子女，我们在半个世纪后旧事重提，不过是要说明，在中国，事实上要清除极左的思想流毒，莫忽视其任重而道远。

母亲的忘年交孙亦梅一席话

1980年代中期，母亲朱君允已经逝去近二十年，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当时已经退休的长辈孙亦梅，她和我谈起与我母亲的友谊时说到：“朱君允教授在武汉大学如何‘犯事’被划为右派我不了解，但我了解朱先生为人直率热诚，投身教育事业，绝不会反党，因为她在解放后曾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最廉洁的政府，办教育也是最负责任的。’朱先生被划为右派后，我和她的友谊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只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身处两地，要像过去那样频繁往来是不可能了，她在‘文革’中遭到不幸，这是我们大家的遗憾，无可挽回。但是我们要记住朱先生高尚的品格，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为人诚实，待人诚恳……”

我对母亲朱君允永久的内疚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风暴在全国掀起，我母亲作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严重冲击。除了挨批斗外每天还被罚扫街，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试想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折腾！我当时作为“牛鬼蛇神”整天参加劳动改造，爱人许志安每天需去她的学校“参加运动”，都难以照顾到家里。我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还要硬起心肠，对母亲不时进行监督，要求她在劳动之余，“深入检讨，彻底改造”。熬到11月天寒地冻，母亲又饿又冻，一个晚上竟对我哭诉：“为了你们的前途不受连累，给我什么罪名我都承认，只求把封存的棉袄给我。”从不对无理的强权政治和生活困窘屈从的倔强老教授，在“文革”的无情压力下竟被折磨到精神几近崩溃地步，我作为她的儿子多少也参与了这份折磨，半个世纪以后回想起这一段情景，依然摆脱不掉心灵深处的阵阵内疚。

我母亲朱君允被划为右派是个人的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悲剧中，也只能说是沧海一粟。

愿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朱君允。

熊性美

2012年7月1日初稿

2014年10月20日三稿

永远的灯光（上）

熊性淑

1930—1937，北平

最早的记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一爸爸熊佛西、妈妈朱君允、哥哥性美（贝贝）和姐姐性慈（妹妹），还有我（小弟），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5号一所古老的宅第内。这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大人们赠以雅号“勺园”；但不知为什么，佣人和小孩们却叫它“后宅”。这就为这座旧宅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在我的记忆中，庭院中央长着一株高大的梨树。夏天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着；秋天硕果累累，枝头上缀满了青绿色饱满的果实，引人垂涎欲滴。也许正因为这株梨树的华盖，房内的光线总是暗暗的。只记得南房的前沿有个新添的“玻璃厅”，里面阳光灿烂，当然是我们小孩嬉戏的好地方。爸妈也喜欢在这里接待他们的朋友。作家许地山¹、许地山（1894—1941），台湾省台中市人。历任北平燕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笔名落华生，作品被茅盾誉为“独树一帜”。散文《落花生》解放前收入中小学教材中，哺育过千千万万青少年。

北大教授金岳霖¹等都是常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许伯伯爽朗的笑声和金伯伯瘦高的身影。

我那时还没有桌子高，常和小伙伴们在桌底下玩，觉得挺神秘。我们可以偷窥到许多来来往往的腿和脚，再猜猜它们的主人是谁，悄悄地笑着、比画着，非常开心。

记得有天早上，年轻的女佣王妈突然走进房来，手里拿着半只啃剩下的梨。她说：“太太您瞧，这是我刚在妹妹的枕头底下找着的。”妈妈一看就乐了：“这孩子，我说了不准吃，不准吃，可她还是偷偷地吃了。”王妈应着说：“准是昨晚躺在床上吃了一半就困了，剩下的就塞在枕头底下了。”

大人们又都忍不住轻声地笑起来。

亲爱的妈妈，温柔和气的王妈，还有我那傻乎乎淘气的小姐姐性慈，她们都是我最早的记忆。

府右街罗圈（贤）胡同

后来，我家搬到了府右街罗圈胡同16号。

这又是一座古老宅第，气势不凡。听说原是明朝某权贵的住1金岳霖，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哲学大师、逻辑大师。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曾创建清华大学哲学系。历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宅，恐怕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妈说刚一见它时，觉得已显衰败，似乎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那牢固厚实的灰色砖瓦、宽大平坦的台阶、粗挺的房柱和优美曲折的走廊，都默默地传递出一种恢宏典雅、宁静安详之美。这所古老的旧宅无言地征服了爸妈，于是他们就决心随缘在此安家。

父母那时风华正茂，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一搬进来就动手收拾整理他们的爱巢。宽敞的四合房内又添种了若干姿态各异的树木，西北角还精心栽培了两株碧绿的芭蕉，这在寒冷的北方是很难看到的。充当客厅的西厢房前有一片紫丁香和开小白花的榆叶

梅。廊沿下还挂着好几盆爸从福建带回的兰草，绿叶细长，开花时飘出阵阵幽香。

特别令人艳羡的是正南房“双照堂”前那排高大健硕的牡丹和芍药。春天，成百朵雍容华贵的花朵把整个庭院都照得亮丽起来；浓郁的花香还招来许多嗡嗡作声的蜜蜂和上下飞舞的彩蝶。平日显得有些沉寂的庭院，此时就焕发出青春，生机盎然，光彩妩媚，令人过目难忘。这一景色也是主人主妇精心营造的。

房子西边还有另一个大院，那里原本只是高墙围着的一片废墟，外加一座孤零零的假山。后来这场地却被主人主妇平整为一大块绿茵，四围种上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夏天的傍晚，爸总是和学生们的在这片草地上排戏，孩子们和佣人当然是最忠实的观众。

主人主妇时值年富力强，家庭和睦甜美，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来这里做客。家里常能听到爸爸的高谈阔论和朗朗的笑声。妈妈总是斯斯文文、轻言细语，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其实她是一位慈爱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抽得闲暇总愿与孩子们共处。她也爱吟诗填词，或临帖练字、为人写扇面及屏条。那时她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记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正是紫丁香盛开的时候。我大概五岁左右，在树丛边玩。春天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一时我看见妈妈穿戴整齐，一袭咖啡色的长袍，手里还拿着几本书。我知道她要出去上课了。当她走过来时，我突然发现她今天脸上有点不对劲。

我说：“妈妈，你怎么没有戴眼镜呀？”妈妈听了一愣，就笑着说：“哟，小弟这小眼睛可真尖呀，我自己都忘了戴眼镜，她倒看出来。”说着就笑嘻嘻地回房拿眼镜了。这也是我最早的幸福回忆之一。

春风化雨

在幼儿园里我是一个很羞怯的小姑娘，经常有一种紧张而孤独的情绪。小朋友们玩得热热闹闹，我却躲在角落里，有时还掉眼泪。到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家里，我可不完全这样。

有一次妈妈翻晒东西，我看见一个象牙雕刻的小挂钟，只有大拇指头那么大，玲珑可爱。我拿着就不肯放了，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可惜不一会儿妈妈就把东西收拾起来了。

我心里若有所失，好生气恼。不断地嚷着：“我要那个小钟！”

“我要那个小钟！”妈妈怎么哄都不行，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能转移我的渴望。最后她无奈地看着我，把我拉到书桌旁坐下，平静地对我说：“来，小弟，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就顺从地坐下了，可能也是闹累了吧。

于是妈妈打开一本半旧的书，开始给我讲那个叫安利柯的小男孩的故事。孩子每夜在烛光下偷偷地代父亲工作一抄稿子，想为瘦弱的父亲分担一些沉重的家庭负担。父亲并未发觉，只是批评儿子成绩突然下降。有一夜，夜半醒来顺着灯光走进书房的父亲终于发现了事实真相，父子相拥而泣。

妈妈慢慢地讲，我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小男孩的爱心、他的奉献及忍辱负重的精神，像一条小溪一样静静地、静静地流入我的心田。泪水不觉从我眼中涌出。妈妈平静地讲着，我的泪水却如涓涓细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深刻的爱的故事。正如它曾哺育过

全世界好几代儿童一样，这故事也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最后妈妈指着书面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说：“这本书叫《爱的教育》。”当时我还不认得几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尽管笔画复杂，我却一下就记住了。

这似乎是我识字的开始，也可以说是阅读的开始。从《爱的教育》以后，我知道了书是一样好东西，美妙无比。我开始萌发了识字和阅读的愿望。在妈妈的诱导下，我很快就把这愿望变成了能力。妈妈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哥哥读五年级时，妈妈也向他推荐了《爱的教育》，并且要求哥哥开始记日记。这本书给哥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少年鼓手》和体壮力大、爱打抱不平的加伦。加伦极富侠义精神，在同学中总是扶弱拒强。妈妈说少年人能够精忠报国，就不是小孩，而是伟大的少年。护卫弱者，不畏强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样是一种崇高品德，要做到也非易事。闲聊中妈妈始终从容自然、和风细雨，我们三个孩子也都静静地听着，谁也不想出去玩了。

春雨润物无声，滴滴浸入心田。

新帽子

那时我们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比较宽裕的。爸爸在北平艺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约三百银元；妈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上课，也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但孩子们衣着很俭朴，我和姐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或编织的。

那时的儿童节是四月四日，孩子们都唱：“四月四日到了，啦啦啦啦……”正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好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四月三日那天老师要求孩子们节日那天要穿得漂亮些，回家后

我赶忙向妈妈传达了“圣旨”。

“穿什么好呢？”妈望着她三个孩子发起愁来了。

哥哥和姐姐怎么打扮的我已忘了。只记得妈看着我说：“好吧，小弟，我来给你做顶新帽子吧！”说完就马上找出一些边角余料开始剪裁，并俯身在缝纫机上滴滴答答地赶制起来了。一晚上的工夫，帽子就制成了：帽筒是浅绿色的绸子，前面还有一道起皱的宽荷叶边，两条长飘带则是鹅黄色的绸子。

第二天清早，妈妈高高兴兴地把这顶新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把那两根飘带在我颌下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说：“你走过去让我看看。”我就听话地走过去了。妈妈看着我很得意地笑着说：

“真不错，再配上你那件黑外套，挺漂亮。”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漂亮不漂亮，也不记得到了学校老师同学怎么说了。只觉得那顶绿色的绸帽子戴在头上十分新鲜，使我内心充满了节日的愉悦。

妈妈，谢谢你！

快乐的家庭

哥哥长我四岁，姐姐长我两岁。我们都在府前街的艺文小学上学。1936年秋，我进入小学一年级。

哥哥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小眼镜，聪明又淘气。每日放学回家，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奔往自己的卧室，然后书包一甩，往地板上一倒，吐出舌头来大呼：“我死了！”吓得我和姐姐哇哇叫。

我小名小弟，但并非男孩，而是出生前哥哥就早已给我“定型”了，他要一个弟弟。我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姑娘，特别爱漂亮，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看看上学前用唾沫“定型”的前刘海儿究竟效果如何，但每次都大失所望。

那时我们兄妹最亲密的朋友是北师大邱椿（邱大年）教授的四个孩子。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父母又都是好朋友。节假日邱家的孩子常来我家共度快乐时光。拿现在的话来说，当时妈妈总担任“节目主持人”。

夏天，在哥哥极力怂恿下，妈妈在我家后院召开运动会。为此挖了沙坑，买回细沙，还围着草地用白粉画了跑道，比赛各种田径运动。哥哥当仁不让地表演了撑杆跳。孩子们都兴奋极了，拼出全力争第一。

冬天，妈妈带着我们过圣诞节。头天晚上就带着孩子们把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小礼物散放在客厅的炕上，上面再盖上一层雪白的薄棉花，准备邱家的小客人来一起摸奖。妈妈和王妈又用彩色电光纸做成长长的链条，挂在天花板下；也不知从哪里挖来一棵小松树，缀上彩色小灯泡——这在当时还是“先进技术”——做成圣诞树。于是圣诞节的夜晚，妈妈带着我们唱啊、跳啊，表演节目、摸彩，热闹非凡。

亲爱的妈妈为了她的三个小儿女，尽力营造一种和睦活泼的家庭气氛，令我至今不忘。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那么善良、热情、兴致勃勃、充满生气。她千方百计带领她的孩子们创造健康欢快的生活。因此，无论是青少年时代，还是长大成人后，我们三兄妹都有着热情活泼的性格，好交朋友。我想这与妈妈本人豁达的性格以及她对我们早期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婚礼

抗日战争前在北平，我们家里发生过两件盛大事件。

第一件是有趣的事：AuntLi（李瑞林）和杨济时伯伯在我家举行婚礼。AuntLi是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著名妇产科专家。她和妈妈还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窗，因互相倾慕人品才华，又互相砥砺女子自强上进的精神，成为矢志不渝的挚友。杨济时是当时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两位都医术精湛。

但他们年轻时一心追求事业上的成就，直到三十多岁才结下百年之好。现在想来他们决定在我家举行婚礼、设新房，是喜欢那种自由活泼、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他们希望婚礼典雅大方、别具一格。

妈妈自幼就是个能为朋友赴汤蹈火、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当她知道这位学有专长的妇女经过苦读与事业上的磨炼，在三十多岁时终于找到感情上的归宿，自是高兴万分。于是她一马当先，热心地为这对新人操持起来。她刷新房、摆家具、挂字画，兴高采烈地忙碌着。爸爸就全力布置我们的后花园——婚礼与婚宴都将在那里举行。假山上挂起了许多五彩缤纷的灯泡，还挂了十个特大红宫灯，喜气洋洋。婚礼那天，宾客如云，宴席就设在花园的草坪上，那是一个温暖的初夏之夜。

我们小孩的兴奋快乐自不待言，我们四处奔走穿行：看热闹，逗乐子，大把大把地偷吃糖果，过了几天比过年还热闹的日子。

有一个插曲，十分有趣。

婚礼前的一个下午，成衣店送来了AuntLi的礼服——一件粉驼色的绸旗袍。AuntLi拿了衣服就匆匆地进卧室试穿。我和姐姐互使眼

色也马上尾随进去了。怎么能错过看新娘试穿漂亮礼服的好机会呢？只见AuntLi把衣服抖出来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蹲在角落里的两个小姑娘，面有难色。我们则瞪大了眼睛赖着不走。僵持了一会儿，AuntLi只好走到我们面前讪讪地说：“妹妹，小弟，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会儿？我不习惯当着别人面换衣服。”这下我们可没辙了，只好低着头乖乖地走出房间。

妈妈正坐在游廊上吃晚饭，听我们一说就乐了。“你们两人坐下，听我跟你们说，”妈妈一本正经地说起来了，“凡是大人换衣服、洗澡、上厕所都是不能去看的。无论如何也不准去看。这是每个人的私事。明白了？”“明白了。”我和姐姐点点小脑袋。接着妈妈又看看我，问姐姐：“妹妹，你看小弟坐在那儿，好不好看呀？”

姐姐说：“不好看。”我吓了一跳。当时我穿了一条短裙，正盘着两条光腿坐在椅子上，小裤衩、大腿都一览无遗。我赶快把腿放下来。妈妈又把我的裙子拉下来盖住腿说：“瞧，现在就好看多了。”

妈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你们小姑娘记住，肚脐以下到大腿，这一部分身体，还有裤衩，是任何人都不准碰、不准看的。只有妈妈和王妈例外。记住没有？”看见妈妈那么认真，我和姐姐连忙说：“记住了。”其实是半懂半不懂。

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行为举止规范。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在我童年早期就给我上了一堂很重要的课——行为举止规范。不但使我初步懂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且有了最早的女子自我防卫意识。防患于未然。

这次婚礼期间发生在哥哥性美身上的故事就与我们小姑娘的经

历大相径庭了。

一对新人刚离京去度蜜月，我家后花园就发生了一起不测事件：十个富丽堂皇的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假山上，一夜之间玻璃全部不知去向，碎片满地，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是谁干的？爸爸暴跳如雷，决心将肇事者“缉拿归案”。经追查，原来是哥哥学习《小五义》里的豪杰，用宫灯做打击目标，在练习武艺呐。为此性美挨了顿好打，妈妈也绝不呵护。以后妈还多次向性美提起此事说：

“这么美丽精致的物件，你不但不知爱惜珍贵，反而粗暴地将它毁于一旦，这就叫没有道德。更是败家子的作风，纨绔子弟的恶习。”

这件事性美至今记忆犹新。

妈妈说的有道理。她同样是防患于未然。

爸爸与他的戏剧活动

话说妈妈，当然不能不说爸爸。爸爸和妈妈于1924年相识相爱在纽约。爸爸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妈妈就读于著名女子大学BrynMawrCollege研究院。1926年，他们双双获硕士学位后结为伉俪，遂即返国。爸爸谢绝了各方面的邀请，决心献身自己挚爱的戏剧事业。当时中国的戏剧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1983年著名戏剧家陈白尘评价爸爸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我觉得恰如其分。回国后妈妈不但是贤妻良母，更是父亲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

回国后，爸爸最初任北京艺专戏剧系主任兼教授，后学校改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他仍任系主任兼教授。当时他刚三十岁出头，

不但精力旺盛，而且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正处在生命与创作的巅峰时期。据资料记载，他每周至少工作六十小时：教课、著书、写剧本、导演，还主持了三个在全国极有影响的戏剧刊物。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爸爸有一副墩墩实实的身板（其实他患有严重的肾病），戴着深度眼镜，总是着长衫布鞋，从不西装革履，后来又留起短须，手里还常提着一支手杖，这在当时可能是文人的一种时尚吧。而且，他总是神采奕奕，声音洪亮，笑声爽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极富感染力。爸爸除了爱戏剧，也很爱结交朋友，除了大学教授、戏剧圈内的同行，文艺界中的许多大师如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等也都是他的朋友。对待所有的朋友他都热情周到。家里常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酒席后大师们就乘兴泼墨作画，或赋诗题词。家里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氛。后来我家一大箱名人字画就是如此积累起来的。可惜“文革”时被全部抄走，不知去向。

另外，这所四合院里还经常有年轻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爸爸在艺专的学生。他们在我家吃顿“便饭”也确是家常便饭。妈妈待他们很亲热，大哥哥们和我们小孩也混得很熟。记得下午，爸爸这一批人常在后花园草坪上排戏。爸爸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比比画画、说说停停。学生们则一招一式，每句台词都不敢马虎。我这时多半蹲在草坪的角落里，听呀看呀，也兴高采烈。天长日久，那一幕幕的戏、一句句台词便也倒背如流了。有一次哥哥和王妈淘气，王妈说：“贝贝，我有什么罪呀？”我脱口就把爸爸的台词联上去了：“你的罪恶都在你的包袱里。”逗得大人们一阵哄笑。

爸爸更是一个炽烈的爱国者。20年代后期北平城政治气氛极为沉闷抑郁，北洋军阀互相残杀，倒行逆施。为此，爸爸曾创作许多话剧对他们猛烈抨击。从资料中我得知他这时曾写道：“全国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啊，你们这会儿躲在哪里？你们生在今日的中国不

觉得冷么？不觉得黑暗么？果尔，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点燃火焰？”他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一出由燕京大学学生出演的戏剧《蟋蟀》就惹恼了当时的大军阀张作霖，作者熊佛西因而被捕入狱，关了三天。他的代表作《一片爱国心》曾连续公演一个多月，场场客满。因为这幕剧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爱国热情。清华及燕京的大学生们，晚上冒着严寒步行几十里进城观看。

不但北平文艺界反映强烈，爸爸本人也深受鼓舞。熊佛西的名字当时在全国都是响亮的。

除了教学与演出，爸爸还与晏阳初伯伯合作深入到河北定县，普及识字教育并在农民中开展实验戏剧活动。据资料记载：这个活动共持续了五年（1932—1936年）之久。它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令世人瞩目。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戏剧界的中青年专家们还对晏阳初，饮誉世界的华语平民教育家，在劳动人民中普及识字及基本文化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曾因此获美国普利策大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开始在赴欧的华工中从事普及教育工作，终生矢志不渝。

这段历史饶有兴趣地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精彩的博士论文，从中吸取教益。

20年代中期父亲自美国返国后，就以百倍的热情及毅力将西方的艺术形式—话剧，移植到中国，后又大胆地将这种外来的艺术移植到中国落后的农村。令人惊叹的是：他领着一群话剧火种的播植者在农闲季节的隆冬，在河北定县搭起了舞台，设置了灯光，形成了剧场。要知道，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电灯呀！他们只好代之以煤气灯，他们创作并演出了独幕话剧《过渡》，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农民观众现场登台亮相、参加演出。这一事件妈妈后来在她的散文《灯光》中有过生动的记叙：“……那时佛西在定县农民剧场初次

试演他的《过渡》。在我国农村状况之下，农村戏剧的推进原是极辛苦的工作。而他的戏剧同志们因为要试验灯光在《过渡》出演上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深冬是比较的农闲时节，他们竟不顾一切，冒着朔风凛冽，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寒夜，将《过渡》搬上了定县的露天剧场。剧人们坚毅的主张、热烈的情绪克服了大地的一切。

那远村近舍的农人们，千百成群、自然流动，向着这剧场灯光集中而来。可爱的农人们，坦白虚怀地接受一切。他们欢欣地聚集在剧场的集团空气之下，屏息凝神浸润在剧情中，舞台上热烈兴奋的场景紧紧地系着他们的注意力。刺骨寒夜并不能威胁他们离开剧场。

星月光棱下，无边田野上，只见灯光流动，人影回环，那是多么可爱的一幅美景呀！”

这个活动经费的资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也曾派了若干国际知名人士来定县实地考察，据说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观后无不叹为观止，赞叹有加。近年，据熊佛西戏剧活动的研究者称，在西方，“吸引观众现场参加演出”这一问题，迄今未能解决。而年轻的熊佛西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河北定县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总的说来，父亲的定县戏剧实验无论对今日发达或不发达的世界戏剧都极富启示性。

记得爸爸每次去定县搞戏剧实验，妈妈也同去教识字文化等，学生们如杨村彬、贺孟斧等更是热情参与。父亲说：“农民即是今日的大众。”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呀！

父母亲去定县时，家务就由王妈主持。两个小姑娘很听话，哥哥却是猴子称大王，利用各种机会“大闹天宫”。等爸妈回来了，

小弟会不自觉地充当了泄密者的角色，哥哥为此免不了遭顿打，看着盛怒的爸爸狠揍哥哥，小弟于是又伤心地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只多了一句嘴，就会惹出这么大的灾难。

我那时还只有五六岁，许多事仅存零碎的印象了。当然谈不到对父亲这样一位戏剧家的了解，更谈不上理解。从我1930年出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七年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段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这同样是一段珍贵的记忆。

话剧《赛金花》的天折

除了AuntLi的婚礼以外，抗日战争前家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1936年爸爸编导却未获准公演的《赛金花》事件。当时北平的上空，战争的阴云已密布。街上经常有刺刀闪光，满载日军的日本军车疾驰而过，标有太阳徽的日军飞机也呼啸着在民房上低空飞行。小日本处处耀武扬威，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但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大旗，却高高悬挂在百姓头顶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常见高举横幅、高呼抗日口号的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商人们也都贴了标语抵制日货。群情激愤，这正是国歌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情景。这一切都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回到家里后院，就与哥哥姐姐一起朝天空中的日本飞机扔石头。

为什么小日本要到我们国家来耀武扬威？

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爸爸和他那些学生们，决心以话剧为武器与不抵抗主义斗争。爸爸很快地就挥笔写成大型话剧《赛金花》以古讽今，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影射当局还不如清朝“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一名娼妓。

那时，我们全家都围绕着这幕剧紧张地活动。排练日夜在我家的客厅里进行着。饰女主角的是俞珊，我仍记得她的模样，是一位白皙斯文的年轻太太，演技精湛。我小小年纪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平日鲜花盛开、井然有序的庭院，这时却放满了各种舞台布景，几乎无法通行。妈妈也是忙进忙出，借东西，制作道具，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演出日期已定，对爸爸和他的学生来说，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北平政府当局却突然来了指令：《赛金花》禁演！理由是剧情涉及了当时德国侵略军司令瓦德西，德国大使提出抗议，说有损于德国的威信。

这对爸爸和他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爸爸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学生们个个表示什么也不怕，一定要把这出戏搬到舞台上去，彻底揭露当局甘当亡国奴的嘴脸。于是家里川流不息地来了许多客人，有充当说客的，有真正关心爸爸的好心人，他们大多都是一个调子：不能与当局对着干，对着干是要吃亏的。爸爸只是紧皱眉头，却不改初衷，妈妈态度也很坚决。我当时并不懂事，但从王妈的语气中知道，恐怕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全家的空气都沉闷而紧张。

公演的日期到了，票一售而空，老百姓渴望看到爱国的作品，越是听说不准上演，越是渴望能够看到。学生们已做了最坏的打算。有了上演《蟋蟀》而被捕的教训，这次他们给爸爸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准备演完立即护送爸爸南下。但是就在演出的白天，不知来了什么人，对爸爸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后爸爸没有办法，只好放弃。

但是戏票已售空，怎么向观众交代呢？我记得爸爸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平日硬汉形象的熊佛西斯时斯地竟号啕大哭，为当时的社会现象而伤心绝望，却也无可奈何。最后他只有把自己反锁在我姐姐的卧室里（我想是因为那里最少干扰），就坐在我们平日做功课的矮小桌旁，低头奋笔疾书，写成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词。

听说当晚剧场座无虚席，观众齐心盼望着，又齐心忧虑着。演出时间一到，大幕拉开，聚光灯照射在站在舞台中央的父亲身上。

父亲慷慨陈词，说明情况，并痛斥国民党丧权辱国的政策，号召国人团结抗日救中国。言者声泪俱下，闻者鸦雀无声，讲到动情处，台下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虽然戏没有看成，但是爸爸的讲话却使观众抒发了一口平日郁积在心的闷气。大家抗日的情绪更高，思想更团结了，最后观众中竟没有一个人提出退票。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我们家中却余波未断。爸爸愤愤不平，妈妈忐忑不安，平日生气勃勃的学生们也变得沉闷起来。孩子们似懂又不完全明白，昔日的欢笑声消失了。

这已是“七七事变”的前夕了。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7—1940，天津·北平·四川之旅

“七七事变”

1937年的7月7日黎明，我被远处的炮声惊醒了。那种闷闷的隆隆之声，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幼小的心灵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而这种奇特的感觉我竟终身不忘。微明中我觉得房里影影绰绰有人在走动，在低语：“日本人动手了！”这是妈妈和王妈在低声交谈。

自此忧虑与不安笼罩了全家。爸爸的学生们有时也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哥哥则不停地跑进跑出，不断地拿来号外，报道着二十

九路军在宋哲元将军的率领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情况。人们议论着，互相鼓舞着，又思考着。今后形势如何发展？北平城可不能放弃呀！

但情况不容乐观。

我当时小学一年级刚念完，不懂什么叫亡国奴。但我却懂得憎恨小日本。

记得晚上在院中乘凉，那是一天全家共处的时间。天空中星星在闪烁。爸爸总是指定段落叫哥哥讲《水浒》。哥哥讲得绘声绘色，我却听得昏昏欲睡。

一次爸爸问我：“小弟，你愿不愿意做孙中山的女儿呀？”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老实招来：“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做熊佛西的女儿呀？”

“不知道。”

“你长大了愿意做什么人呀？”爸爸穷追不舍。

我大声回答：“我要做舞女！”这回答令乘凉的家人面面相觑。

原来此时大人们为了获得战况的最新消息每日买晚报，我正跟踪晚报上的长篇连载《上海一舞女》。

“为什么？”爸爸急着问。

“我可以穿高跟鞋和大纱裙子呀！”我振振有词。

全家都笑了，说：“小弟真糊涂。”

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糊涂呢？星星也在天空中诡秘地向我眨眼睛。

不久，深夜，孩子们都被大人惊慌地叫起来，带到爸妈的卧室。妈嘱我们坐在书桌下，大人们神色紧张，还准备了浸肥皂水的防毒毛巾。这时街上传来巨大的坦克轰鸣声。据云，二十九路军粮尽弹绝得不到给养，只好撤退了。日军会不会立即进城？大人们的惶恐心理现在我才能理解。

爸妈下决心离开北平，绝不能当亡国奴。熊佛西的名字已列入日寇的黑名单。爸爸必须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妈妈完全支持他。她自己则准备带上小儿女和王妈去天津英租界表妹德娘处，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经过一番忙乱，我们就要离开北平了。看得出大人有多么忧虑和痛苦。

临行前有件小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在后院焚烧信件，也烧掉了爸妈在纽约时情深意浓的情书。妈妈坐在烈焰前，望着腾空的火苗，国难家愁同时袭上心头，泪流满面，好像这时烧掉的是她的一颗心。爸爸见状跑到我身边轻声说：“去，小弟，劝劝妈妈不要哭了。爸爸以后还会给她写情书的。”

我劝不住妈妈。那一些浅粉、浅绿、鹅黄烫金信笺都变成了烈焰，然后化成灰烬，像白色的小蝴蝶一样，纷纷飘向天空。现在想来，也许这正是一段不幸婚姻的前兆吧！

别了，古老亲爱的北平，日寇的铁蹄声已阵阵传来。

苦涩的骄傲

就这样，我们全家匆匆奔向天津。火车上有批大学生认出了爸爸，所以一路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但是火车到达天津后，却遇到了麻烦。那时天色已晚，旅客们疲惫不堪，都急忙涌向通往租界的大桥处，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地。

要进入租界必须通过一条横跨在海河上的大铁桥。桥长约一百二十米，桥身两头有高高的铁塔，塔下面是两扇大铁栅栏门。

这时大铁门紧闭，还上了锁，不许行人通过。不论下面的群众怎样呼喊、请求，甚至愤怒地咒骂，铁塔里面的人根本不理，充耳不闻。人群越来越不安，骚动起来。这时父亲挺身而出，他说：“让我到前面去看看。”

记得父亲昂首挺胸，镇定自若，略带笑容，但绝无卑躬之色。他身着灰色长衫，手提拐杖，站到了最前列。很快塔楼上有人走动了。

有人认出了父亲，就从上面大声喊道：“是熊佛西先生吧？”“就是！我是熊佛西。”爸爸把手杖高高举起，朗声回答。于是，马上有人跑下楼来，将大铁门敞开。这样，不但我们全家都顺利地进入大门，后面的群众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涌过了大桥。

这一幕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再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

几日后，他只身告别了妻儿，仓促南下武汉、长沙，去和文艺

界的战友们会合，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了。

自此，在我一生中就不再没有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了。后来我们也曾有过几次屈指可数的短暂相处，但并没留下愉快的记忆。由于战乱和地理上的距离，父母的婚姻发生了剧变，最终彻底决裂。

父亲一心扑在事业上，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另有新欢，完全置妻子儿女于不顾，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我们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对我们三个子女来说，父亲是遥远而陌生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人生经验的增加，父亲逝世后，特别是“文革”后，我们对父亲的态度才逐渐宽容起来。

1985年，我与父亲的几位学生有了接触。特别是肖凌先生，他耐心热情、全面地向我介绍了父亲在我国戏剧事业及戏剧教育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使我能比较客观地理解父亲。1985年初冬我与丈夫张以增和儿子张力应邀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纪念熊佛西八十五周年诞辰及铜像揭幕仪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隆重纪念建校五十周年暨熊佛西诞辰一百周年，同时召开了熊佛西戏剧思想研讨会。我又再次被邀请参加。遗憾的是这次只有儿子张力能伴我前去，以增已过世。父亲的第二任夫人郑漪园女士（我们称郑姨）也已过世，妹妹熊小泓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与亲人团聚了。

在会场中，我悉心聆听上戏历届学生们的缅怀发言；他们深情又生动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几十年前，似乎微不足道而又寓意深刻的小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父亲在我眼前变得清晰高大起来。数十年来他将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艺术与艺术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戏剧工作者，其中不乏国际国内知名艺术家与明星。像他所有的学生一样，我衷心地

感谢他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所做的一切。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我年届古稀才逐渐走近自己的父亲，并从心底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是的，他不曾是一位好父亲，对家庭、子女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他置我们于不顾，不曾给我们一针一线，不曾哺育。但他对中国戏剧事业却功不可没。这次我和力儿，还有小小年纪的熊梦楚（父亲与叶子先生的孙子）相聚一起，在上海戏剧学院父亲的铜像前合影留念。大家都亲热地簇拥着。我很喜欢这些“走到一起来”的合影。时代在前进，家族也在变化。叶子先生现已九十高龄，独居北京老人公寓。*1对于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我已原谅她了，虽然她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巨大的痛苦。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人们已从敌视、生分而变得宽容和友爱了。大家都聚集在父亲的塑像前，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真理，也是令人遗憾的真理。父亲不曾是一位好父亲，但他在中国戏剧事业上的成就却功不可没。

他是这片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上海戏剧学院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他的一座丰碑。我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虽然这份骄傲里含有苦涩，含有无奈。

初到天津

言归正传，再回到1937年逃离沦陷在即的北平，安顿在天津德娘处的家居生活。母亲带着三个幼童，靠积蓄维生，日子虽不宽裕，但井然有序。三个孩子都辍学在家，妈妈是三个人的家庭教师。我清楚地记得她如何每日督促我背乘法口诀表，教姐姐写作文。

爸爸最初常有信来，不时还能寄点钱；但逐渐书信稀少，更没有了汇款。只知道他已到了成都。妈妈终日思念爸爸，有时等信等苦了，眼睛就上火充血。但她毕竟受过良好教育，是个不寻常的坚强妇女，自有一套调剂自己心理状态的方法。

*注：叶子已于2012年8月去世，享年101岁。

妈妈出自湖南一个书香大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极好。她不但擅长吟诗填词，且练出一手端庄秀丽、灵秀过人的小楷，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北京文化人圈中是颇负盛名的。据说，她少年时为练书法曾磨穿过两副砚台。记得193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也曾数次接妈妈过去为他的画题词。

此时她以填词来寄情。妈填过不少动人心弦的诗词以抒发她的民族感情与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现在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她身着睡袍，松松地垂着一根大辫子，在房中来回踱步吟唱的情景。她有几套独特吟唱的曲调，委婉优美，时悲泣，时欢畅，高低平仄犹如行云流水。我常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心悦神清，温馨无比。可惜当时自己太年幼，只顾听，不知学。待我长大后曾问过妈妈究竟什么样的词用什么样的调子配呢。她只简单地回答：“那要看了。”并没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妈此时又结交了一位俊美秀丽的新朋友。这位较妈年轻许多的女子后来成了母亲终身的挚友——以后三十多年无论是风里雨里，顺境逆境，她永远是妈忠实又体贴的朋友。老人现已年过九旬，健在于北京。虽患有严重白内障，有时还要摸索着给我写信，亲热地称我为“小弟”，絮几句家常，并深情地怀念着妈的在天之灵。她就是孙娘。

孙娘

大约是1938年我们住天津马场道时，一个冬天的下午，妈妈带着她一对小女儿往小白楼方向走去。迎面走来梁实秋伯伯，身旁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梁伯伯和爸妈是在美国时的好友，此时不期而遇自然非常高兴，他将女士们做了介绍。我想妈妈当时并没能记住姓名。但其中有一位，眉清目秀，肤色白皙，着黑色外套戴红围巾，给我这小姑娘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每日下午四时到七时，妈妈总是带我们去英国冰场溜冰。孩子们都穿着妈妈自制的短裤短裙，溜得双颊通红浑身发热，然后回家吃顿晚饭一香喷喷的菜煮饭。

一天，我和妈妈已经溜完了，妈妈正在换鞋，一位青年女子笑吟吟地向妈妈走来，说：“您是熊太太吧？我在别人家见过您的书法，端庄秀丽，太漂亮了。我非常爱慕。这个星期六晚上我想请您来我家便饭，不知行吗？”

妈马上站起来了，欣然允诺。可能她已辨认出这就是那位梁伯伯曾介绍过的朋友——孙亦梅女士。后来，我们兄妹则亲热地称呼她为孙娘。

就这样，虽是萍水相逢，她们却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友谊终身不渝。

妈当时已四十出头了，孙娘只有二十六岁，也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在英租界生活。我常听妈惊叹地说，孙娘不但美貌，且才情过人，为人也善良坦率，妈颇有相识恨晚之意。孙娘同样擅长诗词，正在练书法。她们先是诗友，待了解加深，就能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了，成为日寇统治下在天津能彼此吐露心声的知己。

孙娘活泼开朗，交游较广，经济也比较宽裕，且长期生活在天

津英租界那样一个文化背景中，她的生活方式与妈妈当时贤妻良母的生活方式颇为不同。但孙娘很爱妈妈，尊重妈妈；她给妈妈当时的苦闷环境带来了清新空气与活力。妈妈思想比较正统，是个教书先生，因此常以老大姐自居，但凡有看不惯的地方，就要把孩子们支开，关起门来与孙娘交流心声。在我的记忆中，孙娘始终洗耳恭听，雅量能容，毫不计较。门开了，她就向孩子们吐吐舌头，做个鬼脸。她们之间的友谊是在情投意合又宽松坦率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

还有件事颇具神秘色彩。记得她俩常穿戴整齐一起上街去购物。回来时只见她们买回许多小包药棉、纱布、外用药等。然后又见她们匆匆将之捆扎成较大的包。我们小孩弄不懂，也不想问。但模模糊糊觉得她们在密谋策划什么。后来待我们到了四川，妈才向我们透露当时清华大学教务长叶企孙教授在天津有掩护清华同学从事抗日工作的任务。据我推测，当时妈妈和孙娘正是尽她们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协助叶先生工作。

另有一件“名垂千古”的趣事。妈妈是个“洋先生”，生活中的穷讲究不少。大饼油条本来是北方地区最大众化的食品，她却一口咬定从大街上买来的食品不卫生，就是不准我们吃。孩子们见同学们都能大嚼香喷喷的大饼油条，唯独我们不行，就形成了童年时期的大饼油条情结。孙娘知道了，也颇不以为然。她跟妈妈说：“才出油锅的东西怎么会脏呢？明天我给你们送一篮新出锅的来。”第二天果然送来满满一篮，怕妈妈说说不干净，上面还特意盖了一块白布，真使我们小孩大喜过望。从此我家大饼油条开了食禁。知吾辈者孙娘也！孩子们怎能不爱这位善解人意的孙娘呢？

上法国学校

孙娘有四个儿女，年岁也和我们差不多，个个健康活泼、俊秀

聪明。这四位新朋友和我们兄妹很快就情投意合，玩得形影不离。

总之，全家人都结下了自然真挚的友情。

妈妈是我们的老师。看着我和姐姐一天天长大，是应该学外国语的时候了。当时她已没有经济来源，却仍咬着牙，以昂贵的学费送我们去一位英国老太太处学发音和简单的会话。她懂得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是发音，nativespeaker是最好的启蒙老师。现在我对母亲的远见卓识着实感激不尽。孙娘的四个孩子都在一所法国天主教学校里念书，小小年纪英文都很好，妈又咬着牙付了昂贵的学费把姐姐和我也送去念了一年多。那是一所以英文授课的贵族学校，每天还有一堂法文。老师都是天主教的嬷嬷。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我能进行最简单的英语阅读和会话了，在学外国语的黄金年龄，受到了外国语的熏陶。这对我一生的工作和事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校的制服比较讲究：冬天是深蓝的短呢裙，白领；夏天是浅米色的短裙。我们做不起新的，妈妈就伏在缝纫机上用旧衣给我们改制。染出来的衣服在同学中总显得有点寒碜，妈妈却鼓励我们不计较这些，说健康活泼的孩子不论穿新还是穿旧，总是可爱的。这就给了我和姐姐很大的信心，并不觉得低人一等。

妈妈总是鼓励我们勇敢面对人生！

天津大水灾

1939年，天津发了特大洪水。

记得一天傍晚，我正在大门口玩，忽见阴沟里像喷泉一样不断地冒出一尺多高的脏水。不久，整个租界都泡在水里了。后来知道是日本鬼子故意决堤放水。我们家，水先从厨房侵入，一夜之间，

升到了一楼电灯开关处，满房子都漂着杯、盆、锅、勺等物。小孩们不懂事，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妈妈却通宵没合眼，守着三个小儿女，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猛兽般地沿着楼梯一层一层地爬上楼来。亲爱的妈妈，当时你孤单一人，有多么忧虑，多么害怕。但一到白天你又是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了。

吃什么呢？今后怎么生活呢？我们被围在大水里好几天。正在走投无路想不出办法来的时候，孙娘自天而降，和一位朋友划着一只橡皮艇冒着特大洪水来看我们了！她一直划到我们的小楼前，问寒问暖问平安。她知道妈妈已经十分困苦了，特送来二百元，又匆匆离去。

这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妈妈的燃眉之急。

正因为有了这二百元，妈妈下定决心，带我们兄妹逃离泡在大水里的天津。

但怎么走呢？

德娘的小楼前有个中学操场，此时操场上的篮球架已漂浮起来。不知是谁出了个聪明主意：把那两块篮球板用粗绳捆在一起不就能拼成一个木筏了吗？当时妈已别无出路，只能背水一战、铤而走险了。她决心乘“篮球筏”离去。

一个清早，妈带着王妈和三个孩子勇敢地登上了这个“诺亚方舟”，找了个撑杆，开始漂流。孩子们不准乱说乱动，只能规规矩矩坐着。漂呀，撑呀，终于漂到了天津火车站附近。一路上只见一片汪洋。平日熟悉的街道都被大水淹没，只露出房顶和电线杆的尖，早已无法辨认。记得一路上我们只得高声向两旁被围困在楼上的居民们问路。人家看见乘坐自制木筏的这一家，便也热情指点。

就这样我们终于逃出去了。

假如，假如当时某个孩子不慎掉下水去了，怎么办？

假如，假如木筏撞在什么障碍物上散架了，怎么办？

假如，假如整个筏子倾翻了，又怎么办？

当时确实存在着无数的“假如”与“怎么办”，我想起来都后怕。难道妈妈就不怕吗？

但她坐在木筏的一头，镇定自若，甚至还有几分冒险前进的欣悦与兴奋。我的母亲在危难时刻，总是充满信心，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对她当时的决心与勇气总是十分崇敬。

长大成人后每逢大事，也总是从母亲的行动中汲取勇气与决心。

母亲的无畏精神是她留给子女们的一笔极宝贵的精神财富。

重新“漂回”北平

一场水灾后，我们又漂回北平了。惊魂未定，可今后何处安身、何以维生等问题，又迫在眉睫。

记得刚进北平，就觉得这座往日熟悉的城市已变了样，空气压抑沉闷，失去了原来的活跃与亲切。

街道上的车辆行人冷清，行人多半低着头，步履匆匆，往日那种谈笑自若、怡然自得的神情也消失殆尽。不时还看见腰上挎着“匣子”、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及迈着小碎步、弯腰驼背的日本妇女。路边新添了大烟馆，鸦片味儿一直飘到大街上。妈妈

说：“北平已像一座死城。”对这一切我们只有视而不见，心情紧张地直奔邱伯母家。

邱伯母张开双臂迎接了这一家落难的朋友。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分离备感亲热。邱伯母腾出最大一间房给我们母子四人。于是小孩子们又开始了无忧无虑、热闹活泼的生活。我们根本不迈出大门一步，大门外就是小日本的统治、太阳旗的天下。孩子们都愿意离它远些再远些，根本不愿去上学学日语。妈妈也深居简出，多半时都伏在缝纫机上给我们改制旧衣服。

邱伯母家也是一个单门独户的大四合院，像我们的故居一样，院里也有座假山，院中央也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中秋节来临，天朗气清，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爬到树上摘梨，比赛谁爬得高，谁的梨大，一片欢声笑语。晚上一轮明月升起，孩子们又依次拜兔儿爷、兔儿奶奶，两尊小泥塑慈眉善目笑嘻嘻地看着这群小淘气，给以亲切的祝福。记得供桌上还烧了几炷香，香烟缭绕，邱伯母和妈静坐赏月，相对默默无语。她们心里肯定在思念远方的丈夫，更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家庭的前景。一切都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母亲们的心上不知积压了多少抑郁与焦虑。关起大门来，这里暂时还能赏月；但大门外却充满了压迫与反压迫默默的抗争、屈辱与挣扎。

这是动乱时代沦陷后的北平，又是一个典型的北平风味的中秋节。不知为什么它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邱家小燕子这时有新本事，她会画卷发的洋娃娃了，栩栩如生。我和姐姐也马上跟着学起来，也很成功。后来我们更创造出一种新办法：把娃娃画成只穿内衣的样子，然后用彩色铅笔按她的身材尺寸画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衣服。凡是我们想要而又买不起的漂亮服装，我们都能精细地画出来，然后剪下挂在纸娃娃的身上，这时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

妈妈对我们这项活动给予很大的鼓励，她总是笑嘻嘻地欣赏我们的“新作”，有时还要在配色等方面提出意见。她说：“妹妹和小弟可有一手了。小姑娘会想衣服样子，懂得配色，懂得比例，这是一种本事，可有用了。”可惜姐姐和我都没成为服装设计师。当时也没有这个专业。但是多少年后当我成为语言教师，常能在黑板上随手画出人物呀，某种行为或表情呀，来辅助我的教学，活跃教室气氛。我的同行与学生们都很欣赏我这一手。有时竟然会在教室里为我鼓起掌来。这时我总是从心底升起对妈妈的感激之情。

在朋友家住得时间太长妈妈感到十分不安。在日寇统治下，中国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非常困难。大米是发了霉的，而且还要配给。每日晚餐后一家人总是围坐桌旁挑出霉米和砂。不久我们就搬到母亲的嫡亲姐姐李姨妈家去住了。

北平旧居与散文《灯光》

此时，我们的旧居罗圈胡同16号正由张大千先生之兄住着。

父母亲仓促离开北平时曾将一些宝贵的书籍与字画都珍藏在旧居，请张先生代为照应。为了不打扰朋友的安宁，我们此时当然不能再回旧居，只能暂居李姨妈家。恰巧李姨妈的住宅就紧靠在我们旧宅的后面，旧宅“双照堂”高高的北窗正俯瞰着李家的庭院。

记得母亲常在暮色中站在李家廊沿下凝视着前面那所灰色砖房后窗里透出的缕缕灯光，黯然神伤。我们那时都年幼，到了一个新环境，好奇而兴奋，哪里懂得妈妈的所思所想。而时至今日，当我也进入古稀之年，回忆妈当时所处的尴尬境遇，就能想见她的抑郁之情了。

在李家的庭院中，面对的正是她三年来魂牵梦萦的故居背影。

在那里她度过了十年美满的家庭生活；她和丈夫精心布置了每个角落，亲手种植了不知多少花木，那终日回荡着的儿童嘻笑声，还有朋友们欢畅聚会时所留下的精彩篇章，这一切都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然今日，故居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却可望不可即了。故人虽已归来，却不便推门入内，只能遥望兴叹。母亲此时怎能不思绪翻滚，百感交集？

写到这里，容我的笔随我的思绪再次登上岔道，直奔母亲的散文《灯光》而去。

若干年后，当我们抵达了四川成都，母亲才有机会用她那饱蘸沧桑的笔倾诉出1939年寄居李姨妈家时的感触。那篇优美又深邃的散文《灯光》，发表于1941年《成都日报》的副刊上。开篇第一句便是那熟悉的场景：

“黄昏，前面格子窗又透出灯光。”

接着她写道：“……这座灰砖的古老旧宅，依然屹立，对着这沉沉苍穹，似乎也感觉无聊。它每天遥望的横碧西山，已被暗云遮没了，这使它孤索，更使它萦念那山深处蕴藏的一切暗中波动，和留下的血迹、愤慨、眼泪、伤痕。不过这房子历世已深。它已久经风雪，见过几次兴亡以及许多人世的升沉演变。在今日压迫的环境下，它忍痛低回。”……短短的一段文字，母亲借物抒情，道出了当年在日寇统治下的痛苦愤懑与无奈；也暗自描述了她对西山抗日力量的深切同情。

记得在李姨妈处，妈曾借故去旧居一次，整理旧物，探视故居。所以在文中她又继续发展：“……可喜的是灰砖、旧瓦、廊柱、台阶和周围的一切还没有改变多少旧时模样。这其间似有一种大力，深沉蕴藉，暗里撑持……”

寥寥数语，不同样是妈当年深沉刚毅的精神写照吗？她在日寇统治下，带着三个稚童，不但生活无着落，流离转徙了三年，尝味人间的苦辣水火……丈夫也极少音信。但她始终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地应付着环境的恶劣变化，从不见她悲观，失去信心。母亲始终期盼而且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她绝不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会灭亡。在最困难的处境下，她也总是乐观地“想想办法”，咬紧牙关。

也正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她描写北平的天色如斯：“天色昏沉，好像酝酿着一场紧迫的风雪。偶尔从云隙里渗出一线淡薄阳光，却又逗引人盼望开朗的明朝天色。整个笼罩的空气里藏着的忧郁、痛苦、反抗、撑持，而又掺和些耐人摸索的快乐和希望。”在这一段的结尾，她又无比深情地回到故居后窗所射出的灯光上来：“在这充满飞尘黯淡凄凉的暝色里，几扇格子窗上的灯光更显得光棱。晕黄溶漾的光圈里，似乎幻出三年前这格子窗内灯光下的融融笑乐，稚语欢情。”这里，妈妈那颗慈母心又再次陶醉在亲情的回忆之中了。

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乱，母亲那本散文集《灯光》早已不知去向，朋友和熟人谁也不再提起它。但近十年性美和我却总在希冀着，盼望有朝一日能找到它。毕竟那是妈妈在困难时期的心声啊！冥冥中也确似有谁在相助：这本书在2000年冬竟然由我们的老学长、父亲的门生肖凌先生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当我再次手捧着这本书时，真是欣喜若狂。失宝复得，这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啊！

重读母亲的遗作，我终于走进了她当时的心田，分享了她的情怀与殷殷期望。正是对于故园的眷恋，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民族胜利的期盼，才使她无法忍受在沦陷区做顺民的屈辱。她决心带孩子们跨越万重关山，投奔抗日的大后方。

这就是母亲，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不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才筑成了我们抗日的钢铁长城吗！

大毛姐、小毛哥

言归正传，再来叙谈我们“漂回”北平，寄居李姨妈家的生活吧。

李姨妈是妈的二姐，体弱多病，此时姨丈在贵州，姨妈带着两个大孩子定居北平，也是靠积蓄维生。但姐妹情深，姨妈见妈妈当时狼狈的处境，就执意要收留我们。

这时的家务由十八岁的表姐一聪颖秀丽的大毛姐主持。小毛哥约十六岁，长着满脸雀斑，活泼好动，快人快语。姐弟两人都辍学在家，不愿去上日本统治的学校，更不愿学日语。这时他们在家干什么呢？

他们终日在家练习钢琴，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大毛姐训练有素，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小毛哥虽说没受过多少训练，但有才气，只要大毛姐弹什么，他就跟着学什么，请不起老师，自己苦练。他不但弹得流畅自如，琴声中似乎还多一份激情。妈妈对有才华的青年人总是非常欣赏，她不论手头做什么事，耳朵总是兴趣盎然地听他们的弹奏。

我们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生活了近半年。每天清早在大毛姐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小毛哥的琴声中入睡。记得妈妈曾对我们说过，他们在弹巴赫的练习曲。啊，这些美妙的练习曲呀，因为听得太多了，其中许多段落我现在还能哼出来。遗憾的是以后我很难有机会再听到了，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有一次我跟妈妈说：巴赫的练习曲左手和右手好像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在爬楼梯，他们永远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后面的总追不上前面的。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前行，步伐不完全一样，风格却一致。因为整天听，小小年纪的我也体会到巴赫作品的一种对称的美、一种整齐规律的美。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我这两位年轻的表姐表哥，虽然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再看见他们了。我也要感谢妈妈，是她使我静下心来聆听，是她带领我开始接近音乐，热爱音乐，并使我能终生享受音乐。

准备远行

不知从何时起传来风言风语，说爸爸在四川另有新欢。起初妈妈对这样的谣言一概不理，她自认为很了解自己的丈夫，她无限地信任他，总说：“一个搞戏剧的，总免不了和女演员有些来往。我怎么可以为这些闲言碎语就对他产生怀疑呢？”但是书信毕竟越来越少，有时半年也不见只字片语。难道重重关山真的隔断了浓浓夫妻情吗？妈妈陷入了深深的苦闷。手边的积蓄早已告罄，今后怎样生活下去呢？哥哥一日日长高、长大；小毛哥已接近日本鬼子的征兵年龄了。怎么办？

正在这时，原北大教授周作人，已在日本伪政府做官，找机会见到了妈妈，想笼络妈妈去伪北大兼课。他说：“你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我现在也在北大做事，你何妨也来北大兼点课，可以缓解一下生活。”妈妈微微一笑，软中带硬地说：“谢谢周先生的好意。”

我的日子还过得去。我丈夫熊佛西正在四川抗日救国，我怎么能在这里给日本人教书呢。”妈妈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她的凛然正气使周作人悻悻然离去。

这一切终于使妈妈萌发了新的想法—带着孩子们去四川找丈夫，投奔抗日大后方！再拖下去夜长梦多，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

多的。但从有这个想法到付诸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妈妈不断地思考着，向熟人打听四川的生活情况，该怎么走？什么路线最合理？要做什么准备？从哪里筹措路费？等等。

她知道未来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变化，为此她特意围起围裙，下厨房认真学习烧饭了。

1939年冬天，妈妈给我们都注射了各种防疫针，买了些必备的用品，准备带着孩子们远行去四川。

母亲的名字

离北平前妈妈还念念不忘爸爸的四十大寿即将到来，她深情地筹划着要千里迢迢送上一份不寻常的礼物：特意去齐白石老先生家讨了两枚图章、一幅画。记得那是一对铜章，章顶各端坐着一头狮子，古朴又生动。印面是齐老先生亲自篆刻的，极其精美。那幅祝寿图是一对喜鹊站在两座岩石上，头微侧，两相望，似夫唱妻随。

岩石下有一朵大黄菊花，孩子们说那是性美，还有两朵鲜艳的大红菊，那当然是我们小姑娘啦。遗憾的是这两样精美的礼物，由于婚变，妈妈始终没有机会送给她的丈夫，只好一直压在箱底。抗日胜利后，我们搬到珞珈山，这幅画就一直挂在客厅里，受到全家人的喜爱与众多客人的赞美。后来它又随母亲去了天津，“文革”中遭到厄运，被人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说到妈妈对爸爸的深情，还有一件事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

爸爸1937年由天津仓促南下参加抗日活动，临行前在天津的手稿都托付给妈妈了。妈为了给孩子们取冬衣及杂物，数次往返于平津两地，别的东西她都无所谓，只是爸爸的文稿总是随身携带，巧妙地通过日军检查，而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1940年我们全家由天津启程南下赴四川。在天津大沽口上船时，行李等须经日军岗哨的严密检查，如果爸爸的文稿被发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当时孙娘力劝妈把文稿留在天津英租界，由她妥为保管。但经过再三斟酌，妈还是决定亲自携带，特别是那份《我的戏剧生活》。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找关系通过爱国船员的掩护才能顺利避开日军检查的，妈还多次向儿子吐露心声：“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你爸爸的嘱托。”

遗憾的是爸爸此时在四川早已另有新欢。我们子女不是父母婚姻的审判官，无法断定孰是孰非。我现在只觉得战乱是父母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其次，他们两人对婚姻的态度与理解也有很大不同，我不是指在理论上，而指在实际生活中。

母亲对婚姻爱情，可谓忠贞不渝。她的名字“朱君允”，就我推度，就蕴含着“君子千金一诺”的意义。

母亲出身于湖南望族，各房兄弟姐妹众多，按辈排序她起名为“朱驕”。但这“驕”字很生僻，在学校里曾引起不少麻烦。毕业后她就自作主张，改名为“朱君允”。就我现在的理解，“君允”含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千金一诺”的意思。这说明母亲步入社会后为自己待人处事订下了标准，她要自我塑造人格，要求自己言而有信，坚守诚信。

父母1924年相爱于纽约，一年后父亲正式向她求婚。母亲自青年时代就专心学业，无暇谈婚论嫁。等遇到意中人熊佛西时，年龄已长于男方，故而犹豫不决。写信回国征求家人意见，遭到众亲友反对。就朱家人看，母亲是名门闺秀中的佼佼者，而父亲出身农村，是茶商之子，名不见经传；门不当户不对，婚事有违常规。父亲却十分执著，激情澎湃，虔诚地拜倒在母亲丰富的学识及风流文采之下。客观地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受高等教育又留洋求

学者确是凤毛麟角。父亲曾痛哭流涕向当时也在纽约求学的母亲胞弟朱骞表示：“此生非君允不娶”，“若天公不作美，允姐不能嫁我，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母亲此时也深爱父亲的出众才华及热情勇敢。受着五四精神的熏陶，她心中追求向往的正是自由恋爱，希望婚后能过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生活，对做大户人家的阔太太毫无兴趣。于是她力排众议，毅然答应了父亲的求婚。就这样，1925年6月1日他俩在纽约一教堂结为连理。婚后回到祖国曾有过一段令他们双方都十分留恋的美满婚姻生活。

纵观母亲一生，真像她给自己所起的名字一样，无论对家庭子女，还是对事业工作，她都恪守诺言，忠贞不渝。

言而有信，古典的朱君允，真乃君子也。

万水千山总是情

容我的笔再回到1940年，我们由北平、天津，经万水千山去四川成都寻找父亲。

经过深思熟虑，妈终于带着孩子们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途。前面可能碰见什么艰难险阻呢？不知道。但妈妈的情绪却很高，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要行万里路，过万重山，克服一切困难去投奔抗日队伍，去寻找爸爸。我们要去追求光明，开始新生活。

她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大家。箭在弩上，孩子们都整装待发。

同行的还有小毛哥，他要万里跋涉去重庆投考中央音乐学院。

还有一位小毛哥的好友邓稼先与邓三姐。当时邓只有十五六岁，敦敦实实，言语不多。孩子们也挺喜欢这位敦厚的大哥哥，妈妈热心快肠，很乐意与邓家姐弟结伴而行。这一行浩浩荡荡共七

人，都是些少年人，唯一的成年人就是妈妈，她是我们大家的领队。

最初一笔旅费是母亲金陵女大时的挚友，北平的赖伯母资助的。她虽寡居，仅靠积蓄维生，却为妈妈慷慨解囊，动用了一笔储蓄。孙娘知道妈妈缺旅费，也很乐意地资助了一笔钱。妈妈这一生，每逢关键时刻，总能得到挚友的热情帮助。也许这与她自己热情豪迈的交友之道有关吧。

后来，待我们长大成人后，她曾尽可能地将这些债务做了一定程度的偿还。我说“一定程度”是因为其中的深厚情义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偿还的。

在塘沽，我们登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英轮，第一次看到大海，体验到海上生活。由于战乱，我们只能绕道上海、香港，途经越南的海防，再转道昆明、重庆，才能抵达目的地——成都。

海上波涛万顷，有时风浪大作，轮船上下颠簸。开始我们都有点晕船，但后来因我们小孩很活泼，四处观看，又跑又笑，不知不觉晕船就被克服了。

记得一天清晨，天还漆黑，妈妈就兴高采烈地把我们都叫醒了。她带着六个孩子迎着海风爬上甲板去看海上日出。只见黑茫茫的大海水天不分，只有东方出现一线鱼肚白。刹那间天空变成了粉色，东方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再一会儿，一个大火球就跳跃着，冉冉升起。这时天色已大亮，海上铺展了一条金光大道。我们的轮船又沿着这条金光大道乘风破浪前进。

孩子们跳呀，叫呀，热烈地欢迎这新的一天的到来。妈妈在初升的阳光下也欢畅地笑着并热烈地鼓掌。她为这初升的太阳，为她心中新的希望热烈鼓掌。她显得多么年轻呀！

有一次为好奇心所驱动，小毛哥还有我们兄妹三人都溜进了大菜间（当时的一等舱）去见见世面。谁知叫茶房（当时的服务员）逮住非要撵我们走。我们几个人不服就大声地和他理论起来。这一来惊动了船长，一个白头发的英国老头，他从船长室中走出看看究竟。嗨，原来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姐姐和我还会诘两句英语，此时不慌不忙地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船长一听可乐了，请我们到船长室，又是茶水又是甜点，好好地款待了一番，最后还赠我们一盒巧克力，客客气气送我们出来。有了这番奇异的经历，我们忙跑回舱中向妈妈述说，她也开怀大笑了一场。

总之，第一阶段的海上生活在妈妈的带领下，嘻嘻哈哈地过去了。

懂事的哥哥

到了上海，我们在熊希龄夫人毛彦文女士家里逗留了数日。毛娘此时正独居上海，给我们一家以热情招待。

就在这里，发生了不测之风云。

一天，哥哥突然接到爸爸来自四川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他吓愣了，几乎不敢相信以为真。爸爸要求和妈妈离婚，说感情不和，还要求妈妈不要带着孩子们到四川去找他了。哥那时不满十四岁，却相当成熟懂事了。他不知怎么办好，经过一番考虑就把信先给毛娘看了。毛彦文女士早有所闻，阅信后就跟哥哥说：“不要把这封信给妈妈看了。我们大家都鼓励她吧。你们继续前进到四川去找你爸爸吧。”

这样，年仅十四岁的哥哥就把这件事瞒下来了。小小男儿，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一路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手上肩上总争取多

拿点行李。妈则浑然不觉，继续前行。

助一臂之力

船到香港，许地山和夫人周俟松（我们小孩称六娘）早已等候在码头。六娘麻利干练，亲自驾车接我们去她家住几天。

许伯伯是爸爸在五四时代燕京的同窗好友，后来在美国同学，回国后又在燕京同事；他和六娘的婚事是妈做的红娘，因此他们之间的情谊绝非一般。但最令我们小孩难忘的却是许伯伯这位孩子王，见了小孩就异常欣喜。他有讲不完的故事，妙趣横生，还会唱悦耳动听的民歌，《蜜蜂歌》就是他一句一句教给我们的。抛皮球、踢毽子他都样样在行。只要许伯伯在，我们三个孩子总是欢天喜地。此时异地相逢，双方都十分兴奋。许伯伯与六娘有一子一女，年龄也与我们相仿。

也正是在香港，妈亲手接到了一封父亲的来信，信的内容与上海来信完全一致：要求离婚并阻拦妈带我们去四川找他。这不啻是晴天霹雳，妈读后无法自己，一时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她立即将信给许地山夫妇看了。他们也大为震惊。但两位态度都很坚决，对妈妈说：“君允啊，你带着孩子们继续到四川去吧。佛西是一时糊涂。”

等你们真正团聚了，情况就会好转。不要紧的。”他们与妈彻夜长谈，帮助她策划如何经越南去昆明抵四川的旅行路线。又估计到妈手中旅费不够，主动支援了一笔钱，以防万一。有了知心好友的宽慰，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妈心里稍稍宽松踏实了一些。

母亲当时所遭受的打击，迥非一般。国难当头，她只身鼓足勇气拖儿带女，欲投奔抗日。殊不知丈夫已移情他人，提出离婚。回北平吗？既无经济来源，又无立锥之地。继续前进吗？人地生疏的

四川，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进退维谷。人生真是诡秘莫测。但此时勇敢的熊太太，在孩子面前守口如瓶，毫不动声色。当日还在六娘的陪同下带领我们游览了香港市容。

还有件事我终生不能忘怀。

许伯伯很心疼这三个几乎要被父亲遗弃的孩子。他在百忙中抽出一天带着我们兄妹还有他自己的孩子，一起游览了香港的山光海色。我们坐着缆车俯瞰了蓝色的海湾及连绵起伏的绿色山峦，大家都陶醉了。香港整齐干净的环山公路也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在山路上跑呀，笑呀。许伯伯自己就像一个大孩子，他也脱去长衫，无拘无束，不断地跟我们开玩笑、赛跑。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伯伯！

这是多年来我们与许伯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相聚。许伯伯于40年代初期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但他留给孩子们的印象是一团熊熊烈火，发热发光，温暖人间。

啜泣的妈妈

父母婚姻的变故，当时我和姐姐确实一无所知。小毛哥与哥哥也佯装不知，还是嘻嘻哈哈，但他们两个大孩子对妈妈都更加爱护体贴了。关于香港来信妈妈在孩子们面前只字不露。她总是镇定自若，精神奕奕，是我们大家的好领队。而且由于她和蔼可亲，举止优雅，旅客中谁若有了困难，只要有可能她一定伸出援助之手。因此，在旅途中总是得到其他旅客的喜爱与尊重，也得到了别人不少的帮助。

我们一行继续乘海轮，向越南海防驶去。

一日我午觉醒来，突然发现妈妈正坐在对面的舱位上掩面而

泣。她穿着一身黑衣，两手紧紧地捂住脸，却一点声音也没发出。

从她剧烈抖动的双肩，我立即看出，妈妈在哭，我从来没见过妈妈这样，出什么事了？

我很想爬过去，搂住亲爱的妈妈。但我的直觉又告诉我她有什么事情不愿意我知道。我不敢动，更不敢问，只是手脚冰冷，心里模模糊糊地觉得与爸爸有关。

怎么回事呢？连哥哥姐姐也不敢问。但我的心为妈妈而疼痛。

这时轮船正向海防驶去。波涛万顷的大海上正有一位暗自啜泣的妇女，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向不可知的远方驶去。

滇越路上

海防是一个又脏又乱的热带城市，沿街长着高高的棕榈树，散布着一些咖啡摊。海关人员随意对旅客敲诈勒索，妈妈走在街上时，手提袋也被人抢跑了。

两天后，我们乘上了滇越铁路的硬座车厢，又开始了长途跋涉，向昆明驶去。

车上不供应饭食，好像开水也没有。妈妈就在海防买了一箱饼干，以便充饥。谁知天气闷热，没两天饼干就变味变皮了，谁也咽不下。我又犯了胃病，嘴里直冒酸水。这样就只好多喝开水，或买些水果果腹。尽管条件艰苦，路途又长，我们还是热热闹闹，又结交了新朋友，饶有兴趣地观看并议论着沿途的风光，在硬座车厢里不断地晃荡着。

印象深刻的是有天晚上，车驶到中越边境的地方，铁路突然断了。旅客需下车步行千把米，才能转到另一列火车上去。记得那夜

天黑云暗，什么也看不清，只依稀看见铁轨两边都是高山峻岭，阴森森的，脚下却是凹凸不平夹杂着小石子的泥巴路。借着别人的手电光，妈妈不断地鼓励我们：“走呀，孩子们，往前走呀，跟上大家。”于是我们都振奋起来。旅客们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着，黑压压的一片，终于搭上了另一辆火车。

关于这段夜行，妈妈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过一篇短文《滇越路上》，也收在她的散文集《灯光》中。

昆明及金岳霖伯伯

一天黎明，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那可怪有趣的。妈妈说金岳霖伯伯会来车站接我们，嘱咐我们不可乱跑，就坐在位子上不准动。

因为海防的扒手、强盗我们都领教了，生怕再出问题。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完了，我们这一家还一动不动地傻待在车厢里。天色大亮后，只见一位又高又瘦的伯伯，戴着顶运动员似的帽子上这节车厢。

他老远就嚷起来了：“哎呀，君允，你可真叫我好找！我先在月台上嚷：熊太太！熊太太！没人理。后来我又喊朱君允！朱君允！还是没人答应。着急了，我只能大呼你的小名‘大佗’，‘大佗’（金伯伯还用的是湖南腔，喊成“带多”），还是没动静。怎么办呢？我急了，只好跑上车来一节节找。原来你这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躲在这里不动呀！”

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昆明，我们全家得到了金岳霖与叶企孙二位伯伯无微不至的照料。临别时，我记得金伯伯对妈说了句话：“到了成都有困难给

我来个电报，必要时我去找佛西和你。”他一定也知道了妈当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多么热心体贴的伯伯。那一代知识分子深明民族大义，也深刻地互相理解，无私地互相支援。正是靠了这些热心肠的朋友，妈才能在艰难险阻中挺过来。

在昆明，我们和一路同行、生机勃勃的小毛哥分手告别了，相互不胜依依。他要先去贵阳找父亲，再去重庆考学校。稼先是与我们在上海分手的。

从昆明，妈妈带上我，哥哥带上姐姐，分两批飞往重庆。临别前夜，哥哥才将爸爸上海来信一事告诉了妈妈，要她有个思想准备；妈妈也将香港来信告诉了哥哥。一张窗户纸捅破了，一家人的心更加贴近。

后来妈妈多次向人提及此事，说儿子很懂事，甚感欣慰。

永远的灯光（中）

1940—1942，成都

婚姻破裂

1940年在成都父母初次见面是在华西坝晏阳初伯伯家。那是很痛苦的一幕。

就在妈妈和我抵达成都的第二天早上，爸爸从晏家院外迈入客厅。他留着稀疏的胡子，面带愁容，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看见了我，眼眶便湿润了。我却呆若木鸡，手足无措，也不知道应该走过去和爸爸亲热一番。半天，妈妈才从里屋走出，也是默默无语，泪流满面。我们三口人都沉默着，空气好像凝固了。

爸爸接到晏伯伯从重庆带来的口信，已先期在成都盐道街成都师范学校为我们借得四间房，当晚我们就住了进去。我一人睡在后房，透过薄薄的木板，听见父母低声说了一宿话：他们又说，又争，又呜咽，又劝慰。我也一夜不眠，在小床上蜷缩成团，泪流不止，手脚冰凉；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不安，更心疼我的妈妈。当时我刚九岁。

父母不和，父母吵架，甚至父母离婚，这都是常有的事。但父母都是成年人，他们还能承受得住这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局面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痛苦，他们更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且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第二天，爸爸在川菜馆“姑姑晏”请了几桌酒，为妈妈和孩子们接风，看得出他很为妻子与儿女的到来感到骄傲。

爸爸那时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创办了四川省立音乐戏剧学校。他有时来成都看看我们，态度还挺亲热，也做出许多承诺。但他一回到郫县，见到他那位相好的，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再次提出离婚要求。父母关系这样好好坏坏，持续了半年。记得有一次，爸爸带信来要接三个孩子去郫县看《女店主》的演出。妈妈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了。那时还兴坐鸡公车（一种独轮木推车）呐！学生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走出很远迎接我们。看得出他们都很尊重妈妈也很欢迎妈妈，对孩子们更是非常亲热。这样我们又交了许多大朋友。

但是爸爸一见妈妈就沉下脸来问：“你怎么也来了？”妈妈说：“孩子们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来？”

白天爸爸和我们共进三餐，但一到晚上他就不知去向，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谁也不愿意问什么。一日哥哥在饭桌上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爸爸竟大发雷霆，摔碎了一把瓷匙，愤然离去。于是一家人不欢而散，我们又回到了成都。父母的关系愈加恶化。

不久哥哥去金堂铭贤中学寄宿了。因为儿子初次离家，妈妈每月都要去探视一次。记得有次妈妈去金堂了，爸爸突然回来看看两个女儿，还带了包点心。他在房里四处翻翻看看，还嘱咐我们不要告诉妈妈他来过。为什么？弄得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对父亲的感情变得很复杂。每次他见到我们，总是很激动，很亲热，总是称我们“乖乖”、“宝贝”，但这种热情却瞬间即逝。孩子们觉得他遥远而生疏，不可理解。

以后由于国民党对学校民主空气的进一步控制，爸爸在郫县办学办不下去了，遂离开郫县去重庆，后又赴桂林。

自此爸爸再也无信来，他永远地从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消失了。

父母没正式办过离婚手续，也从未再见过面。人们仍称妈妈

为“熊太太”，但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从这时起，妈妈毅然独自一人担负起哺养三个子女的责任。生活很艰苦，日机常来狂轰滥炸，物价飞涨。由于四川气候潮湿，我们从北方初到，水土不服，经常生病，打摆子、拉痢疾。姐姐和我头上还生了虱子，半夜妈妈还要爬起来为我们捉臭虫。哥哥也从铭贤中学两腿长满了脓疮回家，也是一身虱子。妈妈只有咬紧牙关，奋力照顾我们。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谋生养家，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三头六臂拼力全顶下来了。

听说爸爸在桂林曾扬言：朱君允不是一般的女子，她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成人。言下之意他自己可以拂袖抽身而去。

妈妈听后没在孩子面前多说什么，只是咬牙切齿地骂了句：“小人！言而无信，不负责任的小人！”也许这是妈妈对爸爸人格所做出的评价，确实很严厉，但也不无道理。

从此，在家里我们很少再提及爸爸。

新的生活

从1940年到1942年，妈妈回到她的母校一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开始教书谋生。我记得她教的是西洋通史及英国文学等课程，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吴贻芳校长原是妈妈20年代的老同学，更是一位自强、自立的女科学家。她很重视妈妈的学识，也非常同情妈妈的境遇，因此对妈妈关怀备至，经常进城来我家串门谈心，鼓励妈妈。

当时，在学校里有两位中国女教授，学生们都尊敬地称她们为“夫人”。一位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夫人；另一位就是这位“熊夫人”。由于学生的崇敬和校长的鼓励，妈妈

很快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自强自立，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奋斗精神。她燃烧着，似乎忘记了疲倦与婚姻的不幸。

除教书外，“熊夫人”还热情地参加了同学们大量的话剧演出活动，被聘为艺术指导。除了指导学生的排练，她还四处奔走借道具、搞布景，身先士卒，一丝不苟。短短两年内，金女大的同学们演出了《日出》、《茶花女》、《女店主》及好几幕抗日题材的大型话剧。每逢演出，华西坝内四所大学的学生都前来观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台上的演员演得出神入化，台下的观众则如醉如痴，我当然也是一名从不缺席的观众。在我的印象里，这些文艺演出简直比当时的美国电影还受欢迎。而这一切也逐渐帮助妈妈淡化了心头的创伤。

妈妈的活动还远远不止这些。晚上等我们都睡下了，妈妈在灯下又精神抖擞地提起笔来，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优美散文。她尽情地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倾诉对生活的观察与体会。记得其中有几篇她记叙了我们从北平到四川长途跋涉时的所见所闻；也有几篇描写她所熟悉喜爱的亲朋好友；有她满怀深情对亡友的悼念；也有她对逝去年华的回忆。她的文笔清新优美，有着女性独特的亲切细腻，宛如娓娓清谈，文章中还充满了沉稳的大气和乐观情绪，很难想象作者当时心灵所受到的伤害及所处的困境。作品当时陆续地发表在《成都日报》的副刊上，后收集成册，题为《灯光》。

为这本小册子作序的是陈西滢。^[1]陈伯伯博学多才，学贯中西，原是爸妈在北平时的旧交，此时有机会从四川乐山来探望我们全家。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陈伯伯着长袍，戴无边眼镜，一派儒雅风范，他向妈妈问寒问暖，聊家常；和孩子们轻松地说笑，还特意问及我们都看些什么书等，自然而和蔼。从这位长者身上姐姐

和我都隐约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妈妈则拿出近作，请他为散文集写一篇序，他欣然允诺。

这篇序，陈伯伯写得极有特色。书中的内容，他并未多提。他只用很亲切的笔触记叙了在成都的会见。他说他访问了一个家庭，女主人单独带着三个孩子艰苦度日，却依旧乐观坚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结尾时他写道，从那个温暖家庭中离去，走入黑夜，回头还能看见房中所射出的橘黄色的灯光。序言并不长，却精练而又艺术地勾勒出作者当时的精神风貌。

橘黄色的灯光，温暖的灯光，多少年来它始终照射在我心上。

绚丽多彩的小学生活

1940年的秋季，成都的孩子们都重返学校。三年多颠沛流离、辍学在家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华西分校位于成都南郊，华西坝的后面。从外表看这是一所很简陋的农村小学，茅草房顶泥巴墙。但是学校却拥有一批有热情、懂教育的教师。初去时姐姐上六年级，我上五年级。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丰富多彩的生活。

学校距离家很远，大约有十几华里吧，这对今天城市里的儿童而言简直不可想象。清晨，我们总是在薄薄的雾霭中从盐道街出发，翻过一座高高的城墙，再踏上一座百米长的大木桥。府南河的河水哗哗地在桥下流淌着，延伸不断的河滩上铺满了黄灰色细沙及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间或还可见年代久远已被河水冲刷成白色的骷髅头。过河后，就来到华西坝一四所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自有另一番景色，校园内四处都是整洁碧绿的大草坪，还有宫殿式的教学大楼。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一座高耸的精美钟

楼，以及楼前流过的清亮小溪。茂密的河草在溪水中不停地摇曳，变化着姿态，令我和姐姐赞叹不止，遐想联翩，几乎忘却时间。穿过华西后坝，再傍着哗哗的小溪，走过细细的田埂和小小的木桥，就到了我们的学校。为了上学，我们每天要“长途”跋涉，往返十几里地。但沿途的见闻，及南方秀丽的景色却使我们这两个北方孩子感到新鲜有趣：每天回家肚子里都装了很多话，很多观感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妈妈。

那时华西坝的大学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音乐会、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会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良机，妈妈也总是鼓励我们去观赏。晚上10时以后，演出结束了，我们母女三人就重新踏上大木桥，翻过城墙回到盐道街的家中。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只听见府南河水日夜不停的哗哗声。通红的火把把我们母女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出去，可我们三人却热烈讨论着才看过的演出，还不断比较、分析、争论，早忘掉疲劳，好像很快就到家了。姐姐小学毕业后，晚上有时看完演出就剩我一人回家了。我照样买支火把，大踏步地踏上夜行之途。只要听见了熟悉的府南河的流水声，我就感到宽慰；心里要是害怕了，免不了回头四处张望，再放开嗓子高歌一曲来壮胆，倒也很快就翻过城墙到家了。很幸运，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我的信心和胆量也越来越大了。

在我的记忆中，成都小学生活的华彩乐章正是这条“长途”，它锻炼了我的身体，我长得高高大大，双腿结实有力。它也磨炼了我的意志，我的性格也随之开朗勇敢起来，很少再胆怯流泪。

第二件令我回味无穷的就是我当时的午餐。早餐我总是买个“锅盔”（烧饼）边吃边往学校走去。因路途太远，回家吃午饭是不可能的；在外面吃，钱又总不够。记得妈妈第一次塞给我两毛钱时说：“小弟，我每天只能给你两毛钱。用这两毛钱，你可以吃两个肉包子，或者一碗素面。实在不饱你就去买一斤红薯吧。反正

我只能给你两毛钱。”我很快就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午饭。一般说我总是买一斤红薯果腹，因为两个肉包子实在无法打发我那总是饥肠辘辘的肚子。说到这儿，又有一段插曲：

一次，一连三天家住学校附近的同学邀我到她家中去午餐。结果我手中突然有了六毛钱。惊喜之余，一个小小的计划“应运而生”。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尺粉红色的府绸，作了一条漂亮的手绢。我精心地用黑丝线沿上狗牙边，还绣上Mother's Birthday的字样。妈妈生日那天我喜盈盈地献上自己的礼物。妈妈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心里更是乐滋滋的。因为这是我从午餐里节约下来的呀！

尽管妈妈为谋生四处奔波（后来又去川康农业学院兼英语课），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却从不放松。金陵女大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高等学校，不但文理科蜚声国内外，音乐系与体育系也办得十分出色，师资队伍强大。

妈妈抓住了这个机遇。她为我在儿童音乐教育班报了名。每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到5时，我和另外四位小朋友就赶到金陵女大的琴房去上课。记得一位灰白头发的美籍教授Miss Sutherland带着三位学生组成了教学小组。音乐课上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老师为小朋友们在钢琴上演奏各种西洋古典名曲，再介绍作者的生平与有趣的背景知识等。老师们和蔼的态度、美妙的音乐，加上轻言细语的讲解，使孩子们得到很大的美的享受。因此，再累、再饿，我也不愿错过一节课。我终生难忘这些老师，她们是在抗日战争时很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儿童教育尽心尽力的，而且分文不取。

每星期的二、四下午4时到5时，妈妈又请体育系的蒋姐姐教我

们舞蹈一各种基本功。老师循序渐进，耐心又严格。我们也能不顾疲劳与饥饿，勤学苦练。一年后姐姐和我已能跳出一番活泼潇洒、欢畅热烈的踢踏舞。记得1942年春季，成都市在少城公园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我和姐姐应邀表演了一场欢快的“西班牙舞”，博得满场热烈的掌声。于是两个小姐妹得意地再加演一次。会后主办单位的郭有守夫人还专程来拜望妈妈以示感谢，她称赞妈妈教育有方。我和姐姐听了暗自得意。终究，我们为妈妈争得了一份荣誉。要知道，当时两个孩子可是在半饥饿、又累又乏的情况下咬牙坚持下来的。我现在深切感到小学时代所受到的美育，对开阔胸襟、陶冶情操，甚至待人接物，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回想我在成都的小学生活，尽管有着日机的轰炸威胁，疾病的侵袭干扰一姐姐得过一次猩红热，我得过一次回归热一还有饥饿和疲劳，但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绚丽多彩；它所给予的锻炼，扎实全面，使我终生受益匪浅。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在成都的一段生活却永远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回忆起来津津有味。

每一滴露珠都反射了太阳的光辉，我美好的童年是妈妈心血的结晶。妈妈是一棵参天大树，任风吹雨打，它屹然挺立。她那郁葱浓密的枝叶永远庇护着我们免受伤害；她脚下的沃土，永远滋润营养着我们，使我们茁壮成长。

九死一生一日机大轰炸

在40年代初期，日机轰炸是常有的事。每逢警报，我们母女三人就从华西坝“扶老携幼”随着人流往郊区走去。记得我们小学的近郊，有片小树林，还有淙淙小溪与沼泽，离城很远。我们总是往那里躲。每当日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时，人们就匍匐在地，大气不敢出，暗自祈祷神灵保佑。远处的爆炸声令人撕心裂肺。

最惨痛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1年春。那时一百多架日机来狂轰滥炸，不可计数的中国老百姓血肉横飞，丧生在日机的轰炸下。

记得是个晴朗的星期天，警报突然拉响了。我们四人都在家，并没在意。但很急促地，紧急警报惨烈地响起，我们已来不及出城，就只好迅速地往学校后院深处走去。那里有个很简陋的防空洞，上面撑着一个大的藤萝架。妈妈平日总说，要是上面有什么砸下来，说不定还能抵挡一番。谁知我们刚走近藤萝架，日机的轰鸣声就已传来，还伴随着爆炸声，声声紧逼。我们已来不及进入防空洞，说时迟，那时快，妈妈一声“趴下，快”，我们四人就都趴下了。妈妈居然还在我们身上甩开了一条毛毯。只听见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在身边炸裂，还伴有阵阵瓦砾的倒塌声。然后逐渐地，飞机声、爆炸声由近而远，慢慢消失。几秒钟后，我听见左侧的哥哥在试探着喊：“妈！妈！”妈妈在我的右侧，就宽慰地说：“我在这儿。没事！”我稍抬头张望一下，哇，眼前全是浓浓的黄尘与硝烟，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又伏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一阵凉风吹过，我们才翻身坐起。一见四周景色，全都惊呆了。藤萝架已倾倒一半，鸟儿也被炸死，就落在我们的毛毯上，对面房屋的边角也已震塌。哥哥和姐姐跑出去一看，说离我们十几米远，就是一个深深的大弹坑，旁边血迹斑斑，是看门老头的手臂被炸断了，血迹点点滴滴往前院延伸而去。

我只记得妈妈说了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待一家人惊魂稍定就往前院居室走去。还好，四间房子完整无损，只是盖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这时，四处都是哭喊声、咒骂声，还有火光与浓烟。盐道街日机还留下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国民党的工兵正在设法运走。我们这时很担心城里亲友们的安全，但是毫无消息，也不敢出去打听。

夜色降临。电断了，城市笼罩在一片凄惨恐怖和愤懑之中。暮

色苍茫中突然听见大门口有妇女高呼：“君允！君允！”妈出去一看，只见AuntLi风尘仆仆正伫立在校门口。此时相逢，两位老友相拥而泣，自是又惊又悲又喜。此情此景仍犹历历在目。AuntLi正由贵阳来成都办事，恰逢日机大轰炸。她赶至盐道街，却未卜凶吉，只得在校门口高呼妈的姓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大夫进得房来，和妈做了匆忙而又热烈的交谈。顷间，又从手提袋中取出一个信封交给妈妈：“君允，这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请你收下。”多余的话她也没有，随即匆匆离去，身影正映着远处的火光。又是一位挚友在危险时刻为妈雪中送炭。

这天，我们全家九死一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逃出性命来，似乎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真如妈妈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胸中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越烧越旺。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这群狗强盗赶出去！

出任家庭大使

在成都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艰难了。

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妈妈在金陵女大的微薄工资已很难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了。三个孩子都在成长发育，要吃，要穿，还要上学。钱从哪里来呢？妈妈奋力拼搏，又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代课，但所得无几，总是举步维艰，有时不得不去预支工资，或去借贷。一场严重的猩红热使姐姐的身体受到损害，好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后来我也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传染病院。每次都是妈妈课余往返奔波探望、照顾。妈妈真是太辛苦了！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但由于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和巨大的体力消耗，平日有点好吃的她还总是照顾孩子们，妈妈已日渐憔悴消瘦。每当我躺在病床上搂住妈妈疲劳的身躯，总是百感交集。我多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呀！但我却无法表

达。妈妈更是从未表现过悲观。她有过焦虑和烦躁——几乎没有一天她睁开眼睛不马上想到几件操心的事：柴米油盐、住房、交通，等等。但我却从不见她悲观与消沉。她仍精神抖擞。事情来了，她总是沉着应战。

我们在盐道街的住处是在师范学校内，以后国民党的通讯部队占用了校舍。大门口的岗哨对我们进出百般刁难。妈妈的医生朋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我看病，但岗哨阻拦不让进门达一个多小时。

医生义愤填膺，主动为我们在成都东城租了几间房子。妈妈很感谢这位朋友，但房租却增加了，而且离工作地点与小学都更远了。生活益发不便。

正在这山穷水尽之时，妈妈收到朱光潜[2]先生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寄来的一封信。朱光潜先生与妈原来并不相识，我清楚地记得信中他称妈为“君允夫人”，并说武汉大学急需一位女教授负责全体女生的管理工作，又说“深知夫人人品学识俱佳”，问询愿否出任此职并在英语系授课。子女读书也无问题。妈颇感意外，但稍加考虑后就果断地说：“去吧，待在成都已很困难。换个地方，换个环境，也许能得些许改进呢？！”

妈妈决心已下。但怎么走呢？盘缠钱从哪里来呢？无法向素昧平生的朱光潜先生开口。妈妈只是低头不语，心事重重。

大病后，我在家休息了一段。在新的住地，我结识了一位新邻居。这是一位二十多岁还带些学生气的青年布匹商人。他姓陈，还未成家。陈先生为人憨厚正派，也挺喜欢小孩；我们常交换书籍杂志看，有时也相互走动聊天。他不但对我友好，对妈妈也很尊重。

最有趣的是：一次他带着我这位小朋友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应主人之邀，我即兴跳了一场欢快的踢踏舞，博得满场掌声。陈先生

不曾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手，非常高兴。那天我们玩得很尽兴，我和陈先生也更熟悉了。

就在此时，我无意间说起我们可能要离开成都去乐山，妈妈要到武汉大学去教书了。成都物价高，房租贵，太困难了。他听后觉得很遗憾。好邻居要分别了。

“什么时候走呢？”他问。

“不知道。妈妈说没有盘缠钱呢。”

“熊太太需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得回家问问妈妈。”

回去后我把谈话内容告诉妈妈了。妈思忖了一下，就把所需的钱数告诉了我。但她很犹豫，接着说：

“你不一定去跟陈先生说呀！我们和人家没什么交情，不便随意借钱。你叫我再想一想吧！”

但是我不甘心。凭直觉，我觉得陈先生真心实意地想帮忙，也有实力帮忙。在我眼中，他在做生意，可比我们有钱多了。

于是我就直截了当把妈说的数目告诉陈先生了。他听后很痛快地说：“你告诉熊太太，不用发愁，这点钱我可以借给你们。你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三个孩子实在太辛苦了。去乐山也许会好一些。”

我跑回去又如实地向妈妈做了传达。妈妈马上说：

“我自己去和他谈谈吧。我们可以先把爸爸的珍珠皮袄、狐皮

大氅抵押给他。”

就这样，妈妈和陈先生真的达成了协议。陈先生借了一笔为数不少的路费给妈妈。他热情地说：“熊太太，您先把钱拿去用吧。

东西先放在我这里。将来您需要了，我再托人给您送去。”

热心快肠、善良慷慨的陈先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却始终记得他。我更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特别是在那灾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期间，同情心与理解力，相互帮助，同舟共济，这种人类崇高的品质随时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在我们四周，好人毕竟是多数。陈先生和我们萍水相逢，素昧平生，只通过短短几个月的接触，他就能理解信任妈妈，同情她的境遇。其实他自己当时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商人，能有多大实力呢？当时我很希望自己长大也能做一个像他那样讲义气重交情的人，我也要多做帮助他人的事。

这也是我第一次充任家庭大使，我能帮妈妈一点忙了，内心充满喜悦。

儿子

经历了战乱时期万里行程的磨炼与父母婚变所带来的痛苦，哥哥性美很快成长为一名小小男儿。他对妈妈的观察与理解比我深刻得多。关于成都这段生活，关于母爱与母教，性美做了如下的回忆：

1940年我带着性慈经重庆去成都的前夕，与晏阳初伯伯话别时，他慈爱而又意味深长地抚着我的双肩说：“贝贝，你已是一名小小男子汉了。这一路上你帮助妈妈提了不少行李。

将来到了成都更要多多照顾妈妈。”他神情凝重，好像预感到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暴风雨。我想母亲一个柔弱女子居然关山万里完成了这次艰险的旅程，确实是与当时一批深明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珍贵友谊分不开的。

我觉得父母亲的朋友们确实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在感情问题上他们也无能为力。从1940年5月29日我们抵达成都起，直到1941年父亲出走到重庆，他们的婚姻一直处在波折断层，终于最后决裂。我的少年时代是跟着母亲生活，亲身感受到母亲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痛苦。这一点我不想细说。

我最感佩的是，我的父亲甩手就走，没有抚养这三个幼小的孩子，而我的母亲则毅然挑起抚养子女的重担。说是重担一点儿不假，记得当时物价飞涨，母亲赖以生存的教师工资又是如此微薄，母亲只有倾注全力来支撑。对她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酷战争——从感情生活到经济生活，双面受到高压。我那时年龄虽不大，但也深切感到每日生计都将山穷水尽。我清楚地记得，母亲虽然是一个很腼腆的妇女，迫于生计也不得不预支薪金，向好友借钱。有一次百般无奈，只好眼中闪着泪光，嘱我将父亲的皮袄拿到当铺去换钱。我明白令母亲锥心刺痛的并非那件皮袄，而是觉得对不起年幼的儿子。我永生不会忘记在那高高柜台前的滋味，但也正是在那辛酸的一刹那间，我觉察自己又长大了不少。

在那困苦的环境中，母亲仍为我们创造了温馨的家庭环境，使我们得到浓浓的母爱。母亲性格爽朗，对人亲切，在成都节假日金陵女大的大姐姐妹们还有其他年轻的朋友，主要是一些来自沿海地区及沦陷区的年轻人，常来我家聊天，畅谈一切。我虽是个小男孩，夹在中间也没有多少话说，却能感觉到狭小天地中的和睦气氛及团结抗日的同胞情。

今天，我已做外祖父多年，回忆童年更感到母爱、母教的温暖与珍贵，特别是艰难岁月中的母爱更使我迅速成长。

四川中学很注意古汉语，使我这从北方沿海地区去的小男孩感到困难。母亲不顾白天的奔波疲劳，灯下总是精神奕奕地检查我的作业，特别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长达数千言，母亲都细致地逐字逐句为我重讲，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基础。我所喜欢阅读的杂书，母亲要求我去图书馆借阅，而我学习中所需要的辅导材料，母亲不但不吝惜金钱，还抽出时间带我到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店去挑选购买。虽说每次来去匆匆，母亲却细心耐心，又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令我至今难忘。有一次，挑到一本《爱的教育》，我说在北平时就读过了，她却说好书不妨多读几遍，要精读。后来我明白，她是希望这样的书对我性格塑造产生积极影响。

当时，成都英文读物很难买，母亲千方百计到华西坝为我搞来一本TalesfromShakespeare，让我背。老师教我的英语略带四川乡音，母亲就几乎每课都帮我校正，一丝不苟。记得有一篇是LeoTolstoi的文章AGrainasBigasAnEgg，她不断地校音、讲解，直到我昏昏欲睡，她才罢休。第二天清早，她比我起得还早，要赶去上课。

我自小爱运动，在树德中学入选了校排球队，学校很重视体育课，经常打比赛，每天下午都要练到天黑。我还喜欢打乒乓球、玩航模，家中经济拮据，要花钱买球和模型材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我记得，只要可能，母亲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母亲喜欢吟诗作词，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文字清新婉约。那本散文集《灯光》已流失半个多世纪，后来总算苍天有眼，这书终于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了我们兄妹手中。我立即抑制住兴奋的心情，在灯光下仔细阅读起来。真像我与母亲又重聚在一起，促膝

谈心。听着她的娓娓清谈，已淡忘的往事又一幕幕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与妈妈的心贴得很紧。

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完全在战乱中度过：经历了抗日战争、逃难、父母婚变、日机轰炸、贫穷与疾病等。因年少不懂事，不知给妈惹过多少麻烦，叫她操了多少心。但我深爱自己的母亲。长大成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体会到她那正直刚毅的性格及对我的深远影响。我今天还能为社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点心，那是母亲教育培养的结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珍贵的记忆—巴金先生

珍藏在我童年记忆中还有一段美妙的乐曲，我愿以它来结束我们这段成都生活。

1942年我小学毕业时，尽管妈妈每日为生活操劳奔忙，她仍亲手为我制作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说小，确实很小，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纪念册的硬纸壳儿上包了一层厚实的红纸—那是妈妈当时能找到的最“优质”的红纸了。颜色虽鲜亮，在硬壳上却不大服帖。内页倒是比较精彩，妈手边居然还留了几页白色道林纸。她为之裁成小小的页张，先糊，再订，就装成一本名副其实的纪念册。我简直心花怒放，到处蹦蹦跳跳，请同学为我题词。我清楚地记得是妈妈为这本纪念册开了张，她在第一页深情地写下了一句很简单却很真实的话：

性淑小宝贝：今天你小学毕业了，我心里高兴极了。

妈妈不久，一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约我们全家到少城公园去走走。

那正是初夏，公园里草木葱茏一片碧绿，火焰般的红石榴花掩映其间，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穿了件妈妈为我的毕业典礼亲手缝制的浅紫色裙子，到处逛逛看看，十分开心。

我们刚在游廊的茶座上坐下，突然，朋友轻声地向我说：“小弟，快看，那是巴金！”并用惊喜的眼神示意。

巴金是我最崇拜的作家。当时姐姐和我刚读完他的《家》《春》《秋》，晚上我们经常热烈地讨论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巴金先生那颗赤诚火热的心，连我们这样的小读者也深深地被打动了。只见游廊上另一台茶桌旁坐着一位很普通的中年人，他有着乌黑蓬松的短发，戴着一副眼镜，面色红润，一件白色的布衬衣敞开着领口，脚上则是一双大众化的黑布鞋。他显得很健康，很随和，很普通，正和他的朋友品茶谈天。

真巧，我手上正带着那本宝贝纪念册。我毫未考虑就跳起来跑过去了。记得我恭恭敬敬地给我崇敬的大作家鞠了一躬，说：

“巴金先生，我想请您为我的纪念册题词，可以吗？”朋友也跟过去了，轻声介绍道：“这是熊佛西的女儿。”巴金看看我，祥和地笑了。他欣然提笔写下几行字。我兴奋极了，也满意极了，连忙再深深地鞠个躬，又跑到妈妈身旁了。

打开纪念册一看，里面是这样写的：

年轻人要看着未来，未来会照亮年轻人的眼，温暖年轻人的心。

这几句话我一直珍藏在心，虽然当时我并不见得充分理解它的含义。那个初夏的下午，有幸遇到我所崇敬的作家，这段经历我也珍藏在记忆中。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显得特别美妙亮丽。

1985年应上海戏剧学院邀请，我们全家一以增、力儿和我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纪念会。会后经贤惠热情的郑姨（郑漪园先生）安排及亲自率领，我们去拜会了巴金老先生。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上，经过花木扶疏的庭院，我们一行来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四壁环绕着书橱。巴老正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我们。

我们见到这位世纪老作家，都兴奋难抑，簇拥上去，向他热情地问安问好。他也微笑着，和蔼地回答着大家的问候。这时的巴老已与我记忆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差异。银色的头发稀疏而蓬松，面容略显清瘦，但精神矍铄，还是戴着一副眼镜。他身着蓝色对襟棉袄，下着布鞋。没有变化的是他那从容朴实的风格。

五十年过去了，亲爱的巴金老人！经过这么多的曲折与浩劫，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您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与襟怀坦荡，使我们这些读者敬您、爱您、贴近您。我心里充满了兴奋与幸福之情，不禁提到：“巴老，1942年我曾在成都见过您。”完全出乎意料，巴老也很自然地用微弱的声音接着说：“是的，四二年，就在少城公园。”

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激动起来，哽咽着无法接下去。巴老，我感谢您，感谢您那博大的胸怀里居然记住了半个世纪前手持纪念册的那个小小的小姑娘。

巴老，您是永恒的！

1942—1946，四川乐山

小城乐山与新居

听说现在从成都到乐山已有了高速公路和铁路，要不了几个小时就能抵达。但在五十年前，比较便宜的通途是沿岷江而下。为此我们全家租了两条竹篷船：一条放行李，一条容纳我家五口人——从成都带去的女佣张嫂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一路上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两岸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青翠的修竹，还有在树间跳来跳去的灵巧小猴和长尾松鼠。这些野生动物的出现总会引起我们小孩阵阵的惊呼与赞叹。白天船公有节奏的桨声陪伴着我们，晚上船老板又用鲜鱼招待我们。我们全家人都怀着新的希望，憧憬着乐山的新生活，短短两三天远离尘嚣的水上旅行似乎洗涤了妈妈在成都生活中的疲惫和心灵上的创伤。

1942年，我们抵达乐山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后方物质极为匮乏，民不聊生。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大学就由湖北武昌迁移到四川乐山，此时教授们的生活都极为清苦。但他们对办学及教育依旧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视之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乐此不疲。

大批青年学生更是离乡背井，跋山涉水来求学。全校上下一片朝气蓬勃、团结友爱、有难共当的气氛。有了当时校长王星拱教授的热情接待和许多新结识的教授们的共同帮助，我们一家很快就安顿下来了。孩子们都进入武大附中：哥哥上高二，姐姐上初二，我上初一。

但住房却又成了大问题。起初我们全家都挤在武大女生宿舍的两间斗室内，哥哥则另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吃饭也很不方便。

不久，妈妈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加拿大教会的两位传教士（武大女生宿舍是租用了加拿大教会小学的住房），来往较多，并发展了私人友谊。也许这两位传教士觉得这位Mrs Hsiung为人正派，谈吐不俗，又刚来乍到，居住条件极差，就慨然将女生宿舍对面山上的一栋洋房借给妈妈和哲学系黄方刚教授分住。

当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爬上小山初次见到那幢房子时，我们真是惊喜万分，疑身在梦中。

这幢二层的小洋楼位于小山顶，可以看到半个乐山城，房子三面都环绕着宽敞的走廊，拱形廊沿上缀满了翠绿的爬山虎，串串缕缕的蔓条，翠绿鲜活，随意地悬垂在廊前，摇曳生姿。四周林木荫翳，修竹参天，静寂安宁，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

坐在房前的台阶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远处那座六百米高、端庄安详的大佛，以及流经它脚下的清清岷江。接过去就是碧绿的乌尤山、凌云山和逶迤南去的绵绵山峦。日夜绕城奔流的大渡河水，此时正星星点点在浓荫后面闪烁着，而河对岸有一片辽阔的黄灰色沙滩，上面可见青草丛丛，一直伸延到天边。从房子朝西望去，只见峨眉山淡淡的轮廓，隐约勾勒在天际。

还没进门，四周的景色就令我们心旷神怡、赞叹不止。推门进去，只见迎面是几扇大玻璃窗，通明透亮；脚下是木质地板，光可鉴人。这些东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真是久违了呀！哥哥心中一喜，情不自禁马上来了个前滚翻，试试身手。妈妈带着我们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转遍，新鲜奇妙的设施真不少。特别是那些设计精巧的壁橱、壁炉，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

以后逢周末，小朋友们经常聚集我家，妈妈把整个一层让给我们躲猫猫。黑暗中，孩子们的笑声、尖叫声、跑步声，那种兴奋惊险的情景，至今令我陶醉。妈妈就是这样的母亲，只要稍有条件，孩子们的教育与娱乐永远放在第一位。

后来得知，这房子原来是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的故居。我们初来乐山，人生地不熟却突然交上了如此的好运—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解释呢—奇迹般地住进了这栋房子。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为之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多了。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我们都进入武大附中，一切都正常运转起来。

在这栋房子里我们整整住了四年，而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兄妹发育成长最快的阶段。尽管物质生活上十分艰苦，经常食不果腹，但山河秀色与所读的书籍、所接触的人——教授学者、诲人不倦的老师和天真可爱的小同学们——都为我们年少的心灵注入了营养，从精神上慷慨地给予了补偿。

妈妈工作上再累再烦，但在走廊上一坐，品上一杯清茶，面对着大自然秀丽的画卷，她那烦躁的心情就会逐渐平静下来。

感谢你，美丽的小城——乐山。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呀。

妈妈的女生管理工作（一）

武大女生宿舍位于乐山的白塔街。妈妈的办公室就在宿舍大院的二进门口，永远“门户大开”，女同学有事只管径直入内商谈。

到乐山后，妈妈连称谓也变了。人们不再以北京时代的“熊太太”叫她，也不像在金陵女大时尊称她为“熊夫人”。她有了一个中性的称谓“朱先生”。起初我很奇怪，她的称谓怎么男性化了。

但后来一想，“先生”不就是“老师”嘛，有何不可呢？

这时妈妈的服饰也逐渐起了变化。每天往返爬山数次，于是高跟鞋束之高阁。平日只穿平底鞋，身上是蓝布旗袍，或黑色软缎夹袍，冬天再加上一条白色羊毛围巾。不变的是那副无边眼镜及低垂的发髻。她看起来还是一位斯斯文文的知识妇女，却去掉了一些娴淑之气，多了一些干练之风。

走上新的岗位后，“朱先生”挽起袖子，说干就干。就我现在的回忆，她的工作很重的一部分是事务工作。这是妈妈始料不及，也是从未干过的。但她却表现出一股务实精神，脚踏实地，绝不以教书先生自居而轻视这些烦琐实在的行政工作。她以年长妇女、师长之心爱护着这群处于艰苦环境下的求学女青年。

她常去巡视平房宿舍的卫生，查看厨房清洁及伙食好坏，关心女同学的热水供应如何……每逢哪位同学生病了，她亲自去问寒问暖，嘱咐同室人多加照顾。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四川气候潮湿，加上当时卫生条件较差，床上总孳生着许多臭虫。我记得在家里妈妈常半夜睡眠惺忪地爬起来为我们捉臭虫，我们却呼呼大睡，毫不在意。但是她深受其苦，不能不想到宿舍里那一群背井离乡的女青年。当时条件下，连六六六杀虫粉也没有。于是夏天一到，每隔一段时间她就嘱咐厨房烧几大锅开水，要女同学们把床抬到室外日头下，用滚开水浇，再晒干，以消灭臭虫。做这些事她总是跑进跑出，不辞劳苦，回家来还津津乐道，好像打了一场胜仗，痛快得很。

1944年的暑假是个恐怖凄凉的暑假。由于卫生条件差，人们营养不良，伤寒在乐山肆虐流行。七名年轻优秀的女同学不幸罹染此疾，高烧不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妈妈日夜奔忙，心焦如焚。她亲自去同仁医院请医生，动员厨房煮米汤——这是病人当时唯一能进食的东西。一切可以想到的，她都尽最大努力去做，而丝毫没有顾虑自己是否也会被传染。可怕的是，在一个暑假内七名女同学竟无一幸免，相继去世。妈妈则是焦头烂额，自己也几乎被焦虑与忧伤击倒。但她终于坚强地挺过来了。她热爱这些如鲜花般的年轻生

命，她也感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但面对病魔，她却无法夺回这些生命。在这段时间内，每送走一位同学，她都欲哭无泪，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最后自己也瘦了一大圈，形容枯槁。

回忆起这件事，我不能不佩服妈妈当年的工作责任感、处事的镇静和办事的效率。但更重要的还是她那颗慈母心。

妈妈的女生管理工作（二）

除了庞杂的事务工作外，妈妈还在女同学中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记得当年的大姐姐们，有时也会意气用事闹别扭，个别的还会在宿舍里大声争吵影响其他人的休息。这时妈妈就会分别劝说：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大家离乡背井出来求学都很不容易。彼此不妨体谅宽容一些，顾全大局，对学业和自己都会有好处。

记得有一位美貌活泼的女同学和乐山当地一位士绅产生了婚外恋。那位士绅的妻子告状给武大王星拱校长说武大个别女生充当不光彩的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王校长将此事交由妈妈处理。妈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机。她和那位女同学做了数次长谈。妈妈语重心长地劝说她，正值青年时期，千万应以学业为重，以前途为重。还帮助她择定去向，制定悄然离去的路线等。这位女同学果然甩下感情包袱远去他处求学。后来在海外成为一名很有作为、很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我觉得妈妈对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宽容和爱护之心，她总是着眼于青年人的未来。

在乐山的白塔街，女生宿舍从来是“闲人免进”的，但高年级的宿舍里常有人丢失比较贵重的东西，如衣料等。同学之间互相产生了怀疑。妈妈不了解详情，工作也无法下手。一天，洗衣服的婆婆将一床被子拆开，发现里面全是衣料等物，惊吓之余，忙把被子

追回原宿舍。同房同学见状则哗然，群情激愤，说：“真没想到××原来是个贼！”妈妈闻讯后马上赶去，说：“请大家克制一下自己的愤怒。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和她谈一次，让她主动把东西都交还各位。但请大家不要随意用言语伤害她，怕再出别的事情。”同学们闻之有理，就安静下来了。妈妈果真找那位女同学长谈了一番，她也供认不讳。最后将赃物全部物归原主，基本上平息了大家的愤怒。这时妈妈又替她向学校说情，最后校方念她尚年轻，没有公开开除，只勒令退学。诸如此类的事，当年还有一些。

我只是从妈妈口中透露的略知一二。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在工作岗位上殚精竭虑，耐心冷静地处理着一件又一件事情。她爱这些莘莘学子，很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她们创造一个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大约在1943年，当时巴金的《家》刚由曹禺改编为大型话剧。

剧本十分成功，不但保留了原著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挖掘得更深，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剧本似乎比原著更丰满，更有血有肉。在我的记忆中这剧本曾在小镇乐山引起轰动，风靡一时。这时就有女同学向妈妈建议在女生宿舍里组织一次有关曹禺《家》的报告会。妈妈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遂请当时刚由美国学成归国的青年女教授孙家绣主讲。孙家绣教授那时刚二十六岁，风华正茂，博学多才，为人热情率直。

她欣然接受任务，三天后如期举行了报告会，给女同学们做了精辟深入的分析。记得会场就设在女生宿舍的饭厅里。大家围坐成一圈，静静地、兴趣盎然地聆听。我当然也不会错过良机，混于大姐姐们中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记得孙家绣教授分析四凤投湖自杀之前那一场景，她说：“一个孤独的人临终之前，哪怕狗能

舔自己两下也会觉得温暖的。但可怜的丫环四凤，即将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却无法与自己心爱的人说上几句话……她孤独地走向死亡。”

听到这里，大厅里鸦雀无声。

据云，这次报告会后，孙家绣教授谢绝了同学们送她回家，自己打着火把往家里赶；家里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儿孤独地等着她。她举着半明的火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一不小心，几乎掉到大渡河里。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里，不知有多少这样忘我工作的教授们。

艰苦而快乐的家庭生活

也许是因为住房宽敞，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交友，家里每日来来往往总有许多朋友。除了武大的女同学常三三两两上山来找妈妈谈心、摆龙门阵，哥哥也常有同学来，关在他房里练男声小合唱。他们最喜欢练的歌是黄自先生的三声部合唱《杜鹃》，年轻柔美的男声合唱常在小山坡上飘荡：“归去，归去……”我和姐姐也参加了武大学生的“南风”合唱团，那些爱好音乐的大哥哥大姐姐并不嫌弃我们这几个初中生，他们还常上山来聚在我们的草坝上练唱，晒太阳，有时有人请客吃花生，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气氛总是轻松活跃。这些活动妈妈偶尔参加，但更多的时候她不过问，由我们去自由发展，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每当她与我们聚在一起时，她的直率，还有那毫不掩盖的坏脾气，并没吓走年轻人。相反，大家也都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十分自然真诚。可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宽松的家庭气氛，朋友们一不论年长者还是青年人一都很喜欢到我们家来。我们兄妹三人无形中也都陶冶出坦诚热情、喜交朋友性格。

那时我们三人正值成长发育期，饭量都不小。母亲用什么来喂养我们呢？不外乎带沙子的甚至是发霉的糙米，还有蔬菜。记得冬天是一大碗红白萝卜丝汤，热气腾腾。我们用汤泡饭，狼吞虎咽，各人三大碗，毫不含糊。但是吃完了汤泡饭，对不起，就“饭毕”。

有时妈看见我们余兴未尽的样子就说：“拿点猪油、辣椒拌饭吧！

我在长沙上中学时就常这么吃，可香了。”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张嫂就给我们来一顿煮南瓜或红薯。所以迄今，我从来不对这两种食物感兴趣。也正因此，我们兄妹从不挑食，吃什么都津津有味。

成年后的饮食习惯也很随便。

也正是在那几年，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长高，衣服都小了，且磨损多年，已不能再穿。那时中学对学生制服要求非常严格，可是对逃难来四川的教授家庭来说，准备几套学生制服却成了难题。一根纱也来之不易呀！记得我的黄色童子军上装就是妈用梔子花染了块旧布缝制而成；上高中后须穿蓝布旗袍，又是妈从箱底翻出爸爸的旧长衫，连日改制而成。遗憾的是改好的女式旗袍前襟上一条男式的“中缝”赫然在目，但我们也无法讲究了，两姐妹还抢着穿它呐。我穿了三个冬季的棉袍是妈的旧夹袄改的。为了过冬，妈又拆掉自己一件黑毛衣为我织成新的，最后毛线不够了，就在袖口处添点灰线，织成黑灰相间的横条，别具一格，全校再也找不出第二件。

而我和姐姐却最喜欢偷穿妈的旗袍，柔软舒适，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穿上了就免不了在玻璃窗前照照，暗自得意。但妈妈可恼

火了：“我就这么两件衣服，叫你们给穿破了，我可穿什么去办公，去上课呢？”

至于鞋袜，也都是妈和张嫂亲手做，亲手补。遇上雨天，制服干不了，张嫂就为我们三个中学生架起柴火撑上锅，我们则七手八脚，在热锅里“炒”起制服来，以便催干。

这些都是艰苦岁月中的亲切回忆。在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下，母亲一针一线、一粒米一口粥地为我们操持一切。怪不得她的双眼逐渐老花，头发日渐稀疏。但她始终坚强地生活着。她身上还有那么多朝气，总是乐观地支撑着这个家。

说到支撑这个家，不能不再次提到另一位重要的成员——张嫂，妈妈亲密的战友。

张嫂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四十多岁，长得高大结实，性格开朗，笑口常开。这位爽朗的妇女身世却很悲惨：她家两代男人——丈夫和儿子都先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了，离家后杳无音信。家中只剩下孤单的三代女人——她、媳妇和一个才几岁的孙女。为了谋生，张嫂只能离乡背井来到成都作女佣，按月寄现金回家援助在家务农的媳妇。就这样，是天意吧，她来到了我们成都的家。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这位干活麻利、待人也体贴周到的中年农妇，待她也如亲人一样。不久，她又情愿随着这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来到乐山，帮助妈妈操持家务，与我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五年。张嫂头上总围着一圈硬挺挺的黑帕子，脸上满是辛酸生活留下的刻痕。她虽有一双缠足小脚，走起路来却很麻利快捷，腰杆笔挺，显得精明能干。在乐山，妈整日忙着管理工作，很少时间在家。张嫂便很自然显出“将领”风范了，什么事她都敢当家作主，而且挥洒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有时甚至是神通广大。譬如说家里已没有一分菜金了，可大人孩子回家来，依旧是一桌热饭热菜，不论其“含荤量”

的高低如何，肚子总能暂时填饱。当年就凭这一点“贡献”，也绝非一般才能。

其实，张嫂的“贡献”绝非靠变戏法，她靠的是那双勤劳的手和长期劳动持家的经验。由于那时院子极宽敞，张嫂便有了施展身手的地方。没过几天，就见她乐呵呵地开了荒，种上一畦蔬菜秧子，不久，又搭上架子，再过不了多久带刺的嫩黄瓜、浅绿的丝瓜就悄然挂在绿油油的叶下了，引得我们全家好一阵惊叹。这样，我家的餐桌上总有时令的新鲜蔬菜，更别提那些鲜红的大番茄了。到了秋天，贮藏室里总是堆着一大堆南瓜、一大堆红薯。课余，孩子们也都听从她的调度，帮着去收红薯，抬南瓜，一路笑声不绝，好不热闹。不言而喻，这样一来，妈又省了不少菜金。

对农村出身的张嫂来说，光种菜还不过瘾。次年她又养了一窝小鸡。小东西们先吱吱地待在纸盒里，不久就满地跑，啄米吃了。

再没过多久，那些可爱的小母鸡们便会躲在柴禾堆里下蛋，然后得意地咯咯叫着，向家人报喜。这当然是大喜事，从此我们早上经常能吃到新鲜鸡蛋。而最有趣的是我苦苦央求妈妈买了一只小母鹅，“委托”张嫂代养。在张嫂特别关照下，“黄毛鹅头”成长为一位高贵的“白雪公主”，丰满的身躯覆盖着丰密的洁白羽毛，细长的颈项又托着一顶黄澄澄的冠冕。当然，这鸟儿成了全家的宠物。但出人意料：一日，美丽的公主突然变成了一名凶猛的卫士；有生人上山来，只见她嘶声啼叫，展开宽大双翼朝生人飞扑而去，惊得来人不敢趋前，须待家人说情，“公主”才肯放行。而更令我们惊喜的是：每隔两日，“公主”必赐我们全家一枚硕大的青皮鹅蛋。这在当时是份厚礼，因饮食中蛋白质奇缺。可若没有张嫂，我怎么会想到喂只鹅来改善伙食呢！

张嫂在家中还是一位“空前绝后”的能工巧匠，令我们这些城

市长大的孩子大开眼界。自从到了乐山，她的灵性聪明便全部展示出来了。她利用住宅前后的修竹，砍砍刮刮，轻敲细打，半天时间便能手编出许多精巧的日用杂物：竹篓、竹簸箕、竹勺、竹耙……

不一而足。秋冬晴好之时，瞧我们的张嫂，精神抖擞，背上竹篓，手持竹耙，哼着长寿地区的小调，就爬到坝子上去耙它几大篓枯草，堆到灶门口，有空时她再慢条斯理地逐个做成草把子，以便烧火煮饭用。这样，她不是又给妈妈节约了一笔柴禾钱吗？难道是妈妈要求她这样做的吗？她刚来时妈岂能料到她竟有这十八般武艺？

不，张嫂全凭她那宽厚的爱心，对生活、对劳动的热爱，才很自然地为她自己挣得了“副统帅”的地位。

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嫂还常从经济上支援妈。平日她总把工资攒足一笔整数再寄回家去，因此，她手中常有一笔“流动资金”。只要她看妈连菜金也难凑齐了，就会主动提出：“朱先生，我看你又没钱了，先把我的钱拿去用吧，等有了钱再还我。”所以，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常是给张嫂“补发工资”。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偿还银行贷款”。

是妈和张嫂共同支撑着这家人。有了张嫂，妈心里踏实，若是没有张嫂，局面如何就很难想象了。两个大人再加上我们三个活泼的中学生，还有一只大白鹅、一大群鸡，这个家总是温暖且生气勃勃。吃饭时围在桌旁抢菜抢饭，抢着报告新闻，交流信息，还要抢着发表己见，驳斥不同观点，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妈妈总是把饭菜尽量留给我们，微笑地瞧着我们抢，细心地听着我们说。她自己唯一的“嗜好”，就是饭后把喝剩的茶叶都嚼掉，然后吞下去。嚼茶叶是妈唯一的嗜好。

君子朋而不党

母亲是个喜欢交友又善于交友的人，她有人格魅力。她交友相当广泛，但又有一定原则。记得她常跟我们说：君子朋而不党。

那时教授们的私人来往比较多，自然而从容。他们常三两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天南海北，交流看法，吐露心声，彼此都不设防。

小镇乐山只有一个电影院，也没什么其他娱乐设施。年长者最好的调剂就是串门、聊聊天。逢年过节彼此请吃顿饭，喝几口酒，团聚一下，增进了解与感情。谈话内容多为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或交流文章体会，探讨人生哲理，而较少谈论子女家务等，更少互相攀比或吹捧。总之，这是一群“穿蓝布大褂的”、袖口上还经常沾点粉笔灰的人。但当他们真聊得入神时，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也会听得入神，那是一种享受。

常来我家的教授们不少，多为文法学院的。其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妈与校长王星拱先生与训导长赵师梅先生都接触较多。记得母亲十分崇敬王星拱校长，总说他办事公道、谦和，对人周到，对事细心。对赵师梅先生，母亲也很尊重，说他对己严，对人宽；赵先生自己生活非常俭朴，有规律；但对同事，特别是对离乡背井的爱国学生却像慈父般宽厚仁慈。

朱光潜教授有时也来串门或吃顿饭。我们兄妹三人当时都读过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对他很感兴趣。记得光潜教授当时不到五十岁，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他身材瘦小，面色略显苍白，长年着布长衫、布鞋，一派儒雅书生气。但黑边眼镜后面却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冷静豁达地注视着这个世界。这是智者的眼神。他说起话来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绝不冗长啰唆，而总是引人入胜，让人愿意聆听，或与之交谈。不知为什么，每次他来看母亲，在廊

前品茶清谈，欣赏远处山光水色——那一堆飘流不去的凌云、乌尤绿影，这时我们兄妹总喜欢找个借口在附近徘徊，听他们的娓娓清谈。记忆中，除了教书或管理工作，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古典诗词。

记得一次为某人婚礼，光潜教授和母亲都准备赠送字画以示庆贺。一天下午，风清气爽，光潜教授兴致盎然地走上山来找母亲商量。记得他们各自一杯清茶，然后轻声背诵各类诗篇，又轻声地议论着，但总苦于没找到合适的佳作。突然，光潜教授眼光一闪，面露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快捷走向书桌，凝神提笔，一挥而就。妈和我也好奇地凑过去看，只见纸上展现的正是那首唐人朱庆余的名作：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七绝，不禁拍手叫绝。新娘子幸福娇嗔又小心翼翼的心情真刻画得活灵活现，妙不可言。光潜教授也回头朝我们母女笑了一笑，十分得意。的确，这幅作品送给一对新人再合适也没有了。他的字迹端正清秀，笔画遒劲刚健。当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还有一次正月里，母亲请了几位好友饮酒吃饭。光潜教授那次可尽兴了，喝得一醉方休。离席后就往客厅里一张“土沙发”上一歪，安然入睡，睡得又沉又香。不料这一觉时间可不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晚饭时刻朱夫人在家等急了，只好亲自爬上山来找

丈夫。这时别的客人早已离去，只有光潜教授还纹丝不动倒在沙发上。朱夫人只好在丈夫身边轻声呼唤摇晃，教授此时才大梦初醒，看看四周，惭然失笑。所有的人也都看着他笑，小孩子们更是不留情地又笑又叫：“朱伯伯，你喝醉了！你喝醉了！你瞧天都快黑了！”只见朱伯伯从容地摘下眼镜，两手轻揉面孔两下，笑曰：“睡了一个好觉，真舒服！”于是在暮色中和夫人亲亲热热走下山去。

好一个酒仙！艰难岁月中，他仍生活得潇洒自如，保持着非常平和乐观的心态。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懂得享受生活，享受友情，难怪他对美学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都有着类似的人格魅力。

崇拜朱光潜教授的绝不止中学生，夸张地说，整个武汉大学的学生都崇拜这位教务长。他为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开的英诗课，总是座无虚席。听说文庙大教室里每当他讲课时总是爆满。许多文学诗歌爱好者，不分院系，都前来受教；有许多学生站在教室外的廊沿下通过窗棂静静地聆听。上完课，若天气晴朗，有些武大的大朋友们会来我家草坝上叙谈家常，也免不了热烈地谈论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这时他们会兴奋起来，从他们愉悦的神情中我也体会到上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实属一种美的享受。谈到高兴时，就有人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模拟教授的神态：微闭双目，低声吟哦，轻轻踱步；此时另一位又会急不可耐地将前一位推开，模拟教授的另一讲解处，只见他头颅高昂，眼神闪亮，声调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这群光潜教授的崇拜者如此投入地模拟再现着教授的风采，使我这名初中学生也觉得乐趣无穷。

当然还有许多可亲可敬的教授、教授夫人们。他们的谈吐都风雅有趣，至今令我回味无穷。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透明如水……

哥哥性美对这段往事，比我理解得更深刻，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受母亲熏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君子朋而不党的思想。英国君主立宪后的民主思想对她影响很大。在旧大学里，往往有一些派系之争，武大也不例外。我母亲当时交往的多是一些文学院的，特别是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母亲常请一些教授来吃便饭。他们当然不像年轻人那样唱歌，而是在一起谈古论今，填词写诗。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外文系教授，如系主任方重常常背诵雪莱、济慈等人的诗篇，而搞历史、中文和其他的人多谈李白、杜甫、李后主甚至黑格尔。当这些教授们议论杂陈时，我们的客厅里就会融合中西。我当时觉得很滑稽，对母亲说了以后，母亲正色道，东西方文化都有一些精品，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情和景的交融，特别是感情的抒发和交流。

当时在乐山，国民党对学生的思想监视是相当严的。武大由于从沦陷区去的学生比较多，形成了很强的民主抗日的思想。这在客观上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思想一致。由此国民党当局更加强了对学生的防范。这不仅仅在大学，连我所在的武汉大学附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建国前，武汉大学里经常流传着各种说法，如：当时乐山武大某某教师是地下党的负责人等。母亲当时也不可能不接触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她一直跟她的同事们强调说，不论是同事、同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只要主张抗日，她都是同情的。

在家里，我也一再听她讲“君子朋而不党”。

情趣

不久，妈妈进入妇女更年期了。由于生活与工作上的压力，她生理上的反应不小。她脾气变坏了，很急躁，与人顶撞的时候变多

了；对很多事都看不惯却又无奈，胸中充满了抑郁愤懑。但即使这样，妈的生活里还是保留了许多情趣，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始终保持自己精神的平衡。

我们的居室总是窗明几净，让人走进来就觉得舒服，可以得到休息。窗上挂着雪白的纱帘，那是由旧蚊帐改做的。书桌上除了园中采摘的鲜花，还放有一盏细长身、褐色陶瓷的台灯。谁也想不到那造型别致、古朴典雅的台灯的前身竟是一个装小磨麻油的瓶子。

妈在瓶身下部穿了两个小洞，通上电线，安上灯头，再叠个橘黄色的纸灯罩，就制成了这个别致的台灯。正是在这盏灯下，我们全家度过许多或欢快或宁静的夜晚。

由于女生管理工作的繁忙，妈上课不多。我记得在乐山时她教过英诗。此时有一位同学自选自译了一本薄薄的英诗集，请妈妈指点。原文整齐漂亮地打印在左页，而译文则工整地书写在右页。晚上，我们娘儿俩就坐在那盏橘黄色的灯前读这本诗集。妈妈轻声地读呀，品呀，我就听呀，问呀。有时妈妈也会停下来给我讲两句。

记得其中有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但我却更喜欢华兹华斯的田园风格。窗外是寂静的秋夜，繁星点点，远处还不时传来南去雁群悠长的鸣叫声。靠在亲爱的妈妈身边享受英诗的这些夜晚，几十年后仍使我身心充满了幸福宁静的感觉。

我们全家都不是基督徒。妈曾长期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也许正因如此，她把教会看得比较透彻，她宁愿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也不想为什么功利去随声附和什么人。

我和姐姐那时都参加了唱诗班，我们喜欢这些庄严典雅的音乐。记得有两个圣诞节我们和小伙伴们，手持蜡烛挨家串户地去“报佳音”。那些圣诞乐曲，那美丽的烛光，还有亲爱的小伙伴

们，使我内心充满了兴奋愉悦之情。高声颂唱那些圣诞歌曲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而那些接受祝福的家庭也总是热情地塞给我们许多好吃的：橘子、花生、杂糖，等等。哦，都吃不了啦！怎么办呢？兜着走呗。可没带包呀。这时我灵机一动，用上我那件黑毛衣的袖子了。吃的东西把我那两只袖子塞得鼓鼓的。

我想到了妈妈，这时她一定坐在书桌前看书等我呐。最后，小伙伴们尽兴了，我也打着火把沿着曲折的山路飞快地往家中走去，远远就看见那橘黄色的灯光，它衍射着，在温暖的冬夜里。一进客厅，我就兴奋地喊道：“妈妈，瞧，今天我给你带来好吃的啦！”

我赶忙从袖子里往外捞东西。妈妈瞧见我这副滑稽样子，就笑呵呵地说：“哟，三娃儿，这回你可大捞一把了。”

妈妈这时已不再叫我“小弟”，而改称“三娃儿”了。这是四川人的称呼。“娃”是小孩的意思，我排行第三，就叫“三娃儿”。

这称呼妈妈一直使用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这个称呼的专利是属于妈妈的。

浪漫

乐山的岁月是艰苦的，却又是浪漫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城不但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而且它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人间真情。

因为房子在小山顶上，四年中我们全家尽管在物质上颇为清贫，精神上却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丰厚赐予。春夏秋冬，晨昏雨雪，窗前的山光水色总是变化无穷。朝西看，天空晴朗时能见到浅

蓝色天边淡淡地显出盖了皑皑白雪的峨眉顶峰。待夕阳西下霞光万丈时，天空中各色瑰丽的色彩诡秘地变化着，更令人浮想联翩。

当时我是一个非常散漫、学习全凭兴趣的中学生。每日清晨妈妈只看见我背着一个破书包上学了，其实我并没有去学校，而是在县街上一所开架文艺书店里酣畅遨游，流连忘返。对我来说，这里才是真正的教室。我结识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世界文豪，沉浸在他们的著作中。我经常旷课，吃饭时却又背着书包回家了。妈妈偶尔过问一下我的学业，我只管胡乱搪塞。她虽已从我的谈吐中觉察到什么，但也懒于追究。我们之间似乎心照不宣。她了解女儿，更信任女儿。她明白，一定程度的宽松发展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纵观一生，也许这段时间是我吸收知识最迅速、最自由也最轻松的阶段。优秀的文艺书籍使我的性格、理智和情感都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数理化的基础却很薄弱。

由于不断吸收营养价值极高的精神食粮，我从不知道寂寞为何物。对于一个身心健康的少年人来说，世界是如此奇妙，人们是如此可爱有趣，生活多美好！我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人们常说离异父母的子女性格孤僻内向，内心充满困惑与痛苦。

我们三兄妹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但是妈妈赐给我们的温暖，她那宽厚又体贴的母爱，特别是她那坚强开朗的性格，使我们从小就不知道孤独与寂寞为何物。相反，我们对周围的人和事充满了热情，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性慈在这一点上最突出，只要她在家，房中经常飘荡着甜美的女高音。记得她最喜欢唱那首舒伯特的Hark, Hark the Lark。她爽朗热情得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云雀，优美平滑地在蓝天中翱翔。她对朋友体贴周到，又纯真。那时常来我家的外文系的翟一我和经济系的冯家禄都是她的知心朋友。两位大姐

姐经常辅导性慈几何、三角作业，玩起来、唱起来时，她们简直比亲姐妹还要亲。

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15日的黄昏，姐姐性慈突然冲进门来大呼：“妈妈！日本投降了！”起初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听见外面鼎沸的人声，才信以为真。我们母女三人乐得眼泪直流，说不出话来。我首先想到远在外地任驻华美军翻译的哥哥，也许他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了吧？！小城乐山霎时就沸腾了。人们高举着火把，欣喜若狂地冲上街头，自发地形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游行散了，我们母女又到朋友家去聚会，狂欢了一夜。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妈妈彻夜未能入睡，也许她更多地是回忆往事吧？！我也第一次尝到了兴奋过度无法入睡的滋味。但我更多的却是在编织未来的美梦。一个没有战争与轰炸、丰衣足食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呢？我几乎无法想象。我们一家要离开乐山了吗？到哪里去呢？我胡思乱想着。还有我的好朋友桂华珍、黄美虹呢，我们不会分手吧？

人们胜利的喜悦还未完全消失，国共两党的摩擦就日益加剧了，内战阴云密布。毛主席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广大学界要求国内和平，反内战，但昆明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也忧心忡忡。

对于这样的时局，妈妈的反应极强烈。妈妈一贯是个正义感很强的女子，她通过自己所走的道路，早对国民党那一套腐朽作风深恶痛绝。但，这时的朱君允只是不满。她对共产党，对政治毫不感兴趣。经过八年的艰苦生活，她只希望能过上安生日子。

1946年的夏季，我们全家告别了美丽安静的小城，随着武汉大学一起来到珞珈山。

一个时期结束了，新的时期就要开始。

我和姐姐都长成活泼丰满的大姑娘了。性慈在家里比我更能操持家务。妈妈却粗犷老练了许多。我呢，还在糊里糊涂做白日梦。

永远的灯光（下）

1946—1949，武昌珞珈山

珞珈山

就这样，我们两个女孩跟着妈妈来到了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武汉大学的原址。无论是从大人的谈话中还是从小伙伴们的嘴里，关于这块故园，我们都已听说了许多。果真名不虚传，珞珈山又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

珞珈山是一条逶迤起伏的山峦，略呈弯弓形，覆盖着青松翠柏及各色树木，无论寒冬酷暑，永远郁郁葱葱。从山下朝山上望去，武汉大学宫殿式的教学大楼雄踞山巅，而绿瓦飞檐的大图书馆则屹立在最高点，俯瞰着整个校园。依山而建的是一长排浅灰色的宫殿式高层学生宿舍，雄伟壮观。夜幕降临后，每扇窗口都射出耀眼的灯光。多少个漆黑的夜晚，从我家门口一眼望去，璀璨辉煌的宿舍大楼，就像一块巨大的钻石别针，令人叹为观止。

而最使我们欣喜陶醉的却是那片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东湖水。它静静地躺在湛蓝的天空下，水天一色，是浅蓝还是碧绿？

从远处看去，湖水坦荡又温柔，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待走近时，亲近了它，又会被这奇妙的景色所折服，说不出话来。只见湖水清澈透明，湖底下的水草轻轻摇摆，婀娜多姿，似乎默默地在与我们打招呼交流；湖面上波光粼粼，魅力四射，不时还有几只水鸟轻盈地掠过，划出优美的弧线。空气清新而略带水草气。四周静寂无声，远远的山峦也默默无语，这广袤的湖边找不出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

这是我1946年对东湖的最初印象，它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东湖边的珞珈山，又度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刚来珞珈山时我们一家被安顿在东湖中学住宅区一栋日式的小楼里。不客气地说，真是小日本的作品，房间局促狭小，连转弯的地方都没有。同住的有妈妈抗日战争前的故交吴宓教授和二女儿吴学文，还有研究梵文的当时还颇年轻的金克木教授夫妇等人。

尽管学校的学费昂贵，妈妈还是咬咬牙把我和姐姐性慈都送进了位于小东门的希理达女中，开始住读；姐姐上高三，我上高二。

校长沈祖英原是金陵女大的钢琴教授，曾和妈在成都金陵女大共事。

在这所学校里我又遇上了乐山时代的挚友桂华珍、黄美虹、桂裕芳（当然也结交了更多的新朋友）。经过短暂的分别，大家不但身体都长高了，而且视野也更扩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局面、新人物的出现、新的舶来品的输入、新的城市的接触，都使我们感兴趣，就连波涛滚滚流经武汉三镇的长江及轮渡船也使我们觉1吴宓，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红学专家，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西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等职。

得新鲜。于是海阔天空，高谈阔论，大家交流的信息更多了。在这所女中安静的校园里，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姑娘们逐渐都进入了花季，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度过了一段永远无法忘怀的美好岁月，也结下了常青不衰的友谊。

乐山时代妈妈很敬重的王星拱校长这时已离开武大，陈西滢伯伯早已远赴英国。朱光潜伯伯，那位讲起英诗来使大教室座无虚席，可谓“倾城倾校”的著名学者，此时也去了北大。初来珞珈

山，妈妈不免感到怅然。但不久北平时代的好友杨济时大夫来武大任医学院院长；历尽战争与生活的磨难，老友重逢，大家都喜出望外。我家这时已搬到老二区一号，吴宓教授和学文就住在二楼，我们又成了近邻，他们父女常下来坐坐聊聊，自然而又轻松地发展着友谊。

从表面看，吴宓教授是一位几近老学究式的学者，严肃有加，不苟言笑。他的外表有两个特点：其一，他那贮藏了大量信息的大脑有着一副极不寻常的外壳，中部高高凸起，而且秃顶，是名副其实的“老寿星头”。这是智慧的象征。其二，他常年着半旧长衫，却从不提公文包或书包。他手里拿的或腋下夹的总是一个小小的土黄色的包袱。所谓的包袱，并不鼓鼓囊囊，相反，它方正扁平，里面整齐地珍藏着他的讲义及几本必备的书籍。包袱皮外面还紧紧地系着一根细绳。别小瞧这个土黄色的小包袱，它是吴宓教授标志性的道具，它象征着乡土情怀及严密的作风。

平日他不苟言笑，在校园里来去匆匆。其实这位学者善良正直，且平易近人。只要对口味，他也会谈笑风生，妙语连珠。

1947—1948年，他只身带二女儿吴学文就住在我们楼上，暇时他常进来坐坐聊聊，毫无大学者的架子，有几次还和我们小孩玩起猜字谜的游戏。就我所知，吴伯伯过着十分简朴几近苦行僧式的生活，但母亲总说，他活得挺自在，挺惬意，我行我素，自得其乐。

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1949年我进入武大外语系，就规规矩矩成了吴教授的学生，修的是英国文学史。每次上课铃一响，就见教授夹着那个土黄色的小包袱，昂首阔步，登上讲台。跟学生们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立即转身往黑板上书写他的讲授提纲，一行接一行，密密麻麻很快就

写满了一黑板。他写得急促又端正，准确又流畅，标点符号也毫不马虎，而且著名作家的生卒年月及名著的出版日期等各种阿拉伯数字，教授更是倒背如流，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很少参看讲义或停顿思索。这不能不令满堂青年学子暗自咋舌惊叹。

在我的记忆中，吴宓教授的讲课风格是资料丰富，严谨准确，很少个人的观点与分析。他侧重一个“史”字，强调事实与时间；间或冒出一两句他个人的看法，倒是正中要害，画龙点睛。

恕我晚辈冒昧，从人品上看，教授还有一个特点：侠骨柔肠。

他对女士们总是爱护有加，可能这是正宗的英国教育培养出来的绅士风度吧？

他虽长年独居，但三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寒暑假常来武大探望，相处甚融，毫无隔阂。看得出他是位慈祥的父亲，虽然言语并不多。对待抚养子女的单身女教工，他也总是体贴关怀。有段时间，晚饭后在夕阳的金色余晖中，珞珈山上的学人们常见这位学究式的老学者，两手各牵一个四五岁的女童，在路边慢慢踱步，神态怡然。奇哉！教授一向道貌岸然，来去匆匆，此时却面带笑意，从容自在；而两个幼女，就像一对花蝴蝶，正莺啼燕语，在他身旁戏笑，引得过往行人都投去好奇的目光。对这样一些目光，吴宓教授会主动又谦逊地解释说：“某某先生到香港去办点事，托付我代她照顾一下这对小宝贝。”他的目光和蔼温柔，还带了几分自豪。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每逢人们提起这位学者，我眼前常浮现出一幅亮丽的图画：金色的夕阳洒满了大路，路旁灰白头发头顶已秃的吴宓教授正在漫步，而两只美丽的小蝴蝶正轻盈地在他身边翻飞……

此时与妈来往较多的还有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散文作家苏雪林¹

教授。雪林教授说话带浓厚的安徽口音，留学生式短发，身材瘦削，作风朴素，为人直率，有时甚至有几分天真，对我们小孩更是十分宽容。记得每次她进我家，总手提一篮菜，在门口高呼：

“君允！君允！”她们大多议论文学或天下大事，高谈阔论，挺痛快的。妈妈很欣赏她，总对我们说：“苏雪林真是个老实人。实实在在。我真是不懂，她为什么要怕共产党。她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有什么可怕的？”解放前夕，她离开大陆去了巴黎。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以后的岁月里，妈妈还常惦记她。

1苏雪林（1897—1999），女，安徽黄山市人。我国20世纪30年代杰出女作家，笔名绿漪。著有散文集《绿心》等，文笔优美。散文《扁豆》解放前曾被收入中学教材。历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晚年在台湾潜心研究《屈赋》。

性美的归来与舞会

1946年深秋，哥哥性美从青岛回到妈妈身边。他用自己数年的积蓄支付学费，进入武昌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经济系二年级。

性美是家中长子，他对妈的不幸婚姻与境遇的理解似乎比两个妹妹都深刻一些，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194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重庆的中央大学，一人在外闯荡。妈妈为了这个不谙世事的儿子不知操了多少心、生了多少气。在乐山时，每逢接到重庆亲友的投诉信，妈妈经常坐在门前台阶上望着大佛生闷气，一面喃喃自语：“有什么办法，自己生的呀！”我当时很可怜妈孤单一人要面对这么多问题，一面也很担心一人在外闯荡的哥哥，但愿他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不久，哥哥干脆辍学去驻华美军任翻译

了，这时全家人又都十分想念他，求老天保佑他平安。

哥哥终于回到妈身边，要“立地成佛”开始读书了；妈的高兴自不待言。此时此刻性美变得成熟老练多了。在家里他实际上是妈妈的有力助手，有个时期他每日负责买菜；在经济上妈妈若有什么大困难他还能调剂些许；有一学期还给我付过钢琴学费。在学校里他也发奋读书，出类拔萃，深得同学与师长的好评。

但性美绝非书呆子，他自幼爱活动。1946年他刚入华中大学不久就邀了老同学姚应禄去逛汉口旧货市场。结果两人兴冲冲抬回一只咖啡色的木质大方盒。打开一看，呀，原来是一台手摇留声机。别小看这二手货，它音质优美共鸣强，造型也典雅大方，我们全家人都乐开了！于是立即行动起来，各显神通，借来许多音乐唱片——那时已开始有密纹唱片了。先是听得如醉如痴，后来就无师自通，大家翩翩起舞。从此每到周末我家必是青年朋友聚会的好去处，音乐声不断，欢声笑语不断。

客厅里舞曲一首接一首，年轻人得意扬扬地在旋转，这时妈妈总是躲在卧室里把门一关，独自坐在灯下，或看书报，或填词赋诗，或写信、做针线。她也正以自己的方式休闲，享受自己的夜晚。过一会儿，独处够了，她就走进客厅笑嘻嘻地和大家打个招呼。这时男孩子们就会赶快走上前去，要求和“朱先生”共舞一曲。妈妈也总是欣然允诺，随着音乐优雅地和年轻舞伴款款起舞。这时我心中总是暗自赞叹：Home, home, sweet, sweet home! 我的家庭多么可爱呀！

在这些最简朴（把脚气粉撒在地板上充当滑石粉，把蜡烛插在大红萝卜上取代电灯）的舞会里，年轻人兴高采烈，欢畅无比。但只要妈妈出现，她永远是舞会的皇后，大家的目光总是注视着这位风度优雅、满面笑容的老太太。至于劳苦功高的舞会组织者，我想

应该说是性美吧？因为那架奇妙的唱机是他买来的呀！

“六一惨案”前后

妈妈在家里，既为人母，又为人父。只要情绪好，她和蔼慈祥、开朗豁达，温暖着整个的家。由于她长期单独地挑着养家糊口、哺育子女的重担，练就了一副铁肩膀，对许多事她都从容不乱、举重若轻。

这样一位职业妇女，她在社会生活中也必然扮演了某种角色。解放前两年，在那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不管她自觉与否，必然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这也是她那刚正不阿的性格所决定的。

1947—1949年，人们在政治上视她为激进的“左派”，其实那是一场误会。解放后的1958年，妈妈又被划为顽固的“右派”，那更是一场辛酸无比的“闹剧”。客观地看，朱君允根本就不懂政治，她什么“派”也不是，从未参加过什么党，她有的只是一颗真真实实的中国心。她身上始终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风骨，同时也有西方教育所培养的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不懈追求。这就形成了她那忧国忧民的不解情结。她终身都是一个“天真”的穷教授，从来不懂“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就连最起码的“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等政治经验也缺乏。朱君允像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始终信奉“秉公直言”、“不平则鸣”。

解放前两年，妈妈正处在这么一个“不平则鸣”的状态中。国民党的荒淫无耻、腐败无能，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她自己一个柔弱女子孤身奋斗的切身体会，这一切都使她对那个恃强凌弱、充满欺诈与掠夺的旧社会极端不满。尽管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温暖，但每逢周末我从希理达女中回家总感到有一股愤懑之情在

她胸中抑郁着。那时物价飞涨，一发工资就得四处抢购粮食与日用杂货。我和哥哥都住在学校里，这副生活的重担就全部由妈妈和因病辍学在家的姐姐性慈两人承担。她们四处张罗。妈妈还要教课，不敢懈怠。

这阶段妈有时出去参加一些集会，针砭时弊、评点时势。有人请她发言，她便直言不讳，一吐为快。她完全不懂“考虑后果”，不想她的话会得罪什么人。1946年发生在昆明的“闻一多事件”

只使她愤怒，却没教会她害怕与畏缩。其实除参加公开集会外，她也并没和任何进步学生有个别的接触。

1947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上极不平静。“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呼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学潮如涌。这些也都是我们家庭饭桌上的话题。我们三个子女还懵懵懂懂，妈妈却比较敏感，发表议论最多。

1947年6月1日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

5月31日晚9时许，我们全家都收听到了北方学潮的消息，知道北大、清华的进步学生已被逮捕。当时妈妈就说：“等着瞧吧，武汉也快了。”但她绝没想到，厄运就在次日清晨降临在她自己身上。

6月1日清晨4时许，天还没亮，电灯就突然亮了（当时武大自己发电，每日晚6—10时供电）。我们全家都翻身起床，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往学生宿舍方向望去，灯火通明且人声鼎沸。数分钟后我家门口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有人喊：“朱君允先生，请你出来一下。”哥哥应声在门内问：“有什么事吗？”外面人说：“学生打架，请朱先生去劝阻一下！”我们都感到来者不善。妈妈则示意性美答：“学生的事朱先生不管，请你们去找训导主任吧。”

敲门声已越来越粗暴，哥哥抵挡不住，只好将大门打开，只见闯进来三位戴礼帽与黑眼镜的汉子，手持枪，厉声喝道：“请朱先生马上和我们走一趟，汽车就在门口。”妈妈见势并不慌张，十分镇静地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就来。”

性慈和我忙帮妈妈穿戴整齐。妈妈的镇静也给了我们力量。妈妈匆匆嘱咐了我们两句，就被三名特务押着进了一辆破旧的黑色小轿车，一溜烟消失了。

此时天色已大亮，学生宿舍那边突然机枪声大作。我们三兄妹面面相觑，知道大势不妙。但妈妈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直发慌。这时哥哥在武大的一群好友也都闻讯赶来我家，气愤不平。听完我们的叙述，他们就讲如何在宿舍内与国民党军警拼斗的情况。天还未亮时，国民党军警已将机枪架在宿舍顶楼，特务们按黑名单绑架了一批学生，塞入停放在宿舍楼前的军警车内。学生见状群情激愤，很多人就冲下阶梯用石头砸警车救人。军警立即在顶楼朝群众开枪扫射，三位同学应声倒在血泊中，而警车上部分同学却被营救跑掉了。

6月1日的夜晚，整个珞珈山笼罩在黑色的恐怖中。人们都恐慌地议论：“今晚特务若是再来怎么办？”学生们聚集在图书馆内，准备拧成一股绳集体对付强暴。武大校方已无法再发电。我们兄妹三人围着一盏油灯坐在黑暗里，好在身边有许多好朋友与我们分担忧愁。据云校方已出面营救被捕师生。

第三天中午，妈妈终于回来了。

还是那样一身穿戴，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只是面色略显疲惫。

原来武汉警备司令部知道已有同学被枪杀，事情闹大了，就不

敢再造次，对几位教授也不敢十分无礼。经武大校方保释，六位教授先后被释回校。

妈妈还是妈妈，她略显兴奋，似乎人生的经历中又增加了一页新东西。但她既不在人前炫耀以英雄自居，也不畏缩吞吞吐吐，她仍是谈家常一样说：“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倒是大家受惊，同学们受罪了。”最后再轻声加一句：“国民党真混蛋。”

然后就是“游行示威”。愤怒的学生群体要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传云国民党特务可能又要大打出手，与学生正面冲突。记得曾有同学来家希望妈妈能带头参加，鼓舞士气。

但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三个子女在内，都恳求妈妈不要去，以免发生不测。母亲始终沉默不语。经过再三考虑，她还是决定去参加游行，表明绝不惧怕任何强暴。我们三个子女再三恳求：“妈，您再也不能去了。我们都害怕了，出了事怎么办？”听了这番话，老太太真生气了，她正色批评我们道：“你们三个人，个个都没用，胆小怕事！”她最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游行，又平安地返回家来。

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但最让母亲恼火的却是那些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的亲戚，他们都来信劝阻她不要卷入学生运动。老太太看了这些劝她做顺民的信就一把撕碎，还自言自语：“我自己的事，自己负责！”“我要真出了事，你们谁也不会管，也管不了！”这倒是实话。

1947年对妈妈来说，是多事之秋，不测事件接踵而至。

“六一惨案”不久，8月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妈妈突然发生食物中毒。她上吐下泻，最后竟吐得狂笑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哥哥

只得冒大雨将校医请来家中，经服磺胺药两小时后病情才逐渐稳定。自此，妈身体元气大伤，但当时条件无法进一步调理，只有在家中静养。妈妈心中始终郁闷，肝火甚旺，烦躁不安。

也是1947年的初冬，一个周末，我们全家都去武大礼堂观看《金玉满堂》的演出。回家启锁开门一看，满室狼藉，衣物四处散落。

而卧室的窗子则洞开，显然盗贼曾来光顾。只见地板上撂着两个大包袱，里面全是我们的衣服。原来窃贼作案尚未毕，主人已归家，只得仓促弃物跳窗而去。我们则是虚惊一场。另一次，窃贼却得手了。

一个大晴天，妈妈把她贵重的衣服都挂在院中晾晒吹风，不料全部为窃贼一把掠去，片甲不留，呜呼！要知那年月再也添置不起新衣，其中有几件还是抗日战争前缝制的。我们全家人都心疼又无奈。

那本来就是一个令人心疼又无奈的年月。中国的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盗贼四起；而革命的浪潮即将席卷全国，正是阴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妈妈在她的旅途中，学习着她的经验，体味着她的人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风格，越来越豁达坚强。

中学毕业

1948年初夏，我高中毕业了。

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希理达女中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母亲也应邀参加了。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校长沈祖英所做的精心安排。小小

的礼堂粉刷一新，每个窗口都悬挂着碧绿的蔓条植物，顾长而柔软的嫩绿枝蔓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婀娜多姿，给礼堂增加了青春与喜庆的气氛。班上二十余名同学，着白色校服，个个容光焕发，就像株株凌波仙子。我爱班上的每位同学，两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摩，情同姐妹又胜似姐妹。记得那天我有幸代表毕业班向来宾及师长致辞；后来又参加了六人的女声小合唱，柔美和谐的歌声表达了我们依依惜别之情。我看见妈妈端坐在台下，露出欣慰的笑容。

她含辛茹苦近二十载，总算又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绩。最小的女儿三娃儿今天中学毕业了。在那动乱的年月，一切都来之不易呀！母亲坐在那里，穿着一袭深色旗袍，仍旧端庄秀丽。

离校前与校长握别时，校长宽容了我平日对学业的疏懒等种种顽皮劣迹，要我“学业完成后，再回到希理达女中来教书”。这番话使我好生意外。天知道，我在班上挨校长公开批评最多的一个。但母亲却能理解这位老校长办学的苦心，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学校两年来对我的培养与教育，感谢校长对我的宽容与谅解，以及殷切美好的希望。我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些话。

回想起来，正是母亲、学校、师长及那么多好同学对我的种种宽容与谅解，才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解放前夕

中学毕业后怎么办呢？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

我的理科成绩一直很差，不可能考上国立大学。不久我收到了妈妈的母校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当然想去，但昂贵的学费却使我望而生畏，妈妈也表示毫无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侨居美国的著名音乐家赵

元任老先生寄给他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女儿赵新娜女士美金二十元，要她资助任何一位无钱求学的中国青年。我拿了这笔钱，如获至宝，它正好可以支付一学期的学费了。

1948年秋冬，我和好友桂华珍都在南京。初冬，解放大军攻克徐州，矛头直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南京城里人心浮动。国民党又在大规模地逮捕学生。学校几乎被迫停课。对我来说，反正下学期学费也无着落，兵荒马乱，还是回武汉到妈妈身边吧。

妈妈是擎天大树，永远枝繁叶茂。即使在动乱时期，她仍是从容自若。从南京乘轮船回来，妈去码头上接我了。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但隐隐觉得她并不快活。物价飞涨，生活更加艰难。

我暂时在武大外文系借读。

这时我们搬入了武大特三区的新居——一套四合院式的西式平房。大门外碎石马路旁即是一片广阔的稻田及油菜畦，东窗外可见远处闪烁发光的东湖碧波，还有草木青青的磨山。我们在这套房子中一直居住到1959年妈妈被划成右派被迫退职到天津性美处。

说起这套房子，要感谢吴宓教授。

新居本来是分给他的。但这位绅士学者一向独居，生活极端俭朴。偶尔女儿们来探望他小住一段，跟我们一家也是楼上楼下，来往较密。他见妈妈带着三个成年子女住得较拥挤，就很诚恳地对妈说：“君允，我反正一个人，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干脆，你带着孩子们搬过去住吧，总要宽敞得多。”

当时学人们生活虽清贫，但对物质利益却比较淡泊，来往关系也都自然友好。吴伯伯自己住不了的房子就让给朋友去住，似乎也顺理成章，并没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给予的人慷慨坦诚，接受的

人也爽快高兴。

这样我们又兴高采烈地迁入新居，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

只是房子地点比较偏远，晚上周围一片漆黑，灯火稀疏，在那个年月未免令人感到几分不安。有人送了我们一只机灵活泼的小黑狗，取名Tango。白天它总和我们嬉戏逗闹，舔我们的手脚，夜晚只要稍有动静，它就警惕地吠叫起来，因此深得全家的宠爱。

后来我们三个孩子都离家了，倒是Tango给妈妈做伴，又度过了若干岁月。

1949年春，解放军乘胜前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逼平津，北平已是兵临城下，即将解放。解放军将横渡长江解放江南地区也已成定局。记得当时的青年朋友查其恺也从上海交大回到珞珈山借读武大。他快人快语，很喜欢和我们全家侃大山，淋漓尽致地评点时局、分析时势，是他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本《论联合政府》，不知什么人也塞给妈妈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于是我们全家都有机会读到了这两本小册子。读后全家都很兴奋，觉得毛泽东主席讲得头头是道，已为建设新中国绘出了科学缜密的蓝图。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全家人都兴奋地期盼着解放。

1949—1966，珞珈山·天津

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两句歌词也同样可以描述我们当年全家人的心情。

1949年5月1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未动用一枪一弹就威武雄壮地进入了武昌城，路经武大校门口，沿途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武大的许多师生也都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涌往校门口，一睹人民解放军的军威。

从那天起，我们的家就像一锅微沸的水，不断冒出小小的气泡。特别是吃饭桌上，兄弟姐妹一到齐，就爆出各人的新见闻，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什么《白毛女》歌剧的演出啰，不但灯光布景漂亮富于变幻，还有几十把小提琴伴奏呐。什么解放军官与兵简直分不清哦，不但穿戴差不多，官还给兵倒茶递水，像亲兄弟呐……

种种新鲜事，不一而足。

1949年8月酷暑中，妈意外地接到了一张大红请柬；主人是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妈梳妆整齐，按期赴宴；我们三个孩子则好奇地等待妈妈的报道。果然不负众望，妈回来做了详细的描述：晚宴设在德明饭店，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部是解放军。

有趣的是他们身上都没穿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更叫人觉得奇怪的是那么多解放军只穿白背心，坐在那里却朝气蓬勃、正正派派，谈吐也很斯文，一点不惹人讨厌。一位知名的银行家还暗地向妈翘起大拇指轻声说：“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好的政府，到哪里去找呀？！”这句话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1948年夏，我插班考入武大英语系二年级。

如果我家当时像一小锅微沸的水，学校就像一大锅沸腾的水，热气腾腾，沸沸扬扬。学生们四处奔走，摇旗呐喊，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我也很快地被卷了进去，跟着同学们投身于各种宣传活

动，白天黑夜四处演出。

妈妈毕竟比我们老练成熟多了，碰见什么新鲜事，她也会兴奋，也要发表观感，但绝不狂热。她照旧上她的课，批改她的作业，不紧不慢地过她的日子。一个穷教授要操心的家务事可不少呀！

一次，一位邻居跟性美聊天说：“朱先生思想一向左倾进步，现在解放了，她可以干一番事业了。”性美把这话在饭桌上一讲，全家听了都不免一愣，颇感意外。妈只淡淡一笑：“干一番事业？

什么事业呀？！”

“捞取政治资本”，妈完全不懂。她也从来不是什么社会名流或大学者。她只不过是一个一生都自食其力的普通知识妇女，连教书都只开最普通的课，她也并不想出人头地。但她很自尊，绝不允许被蔑视或欺凌，这时的妈已渐渐步入老年，她希望尽快将子女抚养成人，过几天舒心日子。而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她确实看到了曙光，她为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站起来了的新中国而高兴，而欣慰，而精神振奋。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秋，我们家新添了一位客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派驻武大的军代表，兼任武大校委会秘书长，实际行使校长职权的徐懋庸。当年徐披着一件军大衣，带着两名秘书，一男一女，人称金童玉女，威风凛凛进驻武大，立即成为众人瞩目的新领导人，并形成了一呼百应的局面。

对母亲来说，徐懋庸完全是个陌生的名字；对他的背景与早期的种种表现她一无所知。据我现在分析，徐来探望妈妈，大概是为了联系群众，打开工作局面。母亲出于对共产党的尊重与好感对他

也热情友好，诚恳率直。后来渐渐熟悉了，周末徐还常带着金童玉女来我家跳舞，气氛宽松活泼一如往常。我绝没想到后来所发生的问题。这是后话。

姐姐性慈因病长期辍学在家，心中十分苦闷。初冬她有机会与老同学一起参加二野文工团进军大西北。妈起初顾虑性慈的身体吃不消，却又经不住性慈的百般恳求，最后便同意了。但三个月后性慈终因行军途中的劳顿病倒了，部队只好派人送她回家。这对性慈不啻是个打击，她卧病在床。妈妈始终坚强，她不断安慰鼓励病中的女儿，煎汤煨药，一声怨言也没有。

天性乐观热情的姐姐，不到半年就康复了。1950年夏，她考入了新成立的中原大学声乐系（现湖北音乐学院），圆了她学声乐的梦，找到了一个温暖的集体。

性美于1950年秋，谢绝了华中大学提供的留美奖学金，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去了天津。

至此，妈妈的三个孩子总算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妈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她似乎更精神了。

参军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了。

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学生发出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保家卫国”的号召。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号召不是对我发出的。说实话，我一直是一个爱好文学艺术，学语言、爱交友，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女学生。好像天生与严肃的部队生活无缘，更何谈残酷的战争。再说打

仗一向是男人的事呀！

但事态的发展迥非我所料。越来越多的同学要求上前线，其中有许多条件与我相仿、平日十分熟悉的朋友。食堂里要求参军上前线的决心书先是零零星星，继而铺天盖地而来。这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与激烈的思想斗争。左思右想，“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打人类最后一场战争”（既然埋葬了美帝，战争不也就消灭了吗？这是当时简单的逻辑），经风雨见世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我经得住残酷战争的考验吗？我胆怯了。但为什么别人都不怕呢？我心中一把自尊的尺子又无法使我原谅宽容自己。

其次，热热闹闹的四口之家现在只剩下妈妈和我两人了。我若再远行，孤独的老妈妈将如何度日呢？我吞吞吐吐把自己的想法和妈妈说了。妈却开朗得很，好像没当回事——她一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干脆果断，举重若轻。她说：“我一个人过怕什么呀？你要经风雨见世面就只管去。年轻人本该出去闯闯嘛，只有经历了战争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生。可是，三娃儿，你自己可要慎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清楚，不要去了又懊悔。”

妈的话无疑给我增添了勇气，我的天平开始倾斜了。胆小鬼熊性淑，难道只有你一个人的命才值钱吗？为什么只有你才胆怯呢？

去吧，我下决心了！既然是伟大的时代，就应投身于暴风雨中。我这狂热的小资产阶级，一下就进入了暴风雨前夕的海燕状态。

妈妈要为三娃儿送行了。适逢我二十周岁的生日，妈为我准备了一桌菜，请了几位平日要好的青年朋友来吃饭，我的男友张以增当然也在其中。饭桌上还是谈笑风生，说不完的趣事与笑话，虽然当时我心上已蒙上一层淡淡的离愁。

又到了橘黄色灯光下妈和我促膝谈心的甜蜜时光了。我们隔桌相对而坐。我凝视着妈夹杂着银丝的黑发，看着她那虽经岁月侵袭却依然清秀典丽的面容，心上涌现了无限留恋之情。妈，难道我们真要离别了吗？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聚。但这时我们都不愿触及这话题，只是随意从容地聊家常，乐融融的。妈一边轻松地和我聊着，一边低头飞针走线为我赶制一副黑色棉手套……这一情景我一直珍藏在记忆中。后来妈又为我精心制作了一个小巧的针插。

她用两块花格呢的边角余料做门面，又用黄色花布滚边，里面则是浅粉绒布的内蕊，就像一本袖珍型的书，好看又实用。这针插随我去部队，大江南北走遍了半个中国，我迄今仍将它放在我的针线盒内，几乎每日都要使用。针插面料已陈旧，但仍然小巧可爱。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传家宝，我妈妈留给我的的是朴素的爱心与勤劳的双手。

军事干部学校的名单确定后，妈为我赋诗一首。只记得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祝汝庆功归。

.....

诗一共四段，下面的我已记不住了。这诗我曾在全校的欢送大会上高声朗诵过。万分遗憾的是原稿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

临行的前夜，武汉大雪纷飞。清早醒来外面一片银色，树枝上裹了一层晶莹剔透的雾凇，好像大自然也制造了特殊的美景来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

妈妈是光荣的妈妈，戴上了大红花。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长大衣缓缓走着，微笑着，随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汉口车站。“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在歌声中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我不记得妈曾为我的参军远行流下一滴惜别的眼泪。妈那深厚的母爱不曾使她为自己有一丝打算，一丝考虑。她并不在乎自己老年的寂寞生活，她心中怀有的只是自豪与对女儿的深深祝福。以增后来一直对我说：“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一位母亲，她从来不考虑自己，她处处在为你着想。”

探亲假

1954年秋，我第一次由部队获假回武汉探亲。列车风驰电掣，我则归心似箭。我已整整五年没见到妈妈了。在这五年里，每逢重大问题，我总很自然地想到她，遇到问题总想妈妈不知会怎么想，怎么处理。我常在她的影响中为人处世，尽管母亲一生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我的迥然不同。但正如那个古老的比喻：女儿是一只放飞了的风筝，不论飞到哪里去，那根拴风筝的线，始终攥在母亲的手中。

几年来从她的来信中看出，母亲一直情绪高涨，精神振奋。那短短的信笺中总是兴致盎然地谈到学校的变化及武汉市的建设：哪里准备建造一条长江大桥，哪里开辟了新公园，哪里建设了新托儿所、幼儿园……一颗炽烈的爱国爱女之心跃然纸上。难怪每逢我接到家书，大伙总要围拢来催我：“念念，念念，咱们大家都乐一乐。”妈一定没想到她的信会使每一个在部队服役的游子都得到莫大的精神满足。1953年我从报纸上得知她光荣地被选为湖北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又知她当选为武汉大学第一届教工会的主席。喜讯频频，我并不感到意外：妈本来就是一个意志坚

强、有胆有识、豁达开朗的女子嘛。但她在给我的信中却从不吹嘘自己，从不提到她又当了什么“官”，任了什么新职。

1954年探亲假，我回到久别的珞珈山，跨进家门，却扑了个空。妈不在家。环顾家宅，房子分了一半给另一位新来的女教授潘耀琮先生。妈的两间房，卧室兼书房设在里面，外面则是会客及吃饭的地方。室内仍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洁白的窗纱（还是旧蚊帐改的）在秋日的微风中轻轻飘荡，欢迎远方归来的游子。听保姆说朱先生到教工会去办公了，我转身就往教工会走去。远远看见妈正迎面走来。她穿了一件绣花的白绸衬衣，面色红润，体态微丰，但一点没显老。不知为什么我叫了一声“妈”，眼泪就夺眶而出。

妈开玩笑地说：“哟，解放军怎么还掉眼泪呀？！”

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妈，还有男友张以增度过了短短一段和谐亲密的时光。我和以增的感情经过五年的离别与种种考验，已经成熟了。爱情是这样丰满甜蜜，芬芳四溢，妈也和我们共同分享着这份幸福。记得我们两个年轻人晚上坐在台阶上静听天籁，数着天上的星星，妈从房中走出，拥住我俩的肩头，左边亲亲我，右边亲亲以增的面颊。我们都沉浸在宁静和谐之中。月光如银，月光如水……亲情与爱情交织成一首美丽的小夜曲，长久地在我耳边回荡。

“六七老人”风波

在假期中，妈抽空将“六七老人”风波向我娓娓道来。这在当年也算妈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武大外语系已调整至中山大学；妈留在武大，主要从事校工会等社会工作。在女工部她为建立托儿所、缝纫组等四处奔波，尽心尽力，口碑甚佳。为“三反”“五反”运动后期扫尾工作，她曾和

当时还较年轻的韩德培教授一起，逐项落实。如我没记错，为了物理系一桩什么“铂金案”，两人曾到杂乱的仓库内翻了个底朝天。

但是妈说他们调查的结果常和前期领导的说法相左，为此她心中有些纳闷。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六七老人”风波。妈谈起来不免有些激动：大约1953年，武大党委曾接到一封署名“六七老人”

的信，引起轩然大波。信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徐懋庸当时在武大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这是现在的说法），说他工作作风粗暴，不实事求是。徐怀疑这位批评者“六七老人”就是爱提意见、心直口快的朱君允，遂派党员两次三番来家找母亲谈话，希望她坦白承认错误。一面学校广播（我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个大喇叭）连篇累牍地播放批判“六七老人”的稿件，造成一股威逼诱降的架势，给妈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

长期以来，妈对徐的工作作风、道德品质确实很有意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居然公开辱骂某些知识分子，污言秽语，令人不堪入耳。记得母亲说：“当时一排排女职工、女教授都坐在台下，简直无法忍受这些脏话，场面非常尴尬。我在下面也如坐针毡，但又不敢起身退场，十分难堪。”这是妈的切身体会。“徐懋庸在公开场合都是一副十足的流氓腔，怎么做大学的领导人？”

“六七老人”的事根本与母亲无关，她说要是她站出来批评，一定会直署其名，绝不拐弯抹角。但武大的党委一再出面找妈，摆出一副劝诱坦白的架势，这大大激怒了老太太。她给来人以冷淡的软钉子，就将此事干脆置之不理，任它高音喇叭叫个不停，但心中着实抑郁不快。后来邻居潘耀琮教授谈到这段往事时不止一次向我说：“哎呀，朱先生真是硬得很，我都为她担心死了，她可根本不

怕，依旧我行我素，不理他们那一套。”

不久母亲去汉口参加武汉市妇联的会议，碰见一向秉公办事的老党员钱瑛大姐。她们从不曾有过任何私交，只是偶尔在工作中有过接触。妈出于对老共产党员的信任，将心中的苦闷和盘托出。她实在想不通，有话在心里也憋不住。据说钱瑛听得十分认真，有的地方还做了记录。最后妈又问：“在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说我当年参加‘六一惨案’游行是爱出风头。我想不通。”钱瑛大姐立即尖锐指出：“你就问问说话的人为什么当时他不去出这个风头呢？”

虽然这场谈话后钱瑛没做出什么结论，更没承诺什么，但母亲却一吐为快，心情舒畅多了。

两天后妈发现学校的喇叭对“六七老人”事件突然沉默下来了。再过两天喇叭里竟传出了令她无法相信的消息：朱君允教授当选为湖北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校领导来向她祝贺时，她劈头就问：“那么‘六七老人’的事呢？”领导笑笑说：“朱先生，一场小小的误会就不要再提了。”母亲当时在政治上一派天真。她完全没想到她与钱瑛大姐的谈话有什么意义，对武大今后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好，不提就不提吧，她又兴高采烈地投入新的角色、新的工作中去了。

经过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组的认真调查，徐懋庸终于受到党纪处分，并很快调离了武汉大学。在他所犯的错误中，“六七老人”

风波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关于“六七老人”风波，我探亲假之前，妈从来没和她的子女谈过一个字。我现在将这件事尽我所能记叙下来不为别的，只觉得这件事很能反映妈妈的性格：刚正不阿，敢怒敢言，巾帼不让须眉也。也正由于她这一性格，妈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跌倒了再也爬

不起来，使我们子女及许多亲友提起来就心里难过。

重新上大学

1955年，部队要求所有女兵转业，我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

学，然后知不足。在部队教了几年文化课，深感自己文化根底浅，很想再有学习的机会。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中美两国形成了尖锐对峙的局面，英语确实派不了多少用场。妈认为我还年轻，极力主张我去学俄语。也好，我暗下决心，再重新掌握一门外语吧。

要扎扎实实，不搞速成。这样，我再次通过全国高考，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我重新和十八岁的小弟妹们混坐在课桌旁，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很多也比我年轻。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下，我思想产生了波动。我怎么会比人落后了这么大一截？难道在部队的五年真是虚掷了年华吗？但人终究得面对现实。而毕竟我有较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很快就钻入俄语的浩瀚大海中去了，学得游刃有余，轻松愉快。经一路拼杀搏斗，在全年级一千多学生中，始终名列前茅。虽说1958年后头戴“白专”帽子，却仍深得同学与老师的尊重。这样，我心中稍许得到一些无奈的安慰。但花了四年时间与精力去掌握的俄语，在我日后的工作中却丝毫未派上用场，这不能不令人痛心。时势变化莫测，大时代的小人物，奈何？

母亲似乎一点也没体会到我的复杂心情。她的心永远乐观，勇气十足。她好像比我更年轻，更单纯。回想她的一生比我坎坷得多；但从不见她后悔什么，计较什么。也许正因她始终处在生活的重压下，肩上的担子重了，脚步匆匆又沉重，迈出一步就不容后退，因此她已无暇来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她永远朝前看。

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中给苏联老师写俄文信，她坐在旁边看着，脸上洋溢着惊喜，轻轻地说：“进步多快呀，才学了一年就能写信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为了女儿些许的进步，能像孩子般高兴。

三娃儿出嫁了

1956年以增准备赴苏留学，我们就于8月8日在炎热的武汉举行了婚礼。妈因须如约去天津看望小孙女熊敏，所以不能参加婚礼。尽管如此，她的喜悦我却体会到了。她说：“哈哈，三娃儿总算要出嫁了！”妈送给我一瓶贵重的苏联香水，带我去东安市场买了双红色软羊皮女鞋，还有一顶盛锡福的镶红缎带边的女式草帽。

礼物精美而轻巧，正合我心。

我们的婚礼在华中工学院一间大会议室举行。像许多50年代的婚礼一样，俭朴而热闹。记得是妈的老友查谦院长主婚并致辞。

因在以增工作单位举行仪式，一切由他操持，我这新娘就很轻松了。我只去扯了一段两毛五分钱一尺的粉红色麻纱布；亲爱的张伯母（张资琪夫人）亲手为我缝制了嫁衣。只见她一双巧手在我身上比比画画，一天后就缝成了一件合身的连衣裙。粉红色宽大的裙裾就像一团轻盈的云雾在我腰下展开，令我和以增都惊喜万分。就这样，新郎和新娘高高兴兴手牵手步入会堂。那晚，许多华工的“名流”都到场助兴，气氛热烈欢快。许多同龄人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津津乐道这场婚礼，一切都历历在目。

丑小鸭三娃儿出嫁了。

妈没能出席婚礼却给了我深深的祝福。婚前婚后妈反复教导我

一件事：我的婆母陆珊女士文化虽不高，却善良仁慈。她带大以增实非易事。妈要求我今后好好孝敬老人，给她安慰。妈很喜欢以增，不为别的，只为了他对三娃儿的挚爱；妈很满意这门亲事，也因为懂得经过许多波折与考验，三娃儿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妈的脸上和我们一样，溢散出幸福的光。

风云突变

1957年春节后，我在北京染上肺结核。以增将我接回武汉妈妈身边，以便照料。

回到了母亲与丈夫身边，重叙融融天伦之乐，我尽管重病在身，也很愉快。本想休息一下游子的双足，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在家我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目睹了巨大的双连环灾难。

正是在那个充满盎然生机的1957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了。只见妈妈终日忙碌于各种会议。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校工会主席，热心快肠的朱君允认为应“积极”投入运动，帮助党整风。她身先士卒，实话实说，觉得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凭良心说，妈解放后可谓一帆风顺，从未受过什么大冲击，若单从个人出发，她对党毫无怨言，相反，她倒不止一次地说过：

“要不是解放了，哪有我朱君允的今天。”但是在大量的社会工作中她也确实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肃反运动，她听到不少怨言。她觉得领导上粗暴地审查了一些对象，后来却轻描淡写，不了了之，没有给人家公开做结论，澄清事实。在会议上，母亲就此问题秉公直言。1957年6月北京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她又曾在武大广播中播放了一则通知：本校或邻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职工

若有材料向中央申诉，可交“本人”呈送。果不然，两校都有人来找母亲谈话，送材料。母亲一一耐心接待，视此为自己的职责。

正在妈投身运动时，风云突变，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妈像当时许多头脑简单的百姓一样，一时晕头转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但现实就是现实。

临赴北京开人大大会前，以增和我都劝妈头脑要灵活，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千万不能说了。妈说：“我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果然，在北京开会期间，她并未将别人的材料交出，也没发言。但她毕竟缺乏政治头脑。回汉后，因天热竟原封不动将材料束之高阁，放在家中的衣柜中，似乎万事大吉，欲等秋凉后，再将材料退还当事人。天呐，如此反动材料，竟不去揭发检举，而窝藏于家，立场何在？岂不是要为反革命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7年暑假表面上平静地度过了。

1957年10月，“东窗事发”，大难临头。

有领导或其他什么人来找妈做了两次严肃谈话，均谓妈在武大整风期间公然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并在群众中“煽风点火”；见形势转变后又“窝藏材料”，企图“蒙混过关”。迄今，我所能记忆的朱君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就是这些了。

可怜的老太太，这是一记沉重的耳光。她绝未料到原以为是恪尽职守的事却讨得如此的斥责与数落。她血压突然升高，两颊绯红，双眼充血。她坐在桌前发愣，思前想后，她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立场问题，更谈不上罪行。不是党公开号召人民群众帮助党整风吗？想到这里，她的幻想又升起来了。只要认真检讨，总会取得党

和人民的谅解。有意见为什么不能向党反映呢？她甚至还希望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前，她的检讨可以通过。她一定要去观礼，这座长江大桥她曾如此关注，如此引以为骄傲。

但事与愿违。她的检讨交上去毫无回音。没有人来邀请她去观礼，也没有人来串门了。不久，学校里对朱君允的批判会接踵而来。我只能“积极”地帮助她写检讨。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们母女两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我这一端拼命要给她上纲上线，不这样怎么过得了关？她那一端却顽固地往后拉，她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她只是要指出工作中的缺点，瑕不掩瑜嘛。“我是人民代表，人民选我就是出来说话的呀！我有责任向党反映各方面的意见。”这时我才明白，妈的责任感是根深蒂固的，花岗石脑袋开不了窍，我束手无策。妈昼不思饮食，夜不成眠。血压不断升高，健康继续下降。妈妈再次在巨大的痛苦中煎熬。但是出路在哪里？在灭顶之灾的面前，她仍坚持自己的信念。

1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在大门缝下发现了一份折叠整齐的“反右快讯”类的报纸，上面“右派分子朱君允”等字赫然在目。行了，帽子终于戴上了！接着又是一系列的批判会。

妈被勒令每日去清扫教学大楼，改造思想；她尽己所能地干着体力活，毫无怨言，但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朱君允戴上帽子后，领导也开始找女婿张以增谈话了。他们自有一套逻辑：“作为肃反干部，你并非不了解情况。你为什么也在会议上攻击肃反运动？你是否受了岳母朱君允的指示？”

1958年5月，后来听说是为了凑足右派指标，以增也被戴上“桂冠”。是年他仅三十岁，身强力壮，风华正茂，原是可以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但他的头脑与四肢都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再不可

能“乱说乱动”了。这是时代的悲剧。

记得我俩出去散步，走在细细的田埂上。眼前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香气袭人。可我的丈夫，一个那么积极向上、纯洁善良的人，却低着头流泪了。我的心再一次下沉，下沉……又忙跑到华中工学院去帮以增上纲上线，去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我家双连环灾难临门。

这是家庭的不幸，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知识分子家庭惨遭此不幸。它也是国家的不幸，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病痛折磨

待我帮以增完成检讨“大作”回到珞珈山，等待我的却是更大的不幸。

妈妈病了。妈见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忧郁的目光询问地望着我，她想知道以增究竟怎么样了。但她自己右腿无力，行动十分不便，而且右背疼痛。

她已开始治疗，每日早上在烈日下拖着病腿，拄着拐杖，行走一里地穿过武大校园，再搭公共汽车去市中心针灸。朱君允不是软弱之徒，她不会一蹶不振，她要顽强地生活下去，夺回健康。后来我就陪她同去，炎炎烈日当空，回家来我们母女二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但不曾听妈叫过苦。只是走进武大校园，一路上遇见那么多熟人，却再也见不到一张亲切的笑脸，甚至连最简单的招呼也没有了。大家对我们都“视而不见”，好一派肃杀之气，令人凉从心底升，不寒而栗。但妈和我都装作无所谓，从不触及这话题。

不久，妈决定住进同济医院，但几经折腾也毫无进展，那条腿

却越来越沉重了。这时以增的母亲，我那善良慈祥的婆母把妈从医院接到她家去住。管它什么左派右派，她始终尊重妈妈，同情妈的遭遇。许多次她都悄悄地对我说：“朱先生可是个好人呀！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她怎么能不气病？”每日她清早就提着菜篮出去采购。在那蔬菜都不易买到的日子里，她想尽办法给妈调理伙食，安慰母亲，一片真情实意至今令我感动，令我无法忘怀。

1958年秋，我毅然辞别了病中的妈妈及劳动改造中的丈夫，回到北外去完成我的学业。但这时我的心却充满了无法诉清的苦闷。我的心牵挂着武汉的亲人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血浓于水与思想改造

性美知道妈妈患重病可能瘫痪的消息后，十分焦虑不安。他无法想象将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单独留在武汉，后果将是如何。

于是毅然请假返汉，帮妈办妥了退职手续，将妈接往天津同住。对妈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养儿防老”了。嫂子志安也通情达理，她当然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住进一个政治上被定为右派、生活又无法自理的婆婆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但她并没说什么，只是积极准备接纳。

回到珞珈山，性美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冷酷肃杀之气，没有人搭理他，更不提帮忙处理各种杂务了。要知道当时能批准右派分子朱君允退职，就算是极大的优待了。临行前一天，武大一位负责人来我家，面无表情，像背诵文件一样对性美说：“朱君允反党反人民，罪行累累。但组织上对她宽大，发给她今后生活费一千元。

朱君允思想反动且顽固，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源的。你接她回去，要监督她好好改造，万万不可轻敌。”母亲在旁听着，沉默无语。经过多次批判会，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侮辱方式了。

对母亲来说，武大的确是块伤心地。妈在武大整整工作了十七年。回顾这一阶段，妈尽了最大的努力：她独自抚养了三个子女成人；她恪尽职守，为社会与学校做了许多“杂事”，而从不曾索取任何回报；更不谈她教了多少学生，和多少青年学子做过好朋友。

她努力地登着人生的各类陡坡，也取得过种种小小的胜利。但在一场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被一道闪电猝然击倒。

勇士终归是勇士，被打翻在地的母亲并不怨天尤人，灰心丧气。即使在严重的疾病折磨下，她仍高昂着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我始终未见她流过一滴泪，只见她紧抿着双唇，咬紧牙关。离开武大也好，在武大妈已被高度孤立，别人都怕沾亲带故惹上腥臊，连看病也困难。

在天津，性美、志安对妈仍是血浓于水，尽力给予安慰、鼓励以及关怀。性美当时身上也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精神上有很大压力，度日并不轻松。但他在关键时刻要尽儿子的天职。嫂子志安更是心地善良，耐心贤惠，在繁重的教学与“班主任”工作之余，省吃俭用，精心安排家居生活，丝毫未叫妈操劳过。

总算苍天有眼，在天津志安找到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一赵以宸大夫。赵大夫见了病人立即做出诊断。妈也愿意勇敢地接受手术，于是切除了脊椎内压迫神经的肿瘤。经过一段休息，妈又奇迹般逐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可以在室内及房前慢慢活动了。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怀着大病初愈的喜悦，母亲心里又升起了希望。这时她最大的追求就是摘帽。

性美经南开大学党组织向天津市委做了接右派母亲返津同住的报告。天津市委在政策掌握上相当稳健，做了两项安排：一、安排母亲在市政协的一个小组学习，但未公开她的右派身份；二、档案交当地派出所，由派出所与母亲保持联系，协助思想改造。

这在当时可谓一种极不寻常的优待。60年代前期，物质条件虽十分艰苦，但政治环境还相对宽松一些，居津后母亲尚能保持一段平静的心情。

老太太此时兢兢业业，改造思想十分努力，不敢丝毫懈怠。她每天认真读报，晚间也在昏暗的灯光下戴着老花眼镜孜孜不倦。

五八、五九年冬春，性美去河北农村做人民公社调查，回来后她就问儿子土地深翻为什么能使粮食产量“翻番”，小土炉炼出的钢除了打造农具，还有多少送工厂制造机器等。那时中国已经在“三面红旗”的凯歌声中一步步开始品尝三年灾害的苦果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说实话，性美也处在十分的惶惑中，只能不断用“听党的话”说服自己，再说服母亲。母亲十分认真地听，有时还做笔记。

另外她也特别用心，学习批判苏修的文件。她心里一直有个疑团：

既然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那么大成绩，为什么老百姓的口粮却这么少？后来读了这些文章，她似乎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粮食和猪肉都运到苏联还债去了！她以此来为政府的工作辩解，更以此来说服自己“要相信党”。

母亲当时迫切的愿望就是摘掉帽子。她十分怪罪自己，觉得拖累了儿女，对不起儿女。因此她拖着病弱的身体，总想摆脱困境，再爬起来，以免拖累子孙。至于政治上究竟孰是孰非，她并不十分

计较了。她总是强调自己，“加强改造”、“相信党”，因此多少也学会了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只是不经意时，那股诚实坦白、实话实说的劲头儿又会流露出来。妈那花岗岩脑袋是几十年造就的，此生此世还能改造得了吗？

那时南开大学派出所负责母亲思想改造的一位民警是张凤鸣同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性美家一次，与母亲聊聊各种看法，和风细雨，态度亲切，时间长了，母亲也很愿意与他交流自己参加学习的心得及对时局的各种看法。1963年前后张凤鸣同志曾对性美说，朱君允这么大岁数，仍和大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也并未放松时事政治学习，确实不易。希望她写个系统材料，争取把右派帽子摘掉。张凤鸣同志的这个评语是很实在的，与人为善。对母亲当然是个极大的鼓励。在此，请容许我们兄妹，向这位普通的民警表示最诚挚深切的谢意。我们感谢他的善良，感谢他的实事求是。在那样一个极左狂热的社会气氛下，他能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为一个病弱的老右派说几句公道话，多么难能可贵！

患难见真情

1960—1962年期间，母亲和性美家又一起忍饥挨饿，共度灾荒。

国庆十周年后，和全国城市的普通家庭一样，性美家除了定量的粮食和些许分配的副食品外，已得不到什么食品供应。志安开始浮肿，每天还坚持去学校上课、坐班；性美有些余暇，不得不上街搜购食物。副食店有时有些“限量以外”的萝卜、白菜和豆芽，一上柜就一抢而空。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家人就只好在做饭的方法上打主意，用“增量法”，实际上是吃稀饭。母亲饿得嚼茶叶。记得抗日战争在四川时，她也常嚼茶叶，把荤菜等省给我们兄妹，可那是四川嫩绿喷香的茶叶呀。而这时母亲所嚼食的，却只有掺在茶叶

中的茶梗了。

1960年底为迎接新年，一天志安从学校回家，把学校聚餐时舍不得吃的一饭盒红烧肉分给家人。母亲吃了两小块，就把她那一份让给孙女熊敏吃，推说许久不吃荤菜了，所以“吃不下”。性美心里明白，母亲是故意将营养品留给孙女，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孙女的至情关爱。

1962年后，经济情况略有好转，天津餐馆开始有些高价菜品出售，食品店也卖些高价糖果。但僧多粥少，要在商店开门前很久就去排队等候。性美全家一包括老太太一假日都去排队“改善生活”。有时母亲也用她极有限的零用钱买些高价食品，但总是尽量留给孙女。时间一长，志安和性美都注意到了，就劝老人自己多吃一点保存体力。但母亲总轻声应答：“吃的东西不够，先顾孩子吧。”

可是有一天，她忽然不经意地又冒出一句：“我真搞不懂，如果生产形势真那么好，除了还债给苏联，怎么连孩子们的粮食也不够呢？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呀！”这是她认真“思想改造”，苦苦思索后迸出的一句真心话。

已是风烛残年的朱君允，她能忍饥挨饿，能把嘴边的营养品让给儿童，但是她无法不说真心话。而真心话往往是一针见血的，无论怎样搪塞，都无法掩饰事实真相。天气转暖后，老太太就搬个小板凳儿，坐在家门口的一溜空地前，细心地除石翻土，花许多时间来种菜。她希望能帮助家中解决一些蔬菜问题。皇天不负有心人，夏秋之际，门前果真长出了不少新鲜蔬菜，藤蔓依依，春华秋实。

全家人当然也都兴高采烈。母亲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感还填了几首词：

阳春曲（咏小圃新秋）

玉米

黄澄粒粒玃珠价，碧润株株串宝财，万民饿饱赖多栽。风雨顺，老幼笑颜开。

豆荚

花残半靥香犹在，粒嫩三星荚未开，晚风牵蔓上阶台。和露折，翠滴沁心来。

丝瓜

施肥润土殷勤侍，搭架牵藤仔细培，黄花翠叶映窗台。清夜月，绿洗玉瓜罍。

辣椒

欢娱苦辣原非命，清露骄阳等玉醅，古来金石为诚开。调羹味，赚得友情来。

这些逆境中的创作，丝毫也未曾流露苦闷与抑郁不满，字里行间全是对大自然慷慨赐予的衷心感谢与深深赞美。这是与母亲天性中的豁达与乐观分不开的。妈毕竟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即使风雨交加，风雨如晦，她还是能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她吟诗填词，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增强生活的勇气。可惜许多这时的诗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失了。

性美当年的一些同事也都善良热心，从不歧视孤立她。只要有可能，他们都愿意抽暇与老太太聊聊，鼓励安慰她。特别是何自强老师，为人真诚开朗，他理解母亲的孤寂与落寞。有一天曾对性美

说：“朱老师太闷了，你们应多抽时间陪陪她，一个人总是闷在家里，怎么打得起精神？”

以上几首词，就是妈妈于1962年刚写完就赠给青年朋友何自强老师的。妈一直极珍视友谊，谁对她真心好，她总是念念不忘。

时过境迁，三十六年后母亲早已过世，何自强教授也侨居美国了。

中国早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1998年何教授自美返津探视诸老友时，居然又在故居的收藏物中发现了这几首故人之作，为了表达他对老人的缅怀与尊重，何教授又将这几首旧诗赠还给性美。这其中蕴涵的人世沧桑与人间的真情，真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也堪称母亲当年在逆境中留下的一段佳话吧。

母亲的老友孙亦梅女士也曾于60年代初期专程从北京来天津探视，丝毫不顾忌被牵连。妈曾来信向我描述了这次来访：“孙娘……依旧光彩照人，她一双秀眼依然明亮……”两位老友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怎能不互诉衷肠？她们永远互相信任，互相倾慕，是真正的知己。妈虽处在政治逆境中，孙娘也从不曾向妈絮叨过诸如“加强改造，重新做人”这一类套话，这一点是我们子女都无法做到的。

追记她们的友情：妈像修竹，清新高雅，孙娘却恰似怒放的红梅，芬芳四溢。她们永远互相慰藉，相映成辉。逆境见真情。

不尽的母爱

现在容我回过头来，再追述1960年我离开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配到武汉测绘学院工作前，去天津与母亲话别，及以后与母亲津汉

两地鱼雁往来的情形。往事悠悠，这又是一段永远无法忘怀、无法割舍的母女情。

1960年9月，我毕业后赴武汉工作之前，特意赴天津向大病初愈的母亲辞别。

短短数日相聚，母女之间有说不尽的话，讲不完的叮咛。妈怕我不放心，一再表示要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听了心酸：“这么大年纪了，还如何重新做人？”但口头却无法作答，只能默默点头。

临行前妈又找出一只还是她30年代使用的小箱子，那箱子已近支离破碎，重量很轻。白发苍苍的母亲用绳子重新把它捆扎结实，叫我带回给性慈。我后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妈平日积攒下来的营养品如黑木耳之类，她自己舍不得吃，要送给性慈。1960年春，我那热情善良又命运多舛的姐姐正卧病在床，这对妈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但老人只能叹息着，焦虑着，却无法多说多问。她一再嘱咐我回武汉后要多照顾性慈。

我提着这只盛满了悲哀母爱的箱子走出性美家大门，泪眼婆娑。回头一看，妈正拄着拐杖目送我离去。秋风吹乱了母亲的苍苍白发，她显得憔悴，老态龙钟；但目光仍然灼热，浓浓的离愁混杂着期待，微笑含蕴着苦涩……我向她挥手喊道：“我很快就会来看您的，快回去吧！”我已泪流满面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这一幕我永远无法忘怀。

但我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竟再也没能回去看看处在不幸中的母亲，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当时我还年轻，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

来到新的工作岗位，由于政治大气候的转变，俄语无用了，领导上要求我改教英语。而我对英语已荒疏十年，着实令人啼笑皆非。母亲获悉这情况后，写了封短信给我：“知道你要教英语了，意外且惊喜。老马识途，大概不会太为难吧？”妈的信永远言简意赅，但深沉的母爱与厚望，溢于笺中。

我按月寄给母亲十五元零用钱，又按月贴补性慈十五元。我知道只有性慈得到一些支援母亲才能真正安心。记得每次接钱后老人总兴高采烈写信来说下了趟小馆，吃了个荤菜，调剂一下生活与心情。然后隔几个月，她又要寄给我许多日用品，算是回馈。不幸的是一年后就有人尖锐指出，说我给右派分子寄零用钱，不利于改造。人言可畏，我只好忍痛停寄。每逢想到这些事，我痛恨自己，为什么那样脆弱胆怯？！那样没有头脑？！在那残酷的世道下，自己也会被逼得残酷，丧失良知。

新生的嫩叶

那些曾是生机盎然、鲜亮碧绿的片片树叶，终究抵挡不住萧瑟的秋风，慢慢地变黄枯萎，飘落大地。它们完成了生命的辉煌，安然回归大地。但来年，暖暖春风中，枝头上又会布满星星点点的新绿。这是永恒的真理。

1961年，我怀孕了，我想世界上最高兴的，除了以增就是妈妈了。力儿出生后，我和右派丈夫始终未能分到一间居室，一家三口过着游击式的生活；在单位里还动辄就挨批判，要求我划清那永远划不清的界限。但我仍傻乎乎乐呵呵的。我总想，待力儿再长大一些，我一定要抱着这小子去看外婆。外婆一直期盼着见到他啊！

怀力儿时，缺乏营养，一次在厕所晕倒，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但力儿却顽强地在我体内成长着。分娩前一个月，妈神通广

大，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公斤黄油给我寄来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于是我狼吞虎咽，恨不得空口吃。倒也真是不负外婆的苦心，小家伙出生时的体重竟达七斤，发育良好，居同产房婴儿之冠。这在饥饿的60年代确非易事。母亲又为小家伙取名为“张力”。力，取其笔画简单却含义深邃。那时每逢我怀抱着小娃娃，一个小小的生灵，心里常涌现着对妈妈浓浓的思念与感激之情。妈妈的美好生命再次得到延续，延续在这新生的绿叶上。

力儿今年已四十岁，毕业于外婆曾奉献良多的武汉大学外语系，这也算是一种割不断的缘分吧。可惜他从未见过外婆，只是从我平日和以增的言谈中知道自己的先人是出类拔萃的。他非常尊重外婆，知道自己也应该自强不息。

文化大革命

1965年，三年困难期刚一过去，日子稍有起色，国内形势又起了风起云涌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绷紧了，一切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这一切都与母亲的命运息息相关。

先是母亲的一位至亲至爱从外地来看她。同住几天后，这位被极左思想冲昏了头脑的至爱，就板起面孔对母亲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一顿，说她这几年根本没有改造好，最后甚至跑到派出所去反映，不能给母亲摘帽子，可谓达到了极左之最。

她走后，母亲不吃不喝不说话，呆坐在桌旁直到深夜。这是老太太来津后受到的最重大的打击，打得她眼冒金星，简直动弹不得。她“改造”的心开始凉了，预感到无论如何努力，她此生也无法“重新做人”了。

继而“四清”开始，派出所民警张凤鸣调走了，接手的刘××就大张旗鼓地贯彻极左路线，不但公开了母亲的右派身份，而且在

南大教工食堂召开了批判大会。发言者都声色俱厉地斥责朱君允放松自己，拒绝改造。

白发苍苍的母亲静静地听着众人的斥责，一言不发。杀气腾腾的场面、杀气腾腾的语言又重演了。她数年来的挣扎与努力已被全盘否定。她的心已彻底凉了。她还有什么希望？她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

会后，母亲黯然神伤，掉下了眼泪，但仍冷静克制地对性美说：“我一切都接受，只盼别连累你们。”从此她更加沉闷了，接连而至的打击使她不愿多说话，也确实无话可说。

形势急转直下，灭顶之灾已逼近。

文化大革命开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斗争会、戴高帽子游行、抄家、红卫兵的“打砸抢”……各种侮辱每天都会降临到这个家庭，性美家数次被抄，性美本人也被勒令在校内劳动改造。

母亲沉着地忍受着这一切，等待着更多的厄运降临，但她还是很坚毅，这一生她已经受过太多灾难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豁出去了。

一次，红卫兵宣称要将朱君允押送回湖南原籍，性美中午获准与母亲见一面，他感到母亲这一去是凶多吉少，生离死别，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母亲却表现得比较镇静，只对性美说：“别担心我，你和志安好自为之，照顾好小敏。”寥寥数语，表达的是诀别时刻的慈母心。她自己此时此刻已无所畏惧了，她唯一不能彻底割舍的只是子女的命运。

可后来红卫兵又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勒令朱君允必须与儿子分开住，另起炉灶。她每天需扫大街，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五元，刚够

口粮钱。母亲已进入七十高龄又患高血压，孤苦伶仃，一人劳动度日，劳动之余便蜷缩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晒点宝贵的阳光。

人们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那样一个完全失掉理性与良知的年月，像许许多多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母亲落得了非常悲惨的结局。好人得了恶报。她究竟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有什么对不住国家与人民的地方？

仰问苍天，苍天无语。

这场悲剧行将结束，灯光已转暗，大幕即将落下……舞台上的生命之烛，曾经那般明亮璀璨，但几经摧残，此时已经微弱如豆，在风中飘摇……

1966年12月6日，寒风瑟瑟，母亲身上还是单薄的秋衣，冬衣被红卫兵查封了拿不着。她蜷缩在厨房的角落里，没有多话，也不烦躁，只是顽强地保持着她自己的尊严，煎熬着自己清贫孤苦的日子。

一天，志安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跑去找红卫兵说：“你们是要改造朱君允的思想，不是要饿死她，冻死她吧？！”因此6日这天早上，急匆匆地来了一个红卫兵，凶神恶煞地向母亲吼道：“快点，快点，快开箱子取冬衣，我来监督。”母亲一惊，骤然起身，就双眼紧闭，一只手捂住头，遽然倒地，永远也没再睁开眼睛。

目睹眼前的这一幕，红卫兵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喊：“你装死！

你装死！你给我站起来！”

装死？！装死？！

不，母亲一生表里如一、堂堂正正，在她的骨子里找不出一丝

伪装的痕迹。她没有装死，更不屑于装死。她永远也不会再站起来了。

妈妈，此时容我们儿女双膝跪下来，跪下来感谢上苍。在这不公平的人世历尽折磨与煎熬，母亲美丽高贵的灵魂终于可以脱离苦难，径直升往天堂了。

整理遗物时，性美和志安发现在毛主席语录中夹着母亲留下的唯一一笔钱财——人民币五角钱。

尾声

1966年12月6日，在红卫兵“打砸抢”的高潮中，母亲因脑溢血，猝然去世，终年七十二岁（1894—1966）。

噩耗传来时，我和以增正分别在各自的学校监督劳动，已有半年没见面。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妈，预感到会有灾难发生，而又一直不敢与她通信。但灾难真的来了，我却突然变得勇敢起来。也好，母亲终于走了，可以免去许许多多凌辱与痛苦。这个世界反正已变得疯狂、血腥，也无所谓什么“更可怕”的了。

此时此刻，我必须回去看看身陷囹圄的丈夫。我必须见到我的亲人。我不管各种禁令，下了工，我放下铁锹，也没请假，毅然奔向华中工学院。暮色苍茫中，没人注意到我的行迹。我推门进入黑暗的斗室，只见以增独身一人坐在一盆半明的炭火前，还是那么善良安静。我的心总算在动乱与痛苦中找到慰藉。就让我们互相慰藉度过这可怕的时代吧！母亲已经永远离去。离开了对待她如此不公的世界。除了小小的力儿，我们在这世界上已了无牵挂。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时光飞逝，历史不断地演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踏步地前进，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1979年春，以增获平反。消息传来，他正在杭州出差，住在旅社里。后来他告诉我，那夜他彻夜未眠，放声痛哭。他为失去的大好年华而哭泣，他那时已五十二岁了。

1979年秋，几经波折，母亲也终于获平反。我拿着那张印着铅字的薄薄的纸，心情沉重，欲哭无泪。对母亲本人来说，对于我们子女和亲人来说，一切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知识妇女，一位教书先生。她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做出过壮举。但她竭尽全力在人生的舞台上，将爱国者、母亲、教师、朋友等各种角色都发挥到极致。她用自己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永远赤热的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们子女的眼中，她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瞬间消失。

在她生前，社会无法给她回报，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许多普普通通的老人都在怀念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性美和我谈到她。她仍旧活在许多人的心中。我写下这一切，只为了寄托对母亲不尽的哀思。

我热爱母亲，我崇敬母亲。

橘黄色的灯光，温暖明亮的灯光，永远的灯光……

2001年12月10日脱稿

2002年清明时节修改完

灯光

灯光（上）

朱君允

序

在七八年前要是你高兴在暑假内陪我到北平府右街一个朋友家去，你会发现在一条小胡同中有一所幽静的房屋。进了大门便是一个宽广的庭园，里面的花树果树在阳光中绿油油的，五色鲜明的，欣欣向荣。台前好多牡丹，枝杆高大，此时当然没有花了。凉棚下面是几只金鱼缸和盆栽的荷花，鸟笼中有不同的鸟在上下跳跃。一排前后很深的正屋，宽阔的走廊上又挂了芦草帘子，骤然走进去，黑黢黢的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屋子里很雅素，也有不少盆花，尤其是主人远远地从福建亲自提回来的一盆名贵的剑兰。书桌很大，也许该说是画桌。你进去时也许主人在画画，也许主妇在临帖或为人写屏条。但是她时时走出去，照料在隔壁屋中三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时主人也走去了。你可以听到儿童们的欢愉笑声。你走的时候，这一个和悦的家庭，免不了在你心中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象。你欣羡他们的幸福，以后时时会想起这家人来。

抗战发生的时候，只有主妇带着三个都已经在中小学读书的孩子在那里。过了三年他们方才由北平取海道转到了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四川。一别多年，你又有机会陪我访问这一家人家。孩子们都长大了，最小的女郎也已经快进中学，怪不得主妇的头发也花白了，她招呼你时还是那样的亲切。她留你吃了便饭才走。她留下一个天真聪明的孩子陪你闲谈，自己到厨房里去煮饭做菜，其余的两个孩子也帮着搬东西、摆桌子。在灯光底下，你看见三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依然有说有笑，还是一个和悦的家庭。可是在笑乐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层抹不下的悲哀，你感觉得，也许笑声止，眼

泪便会突眶而出了。你不敢久坐，因为你知道这主妇明天一早还得出去做事。她得养活这一家的人。你走的时候，带去了一幅心酸的画景。

这个人家的主妇便是这本书的著者。不像这大时代中的一般的牺牲者，她有一支生动的笔，而且她对于中西新旧文学有高深的修养，能够把头脑中的感想和情绪，整个地搬到纸上来。在《灯光》一篇里，我们看到她回忆中的一个如何幸福的家庭。这是一篇感人很深的文章。《追忆地山》和《五姑》两篇也回忆起了当年北平文酒风流的盛事。可是作者是中华民族一个极有勇气的女子，她文章中并没有只字诉说她目前的身世和藏在心灵深处的悲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她还是眼望着一线的《光》，期待着《黎明》。

陈西滢

灯光

黄昏，前面格子窗上又透出灯光。

天色昏沉，好像酝酿着一场紧迫的风雪。偶从雪隙里渗出一丝淡薄阳光，却又逗人盼望着开朗的明朝天色。整个笼罩的空气里藏着忧郁、痛苦、反抗、撑持，而又掺和些耐人摸索的快乐和希望。这座灰砖的古老住宅，依然屹立，对着这沉沉苍穹似乎也感觉无聊。它每天遥望的横碧西山，被暗云遮没了，这使它孤索，更使它思念那山深处蕴藏的一切暗中波动和留下的血迹、愤慨、眼泪、伤痕。不过这所房子原来历世已深。它已久经风雪，见过几次兴亡，多少人世的升沉演变。在今日压迫的环境下，它忍痛低徊。

别来已近三年，可喜的是这些灰砖旧瓦廊柱台阶和周围的一切

还没有改变多少旧时模样。这其间似有一种大力，深沉蕴藉，暗里撑持。只是檐下一带深廊，堆积的一些残余破旧，倾斜颠倒，零乱凄凉，大概这堆残剩的东西也曾引人注意，担过罪名，受过侮辱搜查。在这满积飞尘暗淡凄凉的暝色里，那几扇格子窗上的灯光更显得光棱。晕黄溶漾的光圈里，似乎幻出三年前这格子窗内灯光下的融融笑乐，稚语欢情。

记得是耶稣圣诞节的前几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开着无线电听那紧张的消息。那时佛西在定县农民剧场初次试演他的《过渡》。在我国农村状况之下，农村戏剧的推进，原是不够辛苦的工作，而他的戏剧同志们因为要试验灯光在《过渡》出演上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深冬是比较的农闲时节，他们竟不顾一切，冒着朔风凛冽，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寒夜里，《过渡》在定县的露天剧场演出了。剧人们坚毅的主张、热烈的情绪克服了大地的一切。那远村近舍的农人们，千百成群，自然流动，向着这剧场灯光集中而来。可爱的农人是坦白虚怀接受一切的。他们欢欣聚集在剧场的集团空气之下，那热情兴奋竟能维持他们的注意力，屏息凝神浸润在剧情的活动里，虽刺骨深寒不能威胁他们离开剧场而去。原野无边的星月光棱之下，灯光流动，人影回环，那是一幅多么多么可爱的美画图。

《过渡》试演成功。《过渡》竟演成了过渡。这是卢沟桥炮响的前一个冬天。

这似乎是佛西的习惯，每当聚精会神导演一次后，他要歇下来过几天清淡日子。那时他的画兴初浓。每天晚饭后，灯光下，书桌上，常是笔墨淋漓、横张直幅的松梅兰竹。尤其是雨雪敲窗、风声震撼的寒夜里，他的画兴愈浓，他的画笔也更紧张，更超劲了。松梅兰竹原是中国画里最俗套，而且似乎是最无聊的材料。

其实这也未必尽然。大凡一种艺术能在艺术上维系悠久的历史，当然有它的特殊存在价值。松梅兰竹不仅和其他任何材料是一样的可以绘形绘意，而且因为它们在中国画里已自成风格，特别地能表现个性，寄意移情。当你运腕凝神、情怀无着的时候，一根松干或几笔梅枝常常可以使你画出一身微汗来。那时我对于华山碑发生了兴趣。因为书桌上有现成的笔墨，每晚伏在桌旁也要糟蹋些纸张。隐约间我似乎领悟到隶书的笔法和画法有深厚的影响，这点领悟，我能深切体味，却不能传神达意地表现出来，个人的笔意太拙了。力不逮意，而妄自夸张，终不免成僵局，转趋末路的，又岂仅画事为然！为保存这点可贵的内心的自觉，对于画事，我只有感慨，不图尝试了。孩子们是永远喜欢参加热闹的。他们每晚也要来到画桌边，伏在桌子犄角写几张大字。孩子们的字不一定写得好，但是他们的字画间的那一团稚气，是我们笔尖上失掉了的天真。失掉了的天真是不容易找回来的！那末，这点可贵的稚气天真，我们能不万分珍惜吗？

这是三年前闪烁的灯光。

这所古老住宅，据说是明末某姓人家的旧址。到了清初又经上赏给了某贵戚，所以这所房子的栋梁门户已经过几番酒绿灯红。

当我们遇见这座房子的时候，门墙倾斜，已不及当年建筑十分之一了。我们只因爱它的房基深厚，屋檐敞爽，也就随缘寄住下来。历年的平淡生活，我们替它添了些树木花丛。在当时佛西或有十年种树的宏旨，而我个人却只有勉从薄力些微美化这蜗角乾坤的私愿微忱。一别三年，树木们都能挣扎生存，亭亭如盖了。双照堂的牡丹，到了春来，还是开上百十朵的花儿。这是因为根基深厚了，虽经挫折，不易摧残。

当我们搬进这房子，朋友们都以为建筑太陈腐，环境不显明。

然而孩子们的活泼天真、歌声笑声冲散了一切黯淡氤氲。西园的一片荒场变成了自由活动的儿童领域。园角一围高低起伏的假山石变成了孩子们幻想中的军事阵地。旗枪棒杆，叫喊喧腾，他们自以为英武无伦，可以冲锋杀敌。卢沟桥炮响的那天早晨，性美正挑着沙土去铺他那心爱的跳高沙坑。他和小朋友们正计划着一个小规模的运动会。人员节目都齐了，压球场，铺跑道，兴致淋漓！可是那继续不断的炮响要破坏捣乱人间的一切，使孩子们带着一颗被压迫的小心灵离开了北平。

离开了北平，离开了那窗下的灯光，离开了那和暖的温室，流离转徙了三年，尝味些人间的苦辣水火，孩子们健壮起来了。

似乎天意如斯；要养成意志坚强的青年，就产生一种特殊环境来锻炼他们的身心。那一阵恶势的天津大水，冲流洗荡，又将孩子们漂回北平。

北平！天还是那样的蓝，山还是那样的青。城堞还是那样的穆然围绕，牌楼下还是那样穿梭似的人来人往。可是城厢里外骤然增加了多少黑沉沉的“土膏店”，空气里添浓了昏迷迷的烟雾氤氲。

这烟氛，盘旋缭绕，摄去了男女老少的灵魂。摄去了灵魂，失掉了意志，更消灭了一切挣扎的本能。北平是一座恶氛重压的死城。

这死城宽容意志消沉的男女，放纵私欲狂炽的横行，压迫奋勉图存的活泼青年！

青年！他们有的是新洁鲜明的热血，绝不能在这冷酷残忍的黑暗里委曲求生。他们要突破昏迷，愿漂流转徙，茹苦含辛，奔向人生大道上去……去……找灯光。

一九四〇年于成都大沽口

这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乘的永生轮已泊在大沽口外。

北方天气，此时还是早春。鲜丽娇阳刚化完了冰冻，石头缝里的小草偶然现出嫩绿，松树针尖渐呈新翠了。十几年来蛰居在北平城内，已渐忘海上晴光。这浩漫无边，一色的柔蓝天水，娇阳清丽，四望空灵一美、净、阔朗、清新！海上的春，另是一番圆润的柔意。然而，这波面的柔光和眼前的清静几使人忘却了柔波下，云层里，潜伏的恶浪风云，当前敌意。

千古悠悠的海水，素来是变幻多端！这时大沽海面的波层却是平静的。大概是因为春阳波暖吧，不知从哪里飞来那么些雪白的海鸥，悠游飘荡在远近的碧蓝波面上，高飞低舞，掠影穿波，转出许多美姿态来。当它们在半空中，平翼翱翔，旋圆成阵的时候，忽然直下低飞，一闪身，侧翼穿波；全羽膈力似乎都集中在那一转旋间。那矫健的舞姿非常的可爱。它们成群飘荡，联翼翱翔，一队队地飞到船边来，好像欢喜和人亲近。那坦然宽放的游态是值得韵味的。这是我海行中第一次遇见的所谓“鸥波”，没想到的一番胜景。

我欣羡它们洁身健羽、天然美好的适应生存。

在此时的大沽海面上，这些海鸟更是慰情缀景好生灵。不然，这孤危船只上的旅客们，更是可怜得孤寂了。一年来，大沽海面的行轮更趋稀少了。即使偶然的客轮驶过，那在平时，旅客们招手相呼，一点欢情的表示，已不是此时环境所允许的啊！因为这海面上有明机识趣的海鸟，同时还有使人见了头痛的兵舰一挂着太阳旗，远近横陈，纤微欲获的。说得好听一点，它们是武装严整的阵容；

说得明白一点，未免是小人得意的嚣张丑态。

昨晚，我们留滞在塘沽。日落后的塘沽是恐怖黑暗包围的圈域。不论水面或地上的几十里内没有一息人声。就是轮上的灯光和停船后那一种照例的喧嚷嘈杂，此时也掩抑下来……死寂，消沉。但丁神曲里的地狱究竟是诗人的幻想，来得那样好歹分明。

假设此时的塘沽有一点像那七层幽域的话，那就是这黑暗氛围之外，另有光灵境地。不过这其间却隔着一段有待伟力援引意志向上的阶梯。

夜深了，晚风从水面吹过，清凉地拂在脸上，将人从疲倦中催醒过来。这时在甲板上散步，静极了，只有身旁的脚步声和船旁沥水声。偶从晚风里带来一丝丝泥土和海水掺和的腥味，可以知道船身泊处，离着岸边还不甚远。但是这时谁愿意再伸脚走到岸上去？

刻在印象中的一些惨酷凄厉的故事此时随着回忆来回动荡，不禁使人感到这周遭单调黑暗的内容却不是单调的。这里面有自诩胜利、蠢然傲慢的矫情；有意志薄弱，自趋堕落、自忤的哀思！同时还有那梁山泊好汉风度的反抗和兴奋的呼吸；也有那奋斗而不幸失败，悲愤的怆心。总之这里面淹浸的潜流，有波折，有旋涡，绝不是轻快动荡的顺利生活，而是阳光照不到的暗里人生！

晴夜，高空晴朗。天际的清光和波面的微影似乎默契地在预待来朝的富丽晨曦；预期着，在晨光中，这只满载渡客的行轮轻快地驶出塘沽，从此转轮飞渡。……此时意境的欣愉，都因“希望”抓住了心情。希望，它像个水晶球。从这里面望出去，面面玲珑，总是晶莹光亮的。水晶球是个点缀的小品玩物，“希望”也只是人生的点缀啊！至于对点缀品的选择，玩味深浅，把住或丢掉，那却在乎个人的眼光和手法的高低辨别了。玩得高兴，算成功；玩得不称

心，是失意。可千万别信那拘束的“命数”，可千万别让玩物来摆弄人生。

星光下，那远近堤岸的湾迴轮廊和荒原上的稀疏村树，还能隐约分辨出来。漠漠平津却在暗中分别了。此时的情绪是怅惘，是兴奋？划不分明！

这次，几家结伴而行。三个母亲带了十一个孩子，更因亲友的付托，同着五六个十几岁的青年。这样的旅行是不枯寂的。孩子们可真是没见过大海的小生灵。他们留在被践踏的环境里已近三年。

柔嫩的小脑，已无形有迹地给刻上些痛苦的刺纹和人类卑劣行为的印象！他们到了海上，惊异一切，喜爱一切，像小鸟生了翅膀，又快乐活动起来。假使是可能的话，我真愿意任他们就生活在海面上，过了童年。当这冤仇对垒的狂热时代，理智失去了重心！抓住自私，忘却了同情。哪里不是残暴毁灭的痕迹！人类情绪紧张到看不见一丝天然美丽的笑容。也许是潮流太猛、炮声太响吧，脆弱的诗人们也站不住，随着奔流，载沉载浮。孩子们可真没有半分抵抗力的。实在是没有理由让他们也卷入这漫漫混沌的旋涡里去。假使是可能的话，应该将他们从旋涡里拖出来，保存些人类的纯洁天真。除非我们认为斯巴达方式的教育是绝对有价值的，那就让他们随着狂流去滚，受痛苦，刺伤痕，毁灭生存，一任天然淘汰去。然而这狂流的转移趋向却是渺渺茫茫。而且我们得留意，这些稚嫩的孩子却是将来掌舵的人们！这时甲板上，热闹游戏的稚嫩甜音，拂荡在海风中，浸润到波面上，与大自然默契和谐！这甜音润人心意，同时也叫你系念低徊。

那十几岁的青年们是这样的可爱：坦白天真，执意地辨别是非，热烈地爱着公正，不知道拐弯迁就，所谓“爱好”时期。热情所至，他们愿流血牺牲。这热血，它的鲜明叫人爱，它的力量是叫

人畏的。今日的大沽口却不是青年的中华儿女容易经过的地方。我们同行的这几位，不用说，也都是满怀希望、自负不凡的年少，同时也是惹人耳目的标帜。他们到了这海阔天高的环境又活泼天真高兴起来。大概是积重压迫的反动吧，他们那内在的健力要寻找机会表现出来。记得是船快开出大沽口的时候，他们高兴到无可如何，忘形了，爬到桅杆上去狂啸高歌。这行动不免引起船主的责难和水手们的腻烦。真是可笑亦复可怜！他们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呢？也许这进退两难的经验是坚定青年们勇往前行的意志，而且天地间的萃美精华，岂是一点小小手段或独霸横行的武力所能扫除歼灭的？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一堆堆的竹片木板是多么容易毁掉的东西。然而两千余年来我们的文字依然好好地活到今天。聪明的敌人们却偏要转向理智反常的途径去，亦步亦趋地去效法那几千年前的暴戾野蛮！

一九四〇年六月记于成都滇越路上

五月八日我们由昆明飞重庆。第二天，在会府平教会的一个客厅里，我和几位朋友谈天，说到这次旅途的情形和经过海防时那一切的留难，尤其是当地安南人的麻木无知，那给人直觉的印象是“亡国奴不是人做的”。当时一樵先生曾这样说：“安南，只有让中国收回来吧。”话是如此地说，但是收回来这几个字是多么遥远。

天下事情的转变，真有出人意料的。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欧洲大陆上的康边森林，忽然跳出那么一幕滑稽剧。照政治手腕，或个人英雄主义来说，希特勒今日未尝不可雄视一时。然而，试回顾那一百年前，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是怎样的叱咤风云！曾几何时，那雄压一时的势力分崩瓦解、冰雪消融地下去了，海伦岛上的生活，是可怜的末路英雄——所以就历史眼光来看，代表在康边森林所受的委屈并不能决定欧陆上情势的转移。然而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

势下，有向安南进兵的必要。今日的人类生活，不论怎样山分水隔，或地域国界的划分；但实际上，人事的牵系，是脉脉相关，谁也不能袖手旁观的。人群生活，没有“绝对的自由”。

海防，它今日的情势，是怎样的紧张！我们对它是多么系念！

六年前，曾听两位朋友说起滇越路的工程，法人深心积虑的计划，和那沿路的风景。当时我曾悠悠梦想，倘有机会，我要由滇越路到云南旅行一次。

二十七年元旦，我由天津写信给佛西，就告诉他，拟携儿女由港转滇越路入川。那时佛西已在成都。时日迁延，直到今年三月始克成行。

我原爱海上旅行。那宽阔空灵是任何环境得不到的，这次沿着由北到南的海岸线，领略了那海面上气候划分的风味。由天津到上海的五日海程，差不多每天清早，孩子们由睡眼朦胧中爬起来，看日出。灰色的天幕升启后，云霞一层一层地展开，那滚圆的红球，由水平线下慢慢地地上腾，拖出红线，带出金丝，然后一天澄澈鲜明。孩子们见了那鲜明的红球后，心里满足了，又回到床上去做梦。

过了香港，海面的朝雾很重，不容易看日出，由广州湾到北海的那一段，波浪冲急，弄得大家晕船。记得是过北海后的那晚，大家睡平静了，我起来看窗外的夜色。漫漫万顷，波面有光，波光粼动下，海底里，洒满了一个个暗红色的小圆球。原来，我已忘了又是月圆时候。大约是水蒸气的烘托，月儿给染红了。昌荪、性美、性慈都已睡甜熟了，刚巧性淑醒来，我就叫她看红月亮。这孩子，向窗外一望，惊异到呼吸紧张，许久不说话。这一夜的景色，兜来，放送在我母女俩的印象中。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听说快到海防了，我们站在船头上看船进口。这风景和香港一比，迥然不同。香港是绿波上，点翠青山，整齐清楚。海防的海面却是浑沌的黄色泥汤。轮行进口，又在那红色的港口水里，慢慢地走了两个多钟头。只看那深入的港口、远抹的青山，就知道这地下暗藏富庶。早已闻名的海防海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敲诈和一切鬼鬼祟祟的情形，我不愿意多写了。中国旅行社在那儿的工作，虽极努力，然亦只是低声忍气的应付。

我个人的兴趣，只是看那地方的风景和安南人的文化。海防，可以说没有建筑。所有的建筑物，在形式或格调方面，都杂乱低落得很。就那地方的气候说，应该是花木芬芳，美丽可爱，然又不是那模样。在海防，我感到最满意的，是吃的香稻米。从来未曾尝过那样的香稻米！从海防到河内，是展开的平原，油绿无边。直干冲天、全绿盖顶的棕树，处处成林，另是一番风味。过了河内，山势渐起，风景渐多。沿路的绿树红花，是郁茂的热带景物。

自海防直到老街，我们坐的四等车。沿途约有十几个中国人，其余都是安南人了，这倒是我愿意接近的人们。在车上虽亲眼见他们抢、窃、跳车等恶作剧，但仔细想来，这些行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海防，在河内，我们坐车到外面去绕圈子，车夫绝不争价，绝没有横蛮的动作。我想安南人的性格，怎么这样驯和得可爱。不论在如何扰攘的情况下，不论男女老少，他们说话的声调总是那么圆润轻柔。他们面部轮廓美好，他们的神色也总是那样温和。这温柔驯和是这民族的天生性格呢，或是环境养成，别有原因？可怪的是经过的路线竟没见一些儿安南文化的影踪。车站上没有安南字，也没有中国字。路边没有安南房屋，或一角庙宇。是整个的西化了么？也不是。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听到法国陆军忽然投降，被希特勒解除武

装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不像去年十月一日听到德军进占华沙那样的难受。这并不是我对法人不表同情，或有恶意。十月一日那天，我烦闷，整日的饮食咽不下喉。说也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不是波兰人，我对波兰有特别的爱国热忱么？不是。或个人私交上，我和波兰人有特别的交好友谊吗？没有。那一天，脑幕里集中的印象是Paderewski。在二十几年前，我学钢琴的时候，曾弹过Paderewski的一支小曲谱。当时因读作家传记，知道点他的身世，那时他在法国逃亡。为了复兴民族运动，为波兰复兴社的工作募款，他仅凭那十指辛苦。在钢琴上的摸索，他一生的意志，竟在一九一八年实现，好梦圆成了。那时他的高兴和心境的开展，可以想象出来一有如春阳下的满树春花，真美！波兰复国后，他曾掌政，后退休。单就艺术论，几十年来，他的一夕琴声是万人倾倒的。说一句笑话，假使他要自由恋爱那套玩意儿，那不知有多少人的追从倾慕，在人群中他能选取尤美尤佳。然而他是“抓住了时代，忘却了个人”。他的一生，生为亡国遗民，眼见波兰起，又见波兰亡，固然不幸、伤心。现在他又流亡海外，国家破亡，住在美国一角山上，几间小屋子里，心神所到，仍为人类奔忙。他的人格是照耀全球的。他是人中美杰，艺术界的明灯！他的影响，不仅限于西欧各国，就是今日我国青年不也是一致地倾心仰慕么？记得是今年一月里，报纸上转载了一篇他的言论，青年争读，热切希望知道这老人的近况。他谈到波兰的复兴希望，仍然是那样音调铿锵！

二十七日下午四点钟，我们到老街，办了进口护照等手续后，在老街饭店歇下来。这是老街的一个头等旅馆，中国旅行社就在隔壁，办事方面，比较便利些。这次沿途，中旅的热忱招待之尽力、周到是教人感激的。老街这时，像深夏的炎热，潮湿蒸闷，汗流不止。我们在楼边廊上乘凉，伸手出去，摸着那滑绿的树项；望出去，对面是青山、重叠的云山。山脚下，一水横流，这就是中法的界线。走过河上的木桥，就是中国境地了。这时，我们望着山，看

着桥，可是不能过去。

次晨，我们清早起来，高兴得很，今天可以入国境了。孩子们快乐得早点也不要吃了。水果、糖，一切都丢下。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对出口护照，过桥。刚走到这边的桥口，那边桥口的闸门却关上了，不让通行，有空袭警报。行人像潮水一般退下来，我想回旅馆休息，孩子们却守着桥边，不肯移步，我也只好望着他们笑。幸免的，那天有警报，没有空袭，在山色围绕中，上面是碧蓝的天，下面是急流的水，桥上行人徘徊旋转，且演了一幕人间的悲剧。靠着桥边，有四五个青年的安南女子，怡然自乐地在一堆玩笑。她们都是穿的黑纱衫，跣足，辫发盘在顶上。身上除了白银项圈手镯，没有别的装饰。面貌的轮廓，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扁圆形。脸上的表情温和，说话的声调轻细。对面走来一个中国老年人，手里拿一根三四尺长的旱烟杆，大概烟杆太长，自己伸手不易燃火，他走过去叫一个女人替他点火。不知那女子说的什么，他就毫不客气地伸手一挥，给那女子脸上一巴掌。我看了，心里一惊，想来桥上要闹事了。事有出人意外的，那捱打的女子仍然含笑，女同伴们也没有愤怒反抗的表示，依然说笑，笑声且高了。旁边走过来的安南人，也是漠不关心。这时桥上比较热闹起来，警察走过来说了几句话，那几个安南女子且笑且说，扬长而去。我真诧异，这是怎么回事！

据深知本地情形的人说，安南人已习惯于捱打、捱骂、驯服了。

警报解除，闸门开放，行人涌了进去。这就是河口边境。又经过一番检查行李和通行证的手续。这次我没感到任何麻烦，因为昆明方面的朋友已来信照拂了。河口老街间仅一河之隔，只是在旁的茶馆和饭店里却有云南人出现了。因避空袭，这一段的火车只能夜里开行。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又拥挤上车，大约是半夜十二点钟，车停下来。据说前面铁轨已被炸坏，有三四里长的一段路，路局临

时想了办法，另开了一列车来接，让旅客们将行李由这边运过去。

当时一片扰攘。少数的脚夫来搬那许多的行李，争拥可以想见。我个人身旁是大堆的东西和几个孩子，更没办法。大约人生遭遇总有拐弯的机会的。这次不知是运气或是人缘，想到那时的困难，不能不感谢马云鹏先生。马先生和我们同车来，素不相识，没有交情，居然不嫌琐屑，负责替我们设法将行李运过去。同时护路的兵警走上车来，也愿意替我们搬东西。问题既这样的解决，我就领着孩子们下车先走了。走不远几步，就是大桥。两旁是高山峭壁，下面是湍激的富良江，水声清响。走过桥，几步外的路轨就陷在一个个炸毁的深坑里，敌人的目标原是大桥。险些儿，那炸弹的降落只要先后几秒钟，大桥早就炸毁了。我们也就掉在半山里，在这二十世纪的轰炸文明下，过那太古的山中生活去。这时代，不仅是年头，顷刻间，万人灰烬！这究竟是严重，还是滑稽！

过了一个山洞，不多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候车来接。久居北方，久不见青翠迎人、山高水深映带的风景，这夜晚，倒觉身临新境。天上星月微明。山脚下，一阵阵春风带来的香味，旁边是急流的水声。这时，搬东西的士兵们也到了。他们汗流喘急，听说我们刚从北方来，很关切地来探问北方的消息。几年来，孩子们生活在倭兵伪将的鼻息下，今晚见着自己国家的士兵，那亲热高兴，快乐到无可如何，手舞足蹈。我们就在山脚下、路轨旁边歇下，畅谈起来了。性慈这小姑娘原爱多说话，她现在得着了机会，滔滔地说个不停。孩子们说话，不成片段，然而是一点一滴的真诚。说到海防的登陆和安南的情况，士兵们也感到自身的责任。这时的环境和我们的情绪，是同一节奏，默契和谐。

一九四〇年六月于成都

成都的冬

（一）

这是成都的冬，
弥漫着大地，
浮满了长空，
白濛濛，
白乳濛濛，
非雪非烟非云非露，
这是软绵绵的冬来朝雾。
成都，
睡在浓密密的香雾中。

（二）白濛濛，白乳濛濛！

白漫漫雾海中，
嵌着一轮圆镜，
光芒的亮，
鲜丽的红！
挨近那朝阳边的一圈薄雾，顷刻间，

深紫，绛赤，澄黄，浅红，

轻盈盈的转幕。

美！这美景只片刻须臾，

须臾又隐入深深白雾。

深深隐入……

好将美景收留住。

（三）是不是没来由这白雾濛濛？

笼罩着城垣大道，

淹没了一切的桥梁远树，

敷上了行人的脸，

吻着行人的手，

桥上徘徊，好像云间漫步，

蓦回头，那桥拱又加入朦胧深处，

漠漠，茫茫，浑沌，朦胧！

只听见桥底下，

清澈澈的河流激响

河心笑语。

（四）谁说是没来由这白雾濛濛！

成都，

田畴菜圃，依样青葱！

平林果木，

油绿，焦黄，淡翠，绀红。

那不息的老农依然耕种。

笼护着一切的生趣生灵，

这白雾濛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于成都

追念地山

去年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太古公司的太源轮泊在香港，要开向海防去。我与地山、芝子不见面已几年，骤聚三天，又要分别。

他们伉俪把我和孩子们送上大船，就要起碇开行。仓促间，匆忙地，他们俩又回到小汽船上去。修整的青山绿水的港湾，清溜溜的海面，轻荡荡四月天的海上春风，荡着他们的小汽船，他们的双影远去了。

没想到这一次地山是和我们永别，末一次留下一些印象，健壮厚实，黑长衫，带棕黄色的胡须，神态如常。不过地山平日是诙谐谈笑的，那天的神情似严肃些。他末一次对孩子们说的话那平重的声音我还记得很清楚：“鼓着勇气，乖乖地跟着你们的妈妈去旅行，看世界，长见识，过几天你们就会看见那整队整队的中国兵

了。”

孩子们仍是嘻皮笑脸的，吱吱喳喳和他开玩笑。这是一般的孩子们对地山的常态。孩子们永远不会怕地山的。地山爱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玩，玩的时候，他和孩子们似乎是一样的天真，滚到一堆，扯做一团地胡闹！闹急了，会生气。而他又有那一口袋现成的童话故事说给孩子们听。

卢沟桥事变后，我带了儿女流离颠沛在平津间。那时和南方的通信已不能自由说话，每有人从香港回到北方，地山、芝子每以孩子们的教育为念，劝我早日离开平津。到了前年秋天，情形急转严重，遭封锁，淹大水，捉青年，迫入伪组织工作。芝子急了，有信说在香港等我，劝我早日动身，并且沿途的护照早已代我办理妥帖。到香港后，地山带了孩子们去玩，爬上山顶，跑到海边。孩子们高兴极了，这是几年来没有的自由行动。我也感谢他，因为在那匆忙的两日里，我才能分出精神来，随着芝子到市上去买些随身应用的东西。他们夫妇俩对朋友的帮忙一无形中的帮忙，常是如此的。

一年来，我的生活匆忙，也因不快心的事见得太多了，写信的笔也就懒怠下来。对关心的朋友们我愿意说实话，所以更不愿意写信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每天盼着我的信，从各方面打听我和孩子们的生活状况。而这一年来我的沉默于我们的友谊间似乎倒添了一层亲切了解。但是怎知道，我这懒怠沉默竟留下了永远的怅惘、愧心，无可如何！怎知道，在这细雨萧风的蓉城秋夜，我现在拿着笔来哭地山！

记得是十年前，民国十六年早春的一天，在北平石驸马后宅五号“勺园”我们的住宅里，约了几位朋友们吃午饭，在座的有菊农昆仲，还有宁华。地山后到，他的爱女繁星没有同来。地山是佛西

的同学、老朋友，和我那天是初次见面。一位三十岁开外的新人物，一身半新旧、深蓝色的西装，不大说话，似乎不爱开口，手指常勒着那卷角八字须——博物院里的艺术家们常有的那翘角须，当时我对这位客人也有几分“不免积习”的感觉。饭后，大家散了。

那时我的精神浸润在美儿的生活里。客走了，我又去洗牛奶瓶、做果子汁那些照料婴儿的琐事。

黄昏的时候，我走进书房，见电灯开了。书架上的两个旧石膏像，一个是半身的莎士比亚，一个是那断臂的维纳斯，一褐一白，显然地身脸都开光了。地山站在当地，对着石像端详，手里忙着整理一个褪色的旧绸子做的掸子。他回头见了我，好像很不安地对我说，对不起，弄坏了掸子。那两个石像蓦然明洁，打眼地美起来，使我太高兴了。可怪的是，那时我竟没有丝毫惭愧的感觉，并且还暗自诧异，这位客人为什么不问我另要一块抹布呢？佛西送走了另外几个客人，看见书架上的情形，也高兴了。那间仅容三人的狭小的书房里，马上热闹起来。他们两位倾筐倒匣地说旧话。地山是晚饭后回去的。

此后地山每从海淀进城，常到我们家来，来了，玩个大半天。

有的时候他带了书来，坐在玻璃厅里晒太阳，半天或整天。有一次他带来一蒲包海淀出产的鲜荸荠，当然他希望我们参加。那天不知怎的，我们对他的那包鲜果就整个地没加注意。他把一大堆的荸荠削好了，走了。对地山的来去，茶水，饭菜，我们素不客气，不经心，而他似乎也很高兴有这样一处不拘谨的朋友家。带一包水果或几包零食，来了，在客厅里玩个大半天或整天，那是常有的事。我们不一定奉陪他。有闲工夫，就和他谈天，天南地北的。不论对人事或对他的人生哲学，我们和他开玩笑，争执，到末了，是他退让的时候多些，到末了他是考虑的态度。不论对人事或对学

问，地山的态度不倨傲或武断，好像他已习惯如此。不过有的时候，他爱用极端同情的心理来解释事件，而他那极度的体贴周微是常使人发笑的。当我们感到没有办法和他辩论的时候，只好称他为“吉诃德先生”。朋友们常爱 and 地山嘲谑，也因他松爽的性格。

大家知道地山欢喜到路边的旧货摊或厂甸去找宝贝。有的时候带一本旧书或一件旧金属来给我们看。其实对旧书的版本或金属瓷器的研究，我们哪有他那道地的功夫。但是当我们故意地找出些理由来，说东西是假的，他会闷着气走。有一天，他来了，高兴极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一个高度仅一寸有余的佛像。这是他去逛圆明园，无意中从瓦砾堆里拾得的。我们曾对他说像这类的佛像也许是北平的古董商人故意放在那里贗制古董，不一定是当年的旧东西。他把佛像兜入口袋，几乎要走了，不多时，又转自解嘲地说：“一样可以欣赏。”末了，他研究出来，那确是一件经过英法联军火烧的遗物。不久他去找了一个代表北京式的玩具，一只紫檀雕刻得很精细的小靠背椅给佛爷坐。不论人对物，对大小事件，对一个极不重要的小东西，地山就有这样一个爱好的习惯，“完成一件事”。

那年冬天，《蟋蟀》在北平出演，出了岔子，因为“胡图将军”

的滑稽行动触怒了当时的北平军人——一张作霖时代的军人。少将一怒，侦骑四出，要缉《蟋蟀》的作者熊佛西。我们明知道这其间不过是一种极可笑的误会，哪值得兴师动众？但是当你遇见了头脑简单而又性子暴躁的人，他正在任性发脾气、思想不能拐弯的时候，你不能希望和他讲情论理的。并且当淫威代法律的时代，刀锯锋芒儿戏人命也是古今一律的。何况那时多少学子青年们已做了时代的牺牲品，文弱的高仁山[3]也不能例外，送往前门外去消灭了。那时的北京城也叫你有血腥弥天、避秦无地之感。

演剧的那晚，夜深了，我们的门铃响了一大阵。次日天明，熊某出了城。我带着美儿暂躲避在五姑家，在城内好打听消息。然而五姑家那时也是遭忌的嫌疑地。不用说，石驸马后宅五号已被宪兵和便衣侦探包围了。不过我必须和燕京大学通消息。电话不方便，因为电话线有人侦听；专差送信，又怕来往的次数太多，引起眼线。地山，当时却做了忠实的辛苦邮人。

地山不是有余闲在外面跑路的人。他在燕京任教，他的工作态度又是那样严谨，然而他见佛西在城外着急，又怕我在城里担忧，每天任劳来往。消息紧张的时候，甚至一日进城两次。为了避免眼线，他不乘燕京的汽车，坐了洋车（人力车）绕小道，有时候步行，我们心里是极度地不安，地山却泰然来往，他的脸上从未露出一丝惊慌颜色，总是那样从容不迫地报告消息。而且他在朗润园的住宅，一间书房兼卧室的小屋子也让出来做招待室，因为《蟋蟀》也牵累了“古城书社”的几位同事、三位女士们。旁人有替地山担忧的，怕他招惹嫌疑。的确，那年头岂是让你多惹嫌疑的？地山平日幽默诙谐，那时他好像更幽默了。当大家议论纷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去买些小鸭梨或蜜柑等水果来请大家吃一顿。不过地山个人的处世态度并不马虎，而且是严肃、一丝不苟的。世俗公认文人们应该有的病态的漂亮行为，地山似不追求，虽然他平日的说话，尤其是他的写作里面都有很浓厚的浪漫意味。从平日的闲谈里，我们知道地山过去的生活并不顺心，我们却听不见地山发牢骚或咒骂人类。朋友中有两个人对于一切，那样地不存恩怨：一个是志摩，一个是地山，这好像是个人的性格聪明。然而地山的个人行动是严格负责的。他说今天下午把信送到准送到。

那一阵风波平息后，我们回家。此后有一段时日，《蟋蟀》的作者的精神仍感不安。门铃的响声常带刺激性。当时和我们照常往

来的朋友是金岳霖和地山。不过那时地山的时间很宝贵，因为是他开始认识芝子的时候。

寒假期中，我们约了几位燕京的朋友来家吃饭，记得有老先生吴雷川，有黄子通、许仕廉他们，地山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位。他来了，看见我们客室的地板不够干净，自己去找了一个拖地布涂了不少的煤油，很仔细地替我们把地板擦一遍。他那种童子军精神的爱好行动，我们平日见惯了不加注意，也不去拦阻他。地板光亮了，但是熏人的煤油气味做了那天的谈话资料。我记得地山没吃完饭，先走了。当然他不是因为煤油气味的笑话而生气离席的。子通先生那天迟到，是从前门外赶来的，他进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神情不安。他说刚才看见某辆车子出前门，不知是否有高仁山在内，好像赶赴前门外看情形去了。

地山的热情不是怎样激烈飞扬的表现，但是朋友们都感到他的温润。我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偶然谈到他写《空山灵雨》时候的那一段生活，他断弦后的生活，此后我们不敢对他提起《空山灵雨》几个字。然而在《空山灵雨》里，读者并不感到多少眼泪。

他和芝子结婚后，生活好像安定了。一个多年流浪生活的人对于家庭的意味是温厚的。每年五月一日，他们俩总要约几个亲近的朋友聚餐。那是地山高兴的时候，说笑话，做滑稽表演，什么都高兴起来。五月一日我在天津，他们照常写信来说到他们那值得纪念的聚餐。

他们夫妇俩好客。听说四年来，他们家的客人更多了。抗战以来，香港是抱着一颗热心的难民们的经过地，同时也是金钱压迫的鬼门关。我们知道，在金钱财力上，地山的家是无可夸耀的，然而他们的家，走进去，总叫你感到温润的。

今晚，这细雨秋风，地山的家里又是什么情况？

现在慈儿站在我的身边还是怀疑地问：“许伯伯是真的死了么？我觉得他没有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于成都盐道街

复兴节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严冬风雪、寒意侵人的时候，人间的情绪似乎要热烈地激荡一番。因为这点热情震撼的动力，曾促成了多少人类事业的成绩，产生了多少伟大光灵的艺术品，不论音乐、图画、诗歌、小说都有垂世不朽的特殊成就。

到了这个时节，人们的思想似乎特别地活跃起来，情感热烈地高涨起来，喜怒哀乐好像都要变一番情调，就是仇敌侵深的敌对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或因情感的激荡，内心温暖起来，也有转仇为友的动机。

我们还记得一件史实：就是二十年前那次欧战，酣杀四年，在十二月二十五那一天，战场上勇于杀敌的士兵们，忽然灵光一现，心意温柔了。联军和德国两方敌对的战壕里的士兵们忽然相见以诚，彼此温存握手。据说，这是事实，不是虚传。岂非奇迹！虽然这行动不免表现人类心理的矛盾，滑稽可笑，同时却极端地表现人类心理向上的一线灵机。宝贵的人类特有的灵机！

现在，今天，是人类的思想行为情感，混乱到无可如何的时候；在这极端混沌的旋涡里，我们的挣扎、努力，无非是为着来日的光明。但是我们所馨香祝祷的这“来日的光明，前途的美境”，这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我们的希望是期待着人类的复兴，我们要寻找健美的好根芽！

毁灭、摧残、轰炸，是几年来人间深受的普遍伤痕！就是天真活泼的小生灵，可爱的儿童们，他们也一样地受威胁，要奔跑逃生。儿童本是无罪无辜的，他们是脆弱娇柔的，需要抚爱，他们是天真纯洁的、应该珍惜的复兴人类的好根芽！

爱护根芽，光明环境是需要一块灌溉的园地的。为了谋求可爱儿童们的养育园地，当然我们大家欣然奋起，愿赴全力共同工作。

在这混沌窒闷的空气里，有时也点点滴滴地得到好些好消息。

抗战以来，后方工作已渐注意到儿童保育的重要性。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近来似渐趋浓厚了。

由成都出老西门，沿着成灌公路的那条路线望去，绵展的青畴绿野，就在茶店子那小镇边，云端里飘扬着一面鲜丽的国旗，那就标志着最近成立的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的园地。几个月前那是一片荒园，几个月来已集中了多少勤劳的心力，那面国旗下，一片修整的小瓦房里也集中了多少可爱的儿童们。我们听得见里面的歌声笑声。

复兴节，成都实验幼稚园预定在这天开幕。

仿佛，我们已听到了那复兴的歌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成都

灯光（下）

光

这西南天气不肯轻易下雪。想象却常使人感到满天雪意，这厚重的雪层！

流水，川中美景之一，到冬来依然是滢滢活泼的。成都，绕城的河，穿城的水，大溪小涧，不论在郊外或在城内，耳边常听到清澈的水声，不论缓流或急水，冻绿冷冷，到了这时候总带几分寒意。

黄昏了，成都平原上炊烟成织，一缕缕，一丝丝，一层层，一弯弯地飘游，回绕在空中，像降低的云，像未消的雾；沾在树上，挂在屋角，落到水面，也漫留在草原上。行人出没，隐现，在烟层里来往，习惯了，并不感到环境的包围。

这时窗外，无边的漠漠寒烟，清凉，也安静。个人的感觉里，沉沉漠漠，也不想到什么。

转过头来，眼前一闪，屋角灶壁的一片光，特别地鲜丽红亮，顿时使人感到乾坤活动起来。灶内的柴火熊熊地燃烧着。锅面上蒸馏着的碗碟盘筷，在光影里，一幅温美的图案，水蒸气腾腾上升。

这时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见过的一幅画图，一张油画，陈列在美国华盛顿美术馆的油画展览室里——还记得，紧隔壁的一间就陈列着Whiatler的漫画，许多好漫画。那张油画的作家名字我记不清楚了。画却仍鲜活地在记忆中。夕阳穿过窗格射照着屋子犄角桌下的一缸酒。夕阳照漾的光色，逼真又鲜活。外行猜想起来，大约是颜料里掺和了硫磺、磷质么？

回看灶壁上那澄黄红亮的光，该怎样画呢？灶门前那两位小姑娘的双手来回地取柴添火，为射影在壁上的光圈里添些图案。光里的射影，灵活生动。光里的声音、笑声，有时低语，好像津津有味地谈论《春》里面的人物性格，提起淑英、觉民、琴等一些名字，正对着灶口的光圈里。一对天真的小圆脸，淑附在姐姐的肩上。她们的目光注视着灶里面的火和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复兴节前夕于成都

黎明

鸡声、号声、钟声这些声音，音波渐渐地繁密、热闹、响亮起来。满空中好像充满了音符一高低缓急地在空中活跃飞动，等候一九四二的元旦踏步来临。

性美今天要参加元旦检阅，未到黎明，就起来了。全家的空气随着他的动作，紧张、兴奋，全家都起来了。

窗上现出鱼肚白。云里透出青光。一九四二年元旦的天幕挪开，升起，我们望着出现的新黎明。刹那间，大地上，肃然静穆……是向新年致敬么？

这一九四二的舞台将出演些什么样图案的戏剧呢？大地上原有许多，许多有力量的好线条。这些线条还没决定动向，似乎等待着聪明能手来设计图案，这一九四二年新图案的光影色彩或将表现人类的智慧聪明么？

这时，在这黎明的青白光境里，中华大地上的男女青年都起来了，兴奋、活动在一致的律动中，准备着元旦检阅。这一致律动的力量——一股力量——像滚滚的长江大河，在中华大地上穿山盘石，浩荡横流，滋灌。

成都元旦检阅集中在中央军校。广场漠漠，发号施令，都有一定的程序。

蓝白、蓝黄、灰绿，这些颜色列成了线条，一行一行的线条整齐，律动。大家注视着这些律动的线条，当然都感到它们的美，可喜、可爱。它们表现力量，青年。其余的，如钢盔、铜号、指挥刀、子弹、盒子炮等，那都是些配件，没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力量。

不过当那匹黑马，广场中万人注视的那匹骏骝黑马，振蹄，标立，表现一种英武姿态的时候，我就想起从前有一个人心爱他的那匹黑马的故事，那匹黑马负着他跨过阿尔卑斯山。想象中，不免接连出现两个人影，两个武装人影——拿破仑、希特勒，他们两个人不肯向人折腰，傲慢指挥，唯爱接受他人的撒刀敬礼。无疑，他们已成为两个偶像，我想抹掉想象中的这两个黑影，我不爱看他们。

试想，一次机关枪扫射下堆积的千万数无辜生命，怎不使人感到腻味无聊。然而打倒偶像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它已种根在那最灵活、最细微的神经细胞里。拿破仑在这地面上能有这样大的诱惑魔力，压根儿，因为人们对“魄力”两个字的解释错误吧！

蓝白、蓝黄、灰绿那些律动的线条依然在我们的心影里。他们表现青春朝气、纯洁、民族的新生力量、不可遏止的魄力。这青春力量的最足珍惜、最使人敬爱的，就是这股力量流动的动向！

这律动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元夜记于成都

五姑

一个黑漆的榆木妆台，青花石的桌面和五块三尺多高椭圆形的

玻璃砖镜子。这妆台子上常放着一个白铜脸盆，一些大小高低的玻璃瓶、头油、发水、面蜜、水粉之类，还有扑粉盆、胰子缸等。不过，这都是些普通式样的东西，不是漂亮时髦的梳妆件，也不是那整套的金碧辉煌的妆具。然而看上去，这妆台上面是很热闹的。唯有一个黑玳瑁的扑粉盒、一个镂花的银胰子缸，还有一套修理指甲的象牙刀剪，似乎是主人的爱宠。这就是五姑的妆台。

五姑每天起床不迟，七点钟左右就坐上妆台。于是，用人进来请安，问事；孩子们进来叫婆婆；管事的进来送上几份报纸，报告账目，要钱，顺便地说些北平城郊东西南北的消息。电话铃响了，接耳机，说电话。亲友们来了茶烟点心糖果，都集中围绕在这妆台的周围，说、笑、谈天。不知为什么妆台边是那样的有趣，五姑卧室里有不少的大小镜子，壁镜、衣镜、大柜中的长镜，但是我们并不见她在这些镜子前顾影徘徊。她的兴趣、精神、时间似乎都集中在那个妆台上。差不多每日午前，妆台的周围都是那样的情形。然而，她虽对镜，那溜过去的时间好像并不是为了饰发涂脂——一个极简单的S发髻，两条天生的入鬓修眉。客气的朋友们却窥不见她那妆台边的情状。他们来了，都集中在客厅里。

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享受那样的安逸消闲。这紧张的环境、压迫的生活，不可能，也不容许那样的消闲。然而近来我特别感到镜子的功利。抗战以来，因为环境的紧张、生活的压迫，大家脸上的线条似乎也紧张深刻了。中年少壮的亲友们，几时不见，脸上添了线条，鬓边添上霜丝。不论你怎样强颜欢笑，心境是不能欺人的。

大家，彼此间，对于环境的一切都有会心恰意的同情，但是脸上的那些线条不免彼此影响刺激，在人群中，我们很少见到畅快的欢愉笑靥。假使我们有机会多对镜几回，镜子会告诉我们“维忧用老”

是多么不值得的事，或者镜子能指示我们怎样转变容颜。说老实话，谁愿意见自己的愁容苦面呢？在一面小小的镜子里，大局的安危、个人的生活、环境的动向都能纤微毕露地呈现出来，而且有许多精深思路每从镜子里反射出来。所以近来我对五姑的妆台添了一层了解。

五姑是有美名的。不过她的美，不是那柳眉悬鼻、杏眼樱唇的细线条美，不是佻达的摩登美，也不是唐宋院本画里美人儿的肥美，她的美是在她那神情眉宇间。记得一次我们大家和姑丈开玩笑，笑他惧内，他的回答是：“畏其美也。”虽然，这是一句笑话而已。

五姑，有些人称呼她“凤凰夫人”。这名称好像是多么封建似的。当然这名称的来由是因姑丈的关系，秉三[4]姑丈是湘西凤凰县人。不论这名称的来由或关系如何，我的意识中却常有她这只凤凰，只因她有那坚强上进的意志、宽放远瞰的聪明。

说起凤凰关系，他们是这样的一段姻缘。在五十余年前，叔彝[5]三伯知守湘省。沅州是湘西的山丛贫瘠区域，且在五十余年前，那是多么苗蛮的地方，谈不到文化或教育。我读《守沅集》，实在佩服三伯那几年的辛勤职守。《守沅集》的内容都是些告示、手谕、手禀，禀告些抢案、杀案、蛮案的原委和怎样处理开化的情形。看了教人腻烦，同时也教人兴奋。兴奋的是使人感到一个区区小地方官可以做出许多可爱的工作。这苗汉集合的新血系是民族的一种新力量，只待聪明能干者来开源导流、理丝就绪。“边疆教育”不是今日的时髦名词么？不过这份工作绝对不是一阵时髦呼声的推广能见成绩的。这份工作可需要百份的忍耐和勇气、千秋事业的眼光。

三伯在沅州最得意的工作是创办校经书院，选录当地优秀子弟

入学。说起来真可怜，不论你如何设法鼓励青年入学，而三年中录取的学生不够五十人数。秉丈就是那些优秀子弟之一。为了督教方便，校经堂就设在府署花园的侧院里。五姑是三伯的稚妹，我们家那时也只有这一位双髻垂鬟的五小姐。回首十年前，这还是我们晚辈取笑他们二老的笑话材料，“某淘气门生隔着粉墙偷看五姑”。三伯离沅后，中间隔了四五年又守永州。那时秉丈已应试中取，不幸断弦。就在那时，三伯将宠爱的幼妹许嫁了得意的门生。这就是五姑下嫁的那段故事。

五姑和秉丈共同生活三十年。那三十年的生活经过已在五姑的五旬寿序内被姑丈笔述得那么亲切有味。不过其中有一段事迹，一段那样值得纪念的生活经验，而五姑平日却绝对不和我们谈起，所以我对于那一段经过至今仍是茫然。戊戌政变，秉丈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总务。他是康梁的同党，和谭嗣同等“六君子”是同样的命运。当事发株连的时候，幸而，不知怎样的鬼使神差，秉丈已先离长沙。不过在那时，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不论你走到中国的哪一方，也逃不出天罗地网。我只知道五姑和秉丈有一次月夜的伤心诀别，是戊戌的八月十五的中秋夜，在明月团圆的光辉下，秉丈将双亲儿女都付托五姑。此后的一段经过，五姑绝不再提，大约不愿再回念那一段痛苦滋味吧。

辛丑那年是我们家最坏的流年。在一年之内，五伯、七叔、七婶、九婶和我的母亲相继去世。留下的是一大群素白麻衣的孩子们，其中有不满一岁的婴儿。几年后，我的父亲去世，祖母已伤心透了，五姑由上海归宁，安慰祖母，同时又随姑丈回沅省亲。那时的沅州不像今日的沅陵，公路四通八达。那时由长沙去沅州的通行方法是坐小河里的小木船。急流浅滩，水清见底，看风景，当然有不少的好图画，然而偶一不慎，船底触礁是够危险的。而且有段路是水陆兼程。五姑常在这条道路上来往，欣赏那内河的秀壁清流景

色。那次从沅州回到长沙，她就开始安置我们这群孩子，有的送往日本留学，有的带到上海读书。当时我们哪能了解她的计划趋向，要重建家庭的新力量。那时她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少妇。

不论“教育万能”的学说究竟有几分真理，五姑，并没有受过时代的专深教育。以她的年龄和她的时代，那原不足为奇。因为有一个宠爱的幼弟，男孩是要读书的，所以她也得了读书的机会。在十二岁以前，她带了九叔一同上学。那窗明几净的家塾经验，她曾尝味过两年多。老塾师对于女弟子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是十分地客气。她读过几种书：女四书，诗经，古诗源等，但是谁知道，她对于这些书究竟了解多少？

不知是她自己的聪明，或者是环境的孕育，她对于一切事理人情有那样的认识。她是一个有抱负、有事业观念的女子。她也感到自己未能及时就学，没有一艺专深，而她那礼贤敬士的风度是可爱的，所以她的朋友圈子并不因环境关系而受限制。中年以后，她的意志向社会迈进。她认清了我们这“金字塔倒竖起来”的社会现象的危险。当秉丈离开了政治舞台，集中精力创办香山慈幼院的时候，五姑认为那工作的圈子太小。秉丈对教育工作有他的理想，他爱他亲手抚育的儿童们。当时慈幼院的寄宿舍里一律用小铁床，那布置也曾受过批评的，但是秉丈认为儿童们应该不分贵贱，一样享受。他的理想我们也不能否认。然而五姑的美梦是愿意中华民族那千千万万、广阔无边，甚至智能低弱的文盲阶层都能转入一个开朗光明的自由境地。她有抱负，有志愿，但是她不熟悉那些近代社会科学的整套的推行方法，不免着手茫然。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德妹赴美，五姑送她到上海，我也从南京到上海送行。大家住在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记得房间号数是一四四和一四五两间，前面有游廊草坪。德妹动身走了，五姑不免思念，正感无聊，她留着我在上海和她做伴。

一天下午陶知行[6]先生走来，神情非常地高兴，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知行先生去游西湖，刚从杭州回到上海。据他说，在西湖边，他发现了一种绝妙的推行普通教育的教学方法。

那是春天。每到春季，基督教会要举行一次篷帐会，当然那是一种传播教义的集合。春日西湖，那是多么美好的集会环境！那年西湖边上的篷帐会，据说是上海青年会总会主办的。在星光清丽的某夜，知行先生在湖边散步，不知是走近天竺或是灵隐的那一段，他遇见了一个数百人集合的篷帐会。篷帐里射出闪灼的灯光，这灯光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逗他进去参加集会。但是那时讲台上发出的声音，不是讲道而是一具幻灯，放射些萝卜、白菜、算账、敬茶、送客等普通日用的单字。那时篷帐里的几百人，男女老少，扶老携幼的，肃然清静，精神专注在幻灯上。参观的陶先生感觉那精神太美了，方法太好了，自己也兴奋起来，非常得意的，怀着那幻灯教学的“法宝”回到上海。他报告五姑那教学方法的效力，可以推行全国，是推行大众教育的绝妙教学方法。并且探明了指导那教学方法的是晏阳初先生。晏先生那时在上海青年会总会任职。当时五姑就托知行先生设法约晏先生会面谈话。当时她的神情很镇静。陶先生走后，五姑兴奋起来，大约是太高兴了，高兴到无可如何，无所措手足，她叫开汽车，要我陪她出去兜圈子。由静安寺、南京路、黄浦滩来回三个圈子，车夫莫名其妙。在车子里那段时间，五姑整个地沉默了下来，不开口，不说话，但是从街上路灯的光线里可以看见她脸上的微笑。那时，我似乎懂得她那内心的兴奋。

隔了几天，一个下午，两点钟，知行先生来了，陪着一位面色清癯的西装人物，手里提着一个黑皮夹。就是那天下午，在沧州别墅的一四五号的房间里，围着那屋子中间的一张圆桌，五姑和陶、晏二位的圆桌会议开始了。他们三位谈得高兴，投机。晏先生那时

是翩翩年少，他说话的声吻和态度都很镇静，申述了一番他那教学方法的工作经验。前次欧战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华工被送到欧洲去。他们散漫无依地流落在欧陆上。晏君那时是热诚的青年，自告奋勇，辛勤努力地编制一种极浅近的读物来教育华工，那就是他教学的起源。那天五姑就提议，利用那幻灯教学方法，扩大工作范围，推行到全国。她对晏先生当然是十分敬仰，并要倚重长材，约他共同负责，做这全国识字教育运动的工作同志。那天，就是这二十年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起始。那天，她命令我坐在旁边的一个小书桌上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我遵命地记录了。那张字迹不知还存在哪个箱子里。

此后的一年，五姑集中了精神兴趣，雷厉风行地组织工作。她在各地奔跑，废寝忘食，整个忘了自己。姑丈常取笑她，有了社会，忘了家庭，他要和她竞赛一下。我们也转笑姑丈，并且送他一个美衔“男性的嫉妒代表”。

那一年，我跟着她，实在没有努力，没有成绩，虽然她愿意我跟着她、了解她。青年们在宠爱的庇护之下往往抛弃珍贵时机。

在第二年秋天，我一半是顽强任性，一半是恃爱逞娇，离开她出国了。

就是那年秋天，阳初先生受了五姑的聘约，移家北上，和五姑共同负起这全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工作。

五姑，她那和悦温怡的风神是亲友们公认的，而她那刚劲的内性、坚强的意志、舍取去就的决断却是许多人不知道的。秉文，禀赋聪明，热于友情，忠于所事，也是我们认识的。在他的政途知遇，早年很顺心，晚年不遂意，因为他有自己的明知。袁世凯极度地想利用他，任他热河都统，责任内阁，都是忌材圈虎的手段。但

是秉丈觉悟得早，没被圈入洪宪的笑话里去。而袁世凯更畏忌的是五姑。记得是一九一五的夏天，我和濂姐因暑假回到北方，住五姑家，随着五姑秉丈各处游玩，非常高兴的时候，忽然来一急电，熊老太太在沅州病重。秉丈思乡念母，涕泪纵横，匆忙地乘平汉车赶回湖南。这是事实。在得电报的次日下午，袁世凯就送来一大堆礼物，人参、燕窝之类，还有两件貂裘，五千两银子的旅费。我们年轻人是多么好奇捣乱的，争着要看总统府送来的东西。大暑天送皮袄，事太离奇了，濂姐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莫不是总统疯了么？”当时我们被五姑训责几句。但是五姑转过脸去又抿嘴笑，而且语句诡谲。我们不懂其中是什么神秘？秉丈动身走了。一天清早，五姑自己带了那一大堆东西，原璧奉还总统府。回家后，她才告诉我们：“别人以为姑丈这次是托故离京，回到沅州那蛮山里去养兵秣马呢。所以过冬的皮衣都送来了。一堆礼物就能挽回人心么？我倒要送还给他。”这件事只有舜姐和我知道。当天下午，五姑一身轻便，到天津打牌去了。

以五姑的性格，她应该是爱下棋的，然而她却十分欢喜麻雀牌，她爱那游戏。她在牌桌上的花样儿真多，几色红，几色青，几番风，几番雨，几条龙，几只虎，花样儿翻得愈多，她老人家愈觉高兴。那些五花八门，我辨不清楚，而且对于那样的消耗精神，也曾表示不满意。我回国后，自己陶醉在蜗角乾坤里：一个小家庭，三个小儿女，几点钟的教书责任，自己觉得工作神圣，其余的事也就不在意念中。我们的小家庭和五姑的住宅仅一街之隔，三年中，我曾在牌桌上奉陪她一次，她是多么高兴的！现在的生活虽紧迫几十倍，假使能年光倒流，我岂不愿意陪她在牌桌上游戏，使她多高兴几次？过去无所用，未来不可知，能触觉的唯有现实。今日这现实的混乱的世界、颠倒的人生，若不是痴儿愚戏，还有什么神圣意义的存在么？

说起来，又是一段笑话。慈儿未满六岁，在幼稚园的时候，一日晚餐，她附着桌子犄角，自言自语地说：“世界上有两个好人，一个是孙中山先生，一个是五婆婆。”我们听了这突如其来、滑稽连锁的话，不免哑然失笑。当然她是受了学校公民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儿童感觉天真，出语诚实，又教人莞然。

一九四二年一月于成都

附录一

倚楼词

这是过去三年在北方写的一点稿子，既不是欣赏文字，也不是玩弄闲情，实在是心境苦郁，无可如何，抽绪成句。就格律说不免要受倚声家的指摘。然而此情欲吐，不计工拙了。

“七七”卢沟桥事起，我们全家于八月八日离开了北平。当时平津均已沦陷，平市警察已被解除一切武器，徒手站在街上。我们所住的罗圈胡同的房子曾经庚子年八国联军的蹂躏，不知又要遭敌人的怎样践踏了。佛西因平教会由湖南屡电催他南行，在九月十五日由天津英租界紫竹林码头上船，总算平安地出了塘沽，转青岛，胶济平汉路奔驰南下。那时我们每天用电报通消息。

从十月五日起，平津向外的通电也停止了。直到十二月底才有由香港转的航空快信。眼看着大局一天天地转变。这时期，不论个人、家庭，分工合作或合作分工都是忍痛图存的唯一途径。我个人因孩子们的牵累，在平津转徙了两年多，那时日，也就不必回想。今天在这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一家几口还有见面的机会，也不能不算千万人中的庆幸分子。今日的成都，虽在警报中过活，然而这是做人的生活，转觉身心泰然。若在平津，我们只有在半夜两三点钟、人声静寂的时候，才听到一点重庆的广播，知道点战事的情形。听到战区、后方各城市被炸的消息，那种心神的不安，各种的系念，可怜的祖国之思，情绪高涨到几十倍。和我同境同情的，不知还有多少人，今天仍困留在沦陷区域。相离益远，系念日深。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记于成都盐道街

浣溪沙

不恨西风送语稀，却惊传递捷音微，沙场多少好男儿。应是秋高天气爽，怎生云暗压天低，长堤烟树意凄迷。（一九三七年秋津居感时）不畏风高愿买艇，时乖力弱意多赊，岁阑儿语惯呼爷。客里云山多少路，梦回南重隔天涯，月明寒夜色偏佳。（一九三七年岁暮）春去春来总未闲，山南山北爱留连，野桃红杏艳连天。香醪飞花随步旋，明湖双桨戏晴涟，此中回味是清欢。（一九三八年春津居怀北平景物）佳节缠怀不自持，可堪儿语门娇痴，远山云影渺如斯。红烛侵思光荡漾，香花凝绪影参差，悠悠春意欲来时。（一九三九年新岁）卷地狂飙逞意骄，黄沙迷望更无聊，不能清澈怎凭高？消息不来春寂寂，落花和月夜迢迢，欲随残梦度层霄。（一九三九年春津地狂风蔽日）

忆江南

春光好，春色媚千家。痴弱依人浑似醉，洋场飞骋试新车，歌舞闹喧哗。

回首处，城阙漫咨嗟。山顶英儿拼敌骑，平原碧血浸春花！谁忍试新茶？

鹧鸪天

风掠寒云去不知，悠悠时序似相思。频传南地梅开遍，怎奈风光向北迟。春且近，绪如斯，两年花事怅心期。应知处处灯红夜，苦念征人遍地时。（一九三八年除夕）花事年来似故知，一番风雨一相思，惊心历冻凝冰候，况值娇伤上绿时。勤理护，喜新枝，一回灌溉一回滋。今春所事堪惆怅，惟有闲庭黛月知。（忆双照堂牡丹）别味朝来似醉般，此怀端不为春宽。青山碧水原牵梦，一样春

光几样看。星悄悄，意漫漫，风情愈逼愈回环。低徊徙倚都无奈，人散天涯欲致难。

踏遍长堤意不融，悠悠春色总春浓。茸蒙细草兜行路，花气氤氲荡晓风。离恨远，梦应同，朝来迷绪更重重。纵横意态春云里，弥绿关山惊望中。

减字木兰花

骄阳如许，又近一年春好处，细草仍舒，欲揽春光意转酥。江天远树，总是凝愁无可语，依旧河山，故殿琼宫只断肠。

（一九三八年春津居怀北平）几番风雨，细草含春娇欲吐，看不分明，远树和烟一样青。低徊凝伫，情似春光挥不去，何必咨嗟，稳度风波味更佳。

蝶恋花

润逼春云蓝似璞，轻暖轻寒，隽味仍如昨，莫道年年春遂约，几番离别成迟莫。毕竟春光难领略，不为浮名，也把春耽搁，唯有娇儿嬉憨乐，稚心春润滢滢跃。

临江仙

积日层阴迟不下，酿来却为明妆，朦胧瑞意似飘扬。清光如许地，试步亦何妨。莫道西园闲却了，别来羁恨沉长。遥闻云外腊梅香（君来书谓川中腊梅水仙盛开），此香侵意绪，入梦懒思量。

（一九三八年除夕大雪）世乱那堪添积习，中宵午夜频醒，枕边思绪苦难平，数星量月，觑眼到天明。悄夜澄空凉似水，恍然何处钟声，慧音圆好不多鸣，几声回荡，遥度远云层。（闻复活节夜

钟声)

采桑子

一九三八年春，津居苦闷，携美慈淑三儿及其小友游八里台，经南开大学旧址，极目荒凉！

今年谁教春江满？逝水东流，寂寞芳洲，绿色虽佳似带愁。痴儿笑共长堤约，珍重芳丘，认取同俦，准待来年胜此游。

清明节味酣逾醉。光漾花娇，花映光撩，云样模糊远梦迢。欢愁不信安排定，细味清宵，努力花朝，情到春深怒似涛。

清平乐

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寄佛

暖风轻雨，便道春如许，欲共酿花佳节序，远梦迢迢无据。稚儿那解时艰，偏言携盒游山，惆怅心情如缕，春光不逗人欢。

喝火令

一九三九年春，得佛自蓉寄归相片二帧，赋此题之。

别恨随春长，鼓声动地喧，此中时日老人颜，信道征儿虽健，青鬓却斑然。欲聚偏难聚，相期日后欢，人生离聚莫执澜，待得圆时，重植旧时兰，记得旧时兰影，人蕙并娟娟。

附录二

乐山时期作品

鸟乐

寄居嘉山，这是第三个春天。每到春来，江流的水声，闹春的鸟唱，欢腾跃跃的究竟活泼多了。这段岁月对我个人的启示是几十年来未曾尝味过的一种心理训练，训练我自己安心定意，把握这个好机会，学习细辨鸟声。枕上迷迷糊糊的时候，大约是早晨四点半左右，楼外的鸟声就开始逗人了。当然不一定是有意逗人，也许是报晓、呼伴、觅食、教雏、练喉，好像这四面山腰每个角落里的鸟儿都睡醒了，东一声，西一唱，遥遥呼应。起初，声音是各处分开的，大约是各自呼吐清气洗溜嗓子，渐渐地声音繁密，一串串的甜蜜歌声合韵交流。闭着眼，静听远处的江声，近山的鸟唱，好像整个的山水天空都浸润在一个盈盈流荡的大海里。

再仔细听去，可以很清楚地辨出各种的发音。原来鸟唱也有喙音、唇音、齿音、舌音、腔音、喉音，有从胸膛深处吐出的宽厚高音。不知是否上帝亦会赋予它们男音女音的不同声带？个人的生活和山林小鸟究竟不够接近，至今听不确那是谁的发音。细听它们的语音，似乎也有乡土、粗细、斯文各种不同的语调，然则上帝亦曾赋予它们以模仿记忆的本能。尤其是当众鸟合鸣的时候，那天然流利的运声舒喉，简直是一段一段的甜美旋律曲，音彩语韵，tonecolorandverbalmelody，真叫人惊异鹊鸟们得天独厚。它们秉赋了如此丰美的声色，然则究竟也秉赋了性灵么？或者它们宁愿享受浑沌平凡的厚福，而要求上帝放弃这份自寻烦恼的理智聪明，那却只有上天知道了。

平常打眼看得见，在这山头绿树间飞来跳去的雀儿们，有成群

的小白鸟、白胸灰羽俊冠山鹊、碧绿的小翠鸟、嫩黄的小黄雀，有竹鸡、画眉、红冠标致的祝英台，还有黑羽修洁、净白长尾的梁山伯，以及红绿羽毛而带黑纹，从头至尾只二寸长短的小身材雀儿，唱声轻细溜圆，满林遍地地飞来跳去，不损人也不害物，不怕人也不闹人，它们莫不是神异经所说“鹄国”里的移民么，如此地自然有礼。诧异的是树林间看不见多少鹊鸟窝巢，然则它们是春来佳客呢。到了暮春，劝稼的布谷，意重心长地早晚叫个不停。还有子规，尖细的声调，似带清愁，从云中溜过，唤雨的斑鸠，噪晴的喜鹊和夜游神的猫头鹰，那是常年听到的。夏秋夜间是夜游神的热闹季候，远近山树间高声低叫，呼朋唤侣，娓娓谈天，或哈哈长笑。

这美暖春夜，猫头鹰倒不多参加热闹。难道是因为这些美容善唱的嘉宾息止，夜游神感觉生活不调和，难于处群而暂避去么？大约一周前，见几个燕子回来了。因为这个山上的住客不够贤惠吧，它们不肯停留下来，只在半空中斜阳光里飞旋。八年的抗战生活，人类究竟是血肉之躯，意境心情的维持常态，究竟是有限度的。高空里的鹊儿们对下界的鸟瞰看得最清楚，不愿沾惹麻烦么？何况春来秋去的燕子是追求享乐的小鸟儿。据说衡岳的山巅是燕儿们南来北往、息趾回足的交换点。祝融峰的风力强烈，不是轻身燕子的栖息处。但是年来春日，不论衡岳山谷或湘江，两岸的颠沛人家，岂能再有那卷帘清供的待燕闲情？

若将这些美妙身材善歌唱的精灵来比拟诗人，宋玉潘安之貌，他们的美，我的意象中想象不出一个模样来。但是在几本西文书籍里，却常看见几个诗人的画像。那些坦白胸襟深灰色的羽鹊似乎像哲意侵深的华兹华斯；那黑白分明、清秀的梁山伯好像娟好的美貌诗人雪莱；那红冠标致的祝英台倒像带贵族味的倜傥拜伦。我们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和华兹华斯有些相似相同，彭斯似乎是一个“一身爱好是天然”，那么意静心恬，带些土味儿，质朴纯好的结实青

年。劝稼的布谷鸟，似乎太暴露了，比拟这几位诗人都不够味儿。

兴来比拟，唐突了诗人们，怎好。

还有去年秋天看见的雁阵，听见的雁声，也是未曾见过的深刻印象。在十月中旬，约一个星期的时日，每天下午一阵阵嘹唳的雁声，一行行几丈长、飞不尽的人字阵。记得是十月十七那晚，我在灯下做针线，夜深十一点多钟了，忽然一阵极凄切尖利的雁声，足够十几个琵琶合奏才有那声响，抑怨长声掠过山头迢迢远去。雁去了，余音留在山边。淑儿问：“它们这样叫，是因为黑夜里，怕迷了路，失了群，彼此呼应么？”我不禁想起了王静安先生那首伤时的《浣溪沙》：“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醖丽人嬉，今宵欢宴胜平时。”

静安先生的小词都是非常隽永精练。他的感时看法不免迂执，然而他的不投时好和他的治学精神，只有这不辞辛苦的长征雁阵能代表他的坚毅。

春润秋萧，鸟声里表现得最清楚。清晨不到六点钟，朝阳破雾刚出，明珠挂在东方。大地上的气氛，盈盈袭动穿绕直达到呼吸胸臆。这时的鸟唱，听迷惑了，直教人感到琴弦管笛合奏的流韵音潮。那溜嗓子，迎朝日的欢欣喜意，只有极流利纯熟的箜篌弦响或能表现那春来流动不息的生意。树上的新嫩叶，草间的小露珠，似乎都被引动了，彼此会心吁噫。

“庄严的音乐最能抚慰迷惘的心灵”，这是莎翁的美词句（暴风雨，第五幕，第一景，第五十七行）。今日这骨肉流离的世界，这迷惘的苦海，大家迷惘到几乎在镜子里不认识自己。这年头是人类历史暴风雨的深夜。这春来的自然吟韵莫不也是那活泼的空气精灵Ariel召唤来的庄严音乐？精灵说：“我若是个人，我的心会变

得软些。”

我们更希望找到一个甜醉的Miranda，有一天，她会代表人类很惊异地说出这样的话：

啊，奇怪！

这里怎有这许多的好人！

人类有多么美！啊！健美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同幕，同景，一八二一一八五行）这春来的鸟声，庄严的音乐，抚慰我们大家，在各个都迷惘不能自主的时候，找到我们自己。

原载《东方杂志》第四十一卷第十号

《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7]节选（译作）

日记一则五月七日

我爱我的花园。现在，这样甜美的下午我在园里写作，不过蚊子闹得厉害，半个钟头前的一阵凉雨，树叶子都给洗干净了，鲜明清丽，那新绿多吸引人注意。我的近边有两个猫头鹰正在谈天，娓娓长谈，我爱听他们的语音和爱听夜莺的歌声一样。猫头鹰先生在说“1335”，他的夫人在不远的一棵树上回答“2446”，柔美和谐地同意而顺从他的意旨，她真是一个道地德国产的女性猫头鹰。他们的语句，老是重复又重复注重着一件事，我想一定是在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怎会因猫头鹰的讥诮而退避呢。

这地方荒废得不像个花园了。里面的房子，不消说“花园”，闲了二十五年也从没有人住过。一块如此美的老地方，那些人本可

以在此住下而都没有住过，宁愿在烦嚣的城市里找几间房子住着，似乎都不具耳眼的，这世界似乎也就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具嗅觉；岂知这春来的嫩叶和温润的土香给我多少快乐。

现在我老是快乐的（这当然是指户外说，因为室内就有仆人和家具），我的春天乐趣虽不比夏秋更浓厚些，然而意味不同，譬如像去年冬天，在冰结霜凝的园地里，我高兴得舞蹈起来，忘了我的年龄和儿女。但是那端庄尔雅的观念不禁使我只敢躲在树丛后面跳跃。

我现在竟被许许多多的雀果树围绕起来，大树枝拖到草地上，枝上的白花和嫩绿，缠络垂缨。看起来这园子就像在举行婚礼。我从来没见过这许多的雀果树，满园遍地的。园子的东边有一条小溪，溪水的那边，就在麦田大地中间有一棵非常硕大的雀果树，衬着那早春的冷艳蓝天，图画似的，耀眼的美。

园子的周围是麦田和草坪，更外圈是展开的莽原和松柏树林子，林子接着蔓草，蔓草接着林子，这样绵延下去。树林的美是那排色魁梧的树干，上面的圆顶，柔淡青灰，下面衬着亮绿的冬青树叶，静悄悄没有半点声音。那些莽原也是美的，望过去，绵垠无边，对着夕阳光彩，直叫人感觉投入了造物者的怀抱。

在这块平原中，在绿肥花盛的雀果树圈儿里我过着快乐的日子，就在那肥绿浸润中，有一所许多三角顶、灰砖的房子，在这里面我过了许多百无聊赖的深夜。这房子年代久远，添修的地方颇多。“三十年战争”以前，这是一个修道院，在拱形圆顶下的圣殿地砖，已被那些虔诚膜拜的农民信徒们的膝盖磨平滑了，这圣殿现在是当大厅用。阿道尔夫（GustavasAdolphus）大王和他的瑞典卫兵们经过这地方不止一次，文献上有记载的，因这地点正当瑞蒲公路要冲。这个“北方狮子”无疑是一位可敬重的人物，他的行动和

他的信念相符合，然而当时修道院的尼姑们也有她们自身的信仰，这个“狮子”却为难了她们，扰乱了那清静平和的岁月，迫着她们到外面去飘流。

从这房子所有的窗口望出去，平原遥展，没有任何山形障碍，只见远处一抹青树，西窗看落日，润绿平拖，直到尽头接着夕阳边线。我最爱西边的窗子，所以就选定这边做卧室，虽在梳头理发的时间，也欣赏景物，不致糟蹋片刻工夫。我的青年女仆服侍这样一个懒散的主人，习以为常，每到梳头的时候，她替我打开窗子，安放一张舒服的椅子对着外面，她也绝不来和我说话，以免扰了这清甜静穆的时间。照她的理想，一位尊贵的德国太太应有她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我这任性的花园生活习惯她很忧心。周围居住的人都以为我的性情怪癖，怪癖还是客气的说法，他们说我只会拿一本书在野外消耗整天的时日，从来不做针线烹饪一类的事。我想既然有人肯替我代劳，那又何必一定要我自己烹饪呢。至于针线活计，女仆们做得又好又快，我认为一切精致花巧的女红针线不过是用来愚弄笨人，使她们心手俱忙，无暇于智慧思索。

我们结婚已五年了，从前绝没想到利用这个地方来安家。那五年工夫，我们住的是城市里几间小屋子，那整个的时期，我虽非常地痛苦，身体却非常健康，这倒也去掉了一些坏观念，所以我现在的快乐不仅是花园的享受，倒是因为消化好。当我们把时日消耗在那城市小房子里的时候，这个可爱的地方，蒲公英早长齐了门口，道路上野草荒芜，没人来到，唯有北风偶然光顾。一五月里那过去的五个五月天一没有人来看看这些奇美的雀果树、盛开的丁香花，虽然一切都是那么好，那么茂盛，紫宝藤越长越茂，到了十月，这屋顶给一串串的鲜红花络盛装起来。这个好世界已被猫头鹰、小松鼠和厚福的小鸟们占据称王，没有一个人走进这空房子来。当那看房子的老头儿开窗子的时候，只见一些蛇从南墙壁下蜿蜒爬入，几

年来它们已养成如此习惯。这地方的一切都是快乐、平安，有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儿来住。回想起来，自己惊讶，没有理由地耽误了这许多年月，竟没有发现这偏地的一角就是天堂。每年吃尽了苦头到海边去住几个星期，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就利用这块地方来歇夏；直到去年春天我们到这儿来，打算开办一个乡村学校。闲步间，找着这块荒园。不知是一种什么败叶或潮润的土香，使我蓦然回忆起童年在花园里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那时日，怎能忘怀？那就是我生活的开始，那时我渐近成年，已踏步走入我自己的世界。记得是早春三月，灰色静悄的天，焦黄静寂的地，林空无叶，真够愁寂。当我站在那潮润、深静里，忽然感觉到一种初春气息冲袭的乐味，那是童年尝味过的，竟像脱了件衣服似的，卸去了那五个耗费的年头。这世界又充满了新希望，我也就此立誓与大自然结缘，我的快乐生活也就从此开始。

我的丈夫也闲散起来，似乎有点意思整理这块地方，居然同意来此住些日子，此后是六个星期的美满时光，从四月底到六月。到了六月，我就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儿，按道理，我原该尽力地督促匠人们整理室内的修画和糊纸等工作，然而实际上，每当我走进房子，已是工人们散去的时候了。

那时，我是多么快乐！我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有过如此满意的岁月，除了那段稚龄时期，因幼小不能工作。每天十一点钟那一顿点心，坐在一块铺满了蒲公英和星星菊的草地上吃糖果牛油面包，糖，似乎竟失去了甜味，而我对于蒲公英和星星菊的喜爱与日俱深，绝不忍让它们被铲掉，常以为，一两天内那花瓣的小脸儿又会活跃出现。那六个星期我整个生活在蒲公英花的快乐世界里。三块草地都铺满了蒲公英花—那原是草场，后来长满了野花香草—在落叶的樟木和橡树底下，蔓长着成片的蓝色细丝苔草、净白的秋牡丹、紫萝兰，而燕尾草我特别喜欢，因为它那洁净、明亮、光彩的

美，好像经过书画家画出来似的。秋牡丹凋谢后，接着又是雁来红，所有的雀果树花都鲜艳盛开，我陶醉在那花幔遮天的快乐里，打眼的又是丁香花，成片成堆地垂到草地上，行路的两旁还有许多小丛树灌木，接连拖展有半里路长，经过房子的西面，望下去，光辉明彩，陪衬着一些老木松杉。这些花还没凋尽，荆球花又开遍了，南窗下有四大丛浅红银粉的牡丹，而我感受到的快乐真是说不出来。那时日似乎都融化在一个甜美平安、浅红深紫的梦境里。

房子只有一个老太婆和另一个女仆，因为不需要太麻烦，同时我也可以随意些。我的餐食非常简单，可以连盘带碗地移到了丁香花底下去吃，我的丈夫曾送给我一个美号——“流动杯盘”。记得那些时，我的整个食物只是些生菜、面包和茶。偶尔，午饭有一只小鸽子，这是老太婆的好意，怕我饿坏了。只有女人受得了六个星期的凉拌生菜吧，而且那生菜里面又搅和些浓厚的丁香花的香味儿。

我曾度过那样清淡的生活，虽然此后对此并不欢喜。现在呢，不能不勉强帮着料理每日的三餐，其中两餐要端整安排，才适合正式家庭餐食的排场，完全不能离肉味的，叫我怎能不回想起那凉拌生菜的生活，一共四十天，一种单独的享受，因为我是单独地生活。

到了黄昏，工人们散去，房子里空虚得只有回声，那老女仆有筋骨痛的毛病，上床去了。我的这间小屋子是在房子的另一角，已布置就绪，我却总不愿意离开那些青蛙和猫头鹰朋友们，每每是怅惘地随手关上花园门，再经过那重重回声响应的南屋，这里面塞满了一些梯子，画匠的鬼形吊桶和乱七八糟的零件，更有一些暗影。

于是我口里故意哼着调儿，好像心里欢喜似的，缓步经过那砖地大厅，走上咯吱咯吱响的楼梯，再走向那白色的长通道，到末了，吓得急忙冲入卧室，将门双重锁上，再加上门闩。

这房子没有铃铛，我常常把餐室的铃带到床上去，预备深夜害怕的时候有点响声，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根本就没人能听见。女仆睡的一间小房子可通到我的卧室，那一大段空洞走廊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很明显，她不信鬼怪的事，因为我可以听见她上床就睡熟了。其实我又何尝信鬼怪。譬如一位法国太太说过：

“……从她的著作里可以看出来她的意志坚强。”

那个餐室铃铛，虽然从来没有用过，对于我却是一个大安慰，当我看见它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感觉安心些。夜里什么都挺好，只是不安，说也怪，就有那么些吱吱咯咯的古怪声响。我常躺在床上几个钟头睡不着，刚睡好，又常被一些响声惊醒，那就只好听着隔壁屋子里女仆的鼾声。到了早晨，当然我又勇敢起来，勇敢得像头狮子了。再想到晚上出冷汗的情形，不免又觉得非常可笑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夜晚是多么有趣的，我自己好像故事书里描写的顽童，他们听到风里夹带的声音，转有一种惊骇的乐味。那景况，我真愿意惊心再过一番，试想，那房子里纯洁的美，没有任何东西、佣人或用具。

那些卧室是多么美，什么都没有，只有悦目的新纸，有的时候，我走进那些已经修饰完毕的房间，想到它们的过去和将来，心里就构筑起了许多空中楼阁。从前住过这些房子的尼姑们还能认识这些刷得洁白的屋子么，它们都变得美好了，有着精致的花纹纸和洁白的粉墙。她们将怎样惊讶，假使看见那十四号小房间已变为浴室，那个大浴池足够洗净身体，就如给她们的灵魂清洁一番！她们会惊慌失措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当初我爱慕上了一位礼拜堂的琴师，我开始惊讶自己的污点，感觉初次失去了灵魂的清白，那是如何的惊骇呀！那时我只十五岁，其实我不过瞻仰了他的白袈裟、罗马鼻子、大胡须，对于这些我竟迷恋了六个多月。到末了，有一

天我和保姆在街上走，遇见了他，发现他的便服也只是一件牧师外衣、翻卷的白衣领和一顶硬毡帽，从此我绝不爱慕他了。

刚搬家的那段享受要算最圆满了，我什么都不想，只感觉自己浸润在平和优美中。他，忽然驾临，当然，无论如何，不论怎样，他有权来到。他责备我不写信，当我告诉他简直是太快乐了，想不到写信，他似乎联想到自己，以为我怎能独自快乐。我引他去看园子的四周各处。经过那新修的路径，请他看那明丽的荆球和丁香花，他对我说，没有丈夫和儿女的陪伴，居然也能快乐，这纯属自私，并且丁香树也应该整个地修枝了。当我们走回来的时候，我的晚饭已齐备，是生菜和烤面包，放在游廊的小台阶上。我尽力想让他消怒，把所有的晚饭都送给他享用，但是这个“盛怒先生”怒不能消，他说，要马上回到旧房子去。果真，他去了！此后的珍时岁月，我不免牵心，每当我想到自由乐跳的时候，就感到良心的刺痛不安（这一层，我是完全屈服的）。每当我要去监督那些屋子的画匠们，我的双脚却驱动着我去看花园。我在小道上走来走去，设计、批评、督促，一天的工作足能胜过从前一切的成绩。我按时写信，系念，然而又不能自抑地烦恼、悬心。但是你又能怎样呢，假使良心坦白，胃口如常，阳光明亮！

（《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这部日记，曾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这里译的一则，是用伦敦Macmillan的版本。）一九四三年三月译于乐山

原载《东方杂志》

第三十九卷第十一号

[1]陈西滢，学者、散文家。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46 年赴英伦，曾出任国民党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代表。

[2]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赢得崇高国际声誉。著述有《美学》、《诗论》、《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美学文集》（五卷本）及三百多万字的翻译作品。

[3]高仁山（1894—1928），江苏省江阴县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1924 年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8 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编注

[4]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曾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编注

[5]朱其懿（1846—1910），字叔彝，光绪十四年（1888）知沅州府，为政“教养兼施”，著有《守沅集》。——编注

[6] 即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编注

[7]Elizabeth and Her German Garden，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冯·阿尼姆（Elizabeth von Arnim, 1866—1941）的小说。